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伟人之初 领袖篇

陈云



陈云青少年时期大事记

(1905—1937)

1905 年诞生

6 月 13 日(农历五月十一日)出生于江苏省青浦县(现属上海市)练塘镇一个农民家庭。

1907 年 2 岁

父病故。

1909 年 4 岁

母病故。过继给舅舅廖文光抚养。

1913 年 8 岁

进私塾,受启蒙教育。

1914 年 9 岁

进练塘镇西市城隍庙贻善初等小学读书。

1915 年 10 岁

春贻善初小毕业。由于家境贫困,辍学在家做杂务。因天资聪颖,引起当地有名的教育家社衡伯的注意。后经杜推荐,免费入颜安小学高小部读书。

1917 年 12 岁

为了学习专业技能,从颜安小学转到距练塘 20 多公里的青浦乙种商业学校寄宿读书。但因经济力量薄弱,学习不满两个月,便辍学回练塘。

1918 年 13 岁

在颜安小学高小部继续读书。

1919 年 14 岁

5 月中旬受五四爱国运动影响,和颜安高小部师生组成童子军和救国十人团及宣传队赴小镇街头、明园寺、小蒸、泖口等地发表演讲,表演短剧,号召抵制日货。同时还和师生们组成救国储金会,到街头募捐,为反日宣传活动筹措资金。

5 月底毕业于颜安小学高小部,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继续求学,即在家中做家务。

11 月 26 日经颜安小学老师推荐,赴上海,到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当学徒。在商务当学徒期间,坚持刻苦自修,开始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经常与同事到“上海通讯图书馆”看一些进步书籍。

1925 年 20 岁

6 月积极参加五卅运动。此后,开始研读马列主义和苏联革命书籍,如《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辩证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常常读至深夜。

7 月任商务印书馆中共临时党团成员,参与领导罢工。

8 月 20 日组织并参加商务印书馆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会议,讨论组织罢工的策略、方法和步骤。

8 月 21 日主持召开商务印书馆党团成员、工会执行委员和工会积极分子会议。会议作出举行罢工的决议,草拟了《罢工宣言》、《复工条件》等,选举了由 15 人组成的临时委员会,陈云任委员长。

8 月 22 日率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 400 余名职工举行罢工,分别被推举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筹)和商务印书馆罢工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8 月由童亦湘、恽雨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编入商务印书馆编译

所、总务处、发行所联合支部。

9月1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召开全体大会，正式成立职工会。陈云被推选为执行委员。

秋为限制陈云在工人中的活动，资方将他调到仅有三四名职工的虹口分店工作。

11月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编辑的地下刊物《职工》创刊号上，分别以“怀”和“民”署名，发表了《总工会是什么》、《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两文。

12月22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印刷所举行第二次罢工，陈云为罢工委员会总负责人。

年底商务印书馆成立党总支，陈云任发行所支部书记兼商务印书馆总支部干事。

1926年21岁

1月在《职工》第3期（罢工专号）上，分别以“民”和“让”署名，发表了《罢工后职工应有的觉悟》、《我们为什么要罢工》两文。

4月同在沪工作的青浦24位同乡重建“青浦旅沪学友

5月30日与章郁庵、谢庆斋、许新之等人组织商务印书馆党团员和大部分工人群众到南京路参加纪念五卅惨案周年的游行示威活动。

6月在《职工》第8、9期（合刊）上发表《职工与革命》一文，署名“一民”。

7月在《职工》第10期上发表《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一文，署名“怀民”。

7、8月间经常回青浦，在高尔松等人家中开会，商议在家乡建党等工作。

9月在《职工》第12、13期合刊上发表《和平之路》一文，署名“民”。

10月23日参加上海工人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10月在《职工》第14期上发表《自治与民众》一文，署名“民”。

12月5日代表商务印书馆职工出席上海店员总联合会成立大会。此后，参加店员总工会的工作。

12月参加领导上海各行业（估衣、米业、南货、百货、中药业等）店员大罢工。

1927年22岁

2月7日出席中共江浙区委在上海杨树浦英电俱乐部召开的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准备会议。

2月19日参加上海工人举行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发动和领导南京路上著名的先施、永安、新新、丽华四大百货公司店员的罢工。

2月下旬因白色恐怖严重，陈云奉中共上海区委和上海市总工会的命令，带领商务印书馆职工一行五人由上海转移到浙江余姚。3月上旬，返沪。

3月21日受上海总工会之命，专赴龙华与白崇禧接头，要求国民革命军速进上海，遭拒绝，未能直接参加武装起义。

夏因领导工人运动暴露了身分，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和通缉，为躲避敌人的搜捕，不得不离开商务印书馆。

8月任中共上海市沪中区委委员。

9月底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派陈云回青浦领导农民运动。同中共青浦独立支部取得联系，决定10月初返回青浦。

10月初由上海经嘉善西塘转移到青浦小蒸，同陆铨生、吴志喜等取得联系，着手恢复党的组织，从事农民运动。

10月上旬在练塘召开西乡党团员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商讨贯彻江苏省委制定的实行土地革命，组织武装暴动，趁秋收时期，实行抗租抗税的方针。

10月中旬出席在黄渡中共青浦县委书记夏采曦家召开的东乡党员会议，在会上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江苏省委的指示，强调在青浦地区发动秋收暴动的意义。

同吴志喜、陆铨生、袁世钊等在青浦西乡的小蒸、练塘地区恢复和整顿农民协会，积极培养农会骨干，建立党的农村基层组织。

10月25日“十月潮”祭神仪式结束后，向3000多名农民发表演说，号召广大农民团结起来进行抗租斗争。

11月13日同夏采曦参加练塘镇南北货茶食业工会成立大会，在会上就工会组织及团结、改善工人待遇、劳资关系等问题作了讲话。

11月中共青浦县委决定组织松江区农民革命武装，由吴志喜任松江区农民革命军总指挥，陈云为党代表。同月，中共青浦县委成立，陈云任书记。

12月调任松江区党的负责人，领导该区党的工作及农民运动。

1928年23岁

1月3日领导小蒸农民举行暴动。暴动期间化名陈亨。

1月上旬中共松青县委决定，松江、青浦两支农民武装合编为松江区农民革命军，吴志喜任总指挥，陈云为政治委员。

1月12日到查家浜，同吴志喜、袁世钊、陆龙飞等人研究夺取枫泾的计划，后因获悉松江敌人援军即到，决定计划暂时停止实施。

春到嘉善避居，化名李介生。在避居期间，坚持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坚持领导松江区的农民革命斗争。

9月中共淞江特委成立，陈云任组织部长。

11月1日被中共江苏省委任命为农委委员。

冬离嘉善，随中共淞浦特委机关迁至上海。

12月两次出席中共淞浦特委讨论奉贤县委提出的奉贤庄行暴动问题的会议。

1929年24岁

1月21日晚8时，同杭果人等参与领导中共奉贤县委发动的奉贤庄行农民暴动。

2月6日对中共浦南县委发动农民举行新街暴动作出部署。晚10时许，新街暴动开始。

春在练塘镇主持召开中共青浦县党员代表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大会议精神和江苏省委关于恢复建立中共青浦县委的决定。

3月在上海虹口吴淞路原中共青浦西乡区委负责人潘达清家主持召开松、金、青三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中共淞浦特委撤消后，陈云任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

5月遭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军事委员会通缉。

初夏由上海赴嘉善。

7月—8月到镇江检查工作。

9月初就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及农委书记。

9月4日中共江苏省委会议决定由陈云负责上海沪中区委工作。

9月7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汇报丹阳、常州党组织和群众斗争等情况。

9月9日为中共江苏省委起草《省委通告第32号——号召广大群众反抗国民党屠杀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

9月14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汇报无锡、扬州党的组织恢复和群众斗争情况。

9月15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汇报丹阳党组织恢复及群众斗争情况。

9月中旬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赴常州武进县指导和督促当地秋收斗争。18日，离开常州，返回上海。

9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决定设立淞浦八县工作委员会，陈云为委员。

9月27日为中共江苏省委起草《省委通告第37号——接受国际关于农民问题训令及中央决议案》。

9月28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汇报崇明党组织的状况和群众斗争情况。

9月29日为中共江苏省委起草《省委通告第36号——关于全国劳动大会》。

10月1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汇报江阴、常熟地区党组织状况。

10月3日为中共江苏省委起草《江苏省委致苏州县委信——关于工人斗争、秋收斗争、发展和改造党等问题的指示》。

10月4日赴常州，指导天宁寺抗租斗争。10日左右返回上海。

10月中下旬赴上海沪中区巡视。

10月24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全体会议汇报沪中区群众斗争状况。

10月26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汇报镇江情况。

11月4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报告崇明情况。

11月中上旬同李维汉商讨起草《江苏政治状况与党的任务和策略》的书面报告。后李维汉根据这份报告代表省委向江苏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作了政治副报告。

11月18日至26日出席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作农民运动报告。当选为省执行委员会正式委员、候补常委。

12月16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汇报江阴地区的斗争情况。

1930年25岁

1月2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汇报丹阳地区农民斗争情况。

1月9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汇报宜兴党组织工作情况。

1月10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报告农委工作情况。

1月12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报告上海药业、估农业群众斗争情况。

1月22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报告奉贤党组织工作情况。

2月2日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决定陈云出巡沪宁线工作。

2月12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汇报上海沪中区群众斗争情况。

2月18日出席中共上海各区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同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报告无锡、宜兴群众斗争情况。

3月8—13日赴无锡、南京、苏州巡视。

3月下旬任中共上海市法南区行动委员会书记，兼中共法南区委书记。

4月7日出席上海各区行委书记联席会议，在会上汇报了法南区的斗争情况。

6月5日出席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议，在会上汇报法南区工作情况。

6月7日向中共江苏省委汇报上海法南区兵工厂工人斗争情况。

6月14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议汇报美亚、造船、兵工等厂工人罢工情况。

6月18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议汇报法电工人罢工斗争情况。

6月24—28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议汇报法南区法电、美亚绸厂、江南造船厂及浦东日华女工罢工斗争的情况。

7月14日任中共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委员，负责外县工作。

7月任中共上海闸北区行动委员会书记及行委主席团成员。

8月24日到上海闸北区检查对工人群众的组织发动情况。次日，向中共上海各区区委书记及军委参谋联席会作了汇报。

9月中旬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

9月24—28日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六届扩大的第三次会议。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9月任中共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10月初中共江苏省委改建为中共江南省委。陈云任江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兼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及上海工作委员会委员。

10月9日向中共江南省委汇报了南京、镇江、苏州等地党组织遭受破坏和目前的状况。

10月13日向中共江南省委汇报淮盐、淞西南群众斗争和党的工作布置情况。

10月19日出席中共江南省委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组织、职运、农运、军事报告大纲。陈云就农运大纲向会议作了说明。

10月25日出席中共江南省委扩大会议。26日，向大会作农民运动报告。28日，在会上提出建立全省党报发行网、通讯网的见解和办法，并得到了会议的确认。

10月下旬为中共江南省委起草《江南省委扩大会议关于红旗日报工作大纲的建议》，对建立全省发行网、通讯网作出了具体规定。

10月29日出席中共江南省委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外县工作问题。

10月31日向中共江南省委常委会议汇报外县工作的区域划分和组织分配等情况。会议决定：取消上海工委，陈云参加上海市的领导工作；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由刘瑞龙担任。

11月10日向中共江南省委常委会议汇报上海法南区支部工作和工人斗争情况。

12月1日向中共江南省委常委会议汇报上海沪东、沪西、沪中、法南、闸北等五区工作情况。

12月28日为中共江南省委起草《关于支部生活检查大纲》。

1931年26岁

1月1日出席中共江南省委常委会议。在会上作组织工作报告。会议同意了陈云把江南省委改为江苏省委的意见。

1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被增补为中

央委员，仍担任江南省委工作。

1月17日中共江南省委改组为中共江苏省委。陈云任省委常委，负责组织工作。

1月下旬出席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省委常委的工作日程及分工，决定陈云负责沪东、浦东、吴淞、铁总地区的工作和外县淞浦、沪宁地区的工作。

2月12日向中共江苏省委汇报上海法南区工作情况。

2月28日向中共江苏省委汇报上海沪东区工作情况。

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对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事发后，陈云协助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使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安全转移。

5月由中共江苏省委调至中共中央特科，任负责人。

9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秦邦宪、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六人组成。

1932年27岁

3月14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工会工作问题，决定陈云任全总党团书记。

4月2日主持全总党团常委会。会议讨论南洋烟草公司工人斗争等问题。

4月6日为全总党团修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红五月工作计划》发出。

4月13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的工作计划、失业工作决议案和赤色工会纲领等问题。

4月19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时事新报》工人斗争问题。

4月21日撰写《时事新报馆工人罢工斗争中反黄色工会的工作》一文。

5月2日，此文署名“金生”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第39期上。

4月23日起草《全总失业工人工作的决议》。《决议》规定5月20日为全国失业工人运动纪念日。

5月9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会议讨论了日纱厂工人斗争等问题。

5月12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会议讨论了目前形势与当前的紧急任务。陈云在会上讲了七点意见。

5月14日撰写《怎样巩固赤色小组》一文。5月30日，此文署名“金生”发表在《红旗周报》第42期上。

5月15日撰写《反对与黄色工会斗争中的机会主义》一文。6月1日，此文署名“金生”发表在《红旗周报》第43期上。

5月18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在会上传达职工国际八次会议决议。

5月21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会议讨论了纱厂工人斗争及女工工作等问题。

5月30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会议讨论了海员总工会的工作报告等问题。

6月上旬出席全总常委会。会议讨论了工联的工作报告。

6月3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会议讨论了沪西罢工斗争报告提纲。

6月8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上海电话工人的罢工斗争问题。

6月12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会议讨论了进一步开展外省工作的问题。
6月18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向会议报告就任全总党团书记后的工作情况。

6月25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会议讨论如何开展青工工作问题。

6月27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向会议报告国民党第四次“围剿”苏区的情况及党领导的反“围剿”工作。

7月9日、12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讨论上海虹口10家缫丝厂工人的罢工斗争。

7月28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会议决定取消中央职工部，将人员并入全总。

7月31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传达中共临时中央为加强全总党团，取消中央职工部，将人员并入全总的决定，以及《中央关于失业工人运动的决议》。

8月10日起草《中华全国总工会改组后的工作报告》。

8月18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会议讨论了上海纱厂工会纲领。

8月21日主持全总党团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了宣传部的检查工作的报告。

8月27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向会议报告了上海日本纱厂工人斗争的情况。

8月28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向会议通报全总反帝工作情况。

8月撰写了《关于瓦解黄色工会与建立革命反对派的组织》一文。

9月7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会议讨论了工作方式转变等问题。

9月11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在会上作《关于黄色工会与革命反对派的工作报告》。

9月13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会议通过了《全总九一八告民众书》和《告在业、失业青工工友书》。

9月14日出席全总党团会议。会议讨论了全总关于苏区组织系统的指示信。

9月28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会议讨论了中央关于失业工人运动的决议，以及秘密工作等问题。

10月11日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起草的《反对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发出。

10月21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会议讨论了十月革命示威问题。

10月23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向会议作海总工作的书面报告。

11月13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在会上报告十月革命节前后上海部分工厂、市政、报馆及海总工人斗争的情况。

11月14日起草《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检查上海纱厂工会青工代表会工作以后的决议》。

12月23日夜受党组织委托，到北四川路鲁迅寓所，接出在此避难的瞿秋白夫妇，并同鲁迅会面。

1933年28岁

1月17日同博古等由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任中央党务委员会委员、全总党团书记。

1月下旬与刘少奇到长汀检查指导工会工作。

2月25日出席中华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在瑞金叶坪召开的闽赣两省职工

联合会委员长联席会议，研究解决社会保险、扩红支前、生产建设等问题。

3月13日中央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瑞金洋溪开学。陈云到校讲授工人运动史。

4月16日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国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

4月25日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第9期发表《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

5月1日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国店员手工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

夏为响应中共中央发出的“创造100万铁的红军”的号召，与刘少奇向中央局提出，以全总的名义，号召中央苏区工人带头参军，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

6月到福建汀州视察工作。

6月30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机关报《苏区工人》第3期上，发表《在纠正工人经济斗争“左”的倾向上我们所作的错误》一文。

7月15日在《斗争》第18期上，发表《怎样订立劳动合同》和《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两文。

7月 出席在瑞金举行的中国纸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

8月1日出席在瑞金城郊竹马岗举行的庆祝八一建军节盛大阅兵典礼和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中央警卫师）誓师授旗仪式。

8月22日在《斗争》第23期上，发表《克服工会工作的落后》一文。

9月1日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国苦力运输工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9月视察岗面红军兵工厂和塞上红军兵工杂械厂。

12月5日、12日在第37期、38期《斗争》上连续发表《粉碎五次“围剿”面前临近苏区的白区工作》一文。

12月25日在《苏区工人》第5期上发表《福建组织“人民革命政府”与赤色工会在福建的任务》一文。

1934年29岁

1月15—18日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会上作《白色区域中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报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

1月22日出席在瑞金沙洲坝中央大礼堂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式，在会上当选为主席团成员。

2月1日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式。在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2月2日在《斗争》第45期上，发表《为收集粮食而斗争》一文。

2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17人组成的主席团。

4月28日在《斗争》第57期上，发表《红五一前夜的全国无产阶级伟大的战斗》一文。

5月5日、15日在《斗争》第58期、59期上，连续发表《福建事变中党在福建的职工运动》一文。

5月15日在《苏区工人》第16期上，发表《上海100个绸厂的总同盟罢工》一文。

6月7日为中共中央编印的一本内部学习小册子撰写前言，题为《建立白区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

夏受中共中央委托负责军事供给和各项生产的管理工作。

8月1日出席在瑞金大埔桥红场举行的中国工农红军成立八一纪念阅兵典礼和“抗日宣誓”大会。

9月14日在《斗争》第72期上，发表《游击区域（被敌人占领的区域）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一文。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分别从瑞金、于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后陈云受中央委派到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

10月18日随红五军团从曲利出发，开始长征。

10月20日午后，前往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出席营以上干部会议，向干部们传达了当时的形势及第十三师的任务。

10月21日随红五军团在赣城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11月8日随红五军团十三师从汝城以南的天马山到城口间，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

11月15日随红五军团十三师从湘南郴州良田与宜章之间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

12月1日随红五军团渡过湘江。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

12月上旬随红五军团翻越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

12月18日中革军委决定，军委第一、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

1935年30岁

1月1日出席在猴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重申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1月2日同刘伯承率军委纵队渡过乌江。

1月9日同刘伯承率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任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1月15—17日出席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等对“左”倾错误的批评，支持恢复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陈云在会上被指定为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者之一。

1月下旬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和地方工作部部长。在行军中除注意干部和地方工作外，曾多次受中央委派往来各军团之间，传达中央及军委的命令。

1月29日随中央红军主力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

2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为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发布《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斗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陆续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决议。

2月中旬至3月上旬向部队传达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

2月18日至21日随中央红军由四川古兰县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回师黔北。

3月16日至17日随中央红军在茅台附近西渡赤水河（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

3月21日至22日随中央红军由古兰县二郎滩、太平渡东渡赤水河（四渡赤水）。

5月3日晚，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率军委纵队赶到金沙江皎平渡，在北岸组成渡江指挥部。毛、朱、周直接指挥全军的渡江工作。陈云任渡江指挥部政治委员。

5月12日同刘伯承率军委纵队到达四川会理县城郊的铁厂。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5月22日在冕宁县政府接见中共西昌特支成员陈野萍。

5月24日率军委纵队经大桥镇进入彝族区。

5月31日当晚，出席在泸定县城附近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并取得上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红军及遵义会议情况。

6月5日在长征途中撰写《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一文。

6月中旬在四川中共地下党员席懋昭的掩护下，从四川天全县灵关殿出发，经荣经、雅安、成都、重庆，乘船前往上海。

6月底到达上海。

8月上旬同陈潭秋、杨之华等人从上海出发，经海参崴，于8月20日到达莫斯科。此时，共产国际七大已临近闭幕。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接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及陈云、滕代远等人。

8月下旬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任监察委员会委员，化名史平。

秋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该文署名“廉臣”刊载在巴黎华侨组织主办的《全民月刊》上，尔后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并很快传到国内，在国统区流传。

冬进列宁学校学习，并在东方大学“八分校”任教。

1936年31岁

4月15日在《救国时报》上以“史平”署名发表《论中国学生的救国运动》一文。

6月20日同在苏的中共部分领导人联名在《救国时报》发表为瞿秋白牺牲一周年而作的纪念词。

10月1日在《救国时报》上发表《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奸细的活动》一文，署名“史平”。

10月20日在《救国时报》上发表《是真话还是谎话》一文，署名“史平”。

10月26日在《救国时报》上发表短文《一个深晚》，署名“史平”。

10月30日在《救国时报》上发表《“诚意”和“基本准备”》一文，署名“史平”。

10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织赴新疆迎接西路军的代表团。陈云任团长，滕代远任副团长。本月，由莫斯科乘火车出发，到达阿拉木图（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

11月上旬由阿拉木图到达中苏边境霍尔果斯。在一个小镇的红军家里停留了三四天。因生病，由随行人员送回阿拉木图，休养一个月左右。

12月8日病愈。返回中苏边境霍尔果斯。不久发生西安事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陈云等在此停留，等候指示。

1937年32岁

4月23日从中苏边境乘坐新疆督办盛世才派来的汽车，经伊犁抵迪化（今

乌鲁木齐)。

4月下旬出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与盛世才商谈接应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进新疆，取得成功。

5月1日带着几十辆装有枪支、衣服和食品的汽车到达新疆与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当日，带领西路军余部离开星星峡，途经苦水、哈密、七角井、鄯善、吐鲁番等地，于7日到达迪化。

5月根据当时新疆的政治形势和盛世才的要求，为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陈云等决定，西路军余部对外称“新疆督办公署新兵营”。陈云任“新兵营”党代表。

同月在“新兵营”中开展调理身体、清理经济、整顿思想的工作。

6月将“新兵营”指战员按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丙班，组织他们进行语文、算术两种主要课程的学习。

7月同滕代远及李先念、李卓然研究决定，对西路军左支队进行整编。

夏由于形势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决定西路军余部不去苏联学习，而留在新疆学习。陈云号召指战员们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军事技术、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在他的领导下，部队掀起了学习热潮。

8月5日在《救国时报》上发表《捐赠 随军西行见闻录 版权启事》，署名“廉臣”。

秋通过各种渠道，详细调查盛世才驻迪化部队的机械化装备情况和军官学校的教学能力；并提出请盛世才和苏联教官帮助“新兵营”学习、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要求，得到苏联顾问巴宁中将的支持和盛世才的同意。

10月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党代表。

深秋“新兵营”文化课学习暂告一段落，开始转入学习机械化装备。陈云对“新兵营”机械化装备的学习作具体安排。

11月同盛世才达成协议，用盛的名义，以苏联的教官和装备，为我党培养航空技术人才。

11月27日离开迪化，经兰州办事处，29日返回延安。

12月9—14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增补陈云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12月29日在延安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提出统一战线的口号》的演讲。

12月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汇报派人到盛世才航空队学习航空的意见及计划，得到批准，中央决定由陈云和中央组织部负责这项工作。

丛书献词

我们在近现代中国悲壮而撼人的历史画卷前肃立、沉思！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一个个名字不停地闪烁，一条条对理想苦苦追求的轨迹清晰地呈现。

如果有人问：谁的理想最宏远，谁的追求最理性，谁在中华民族的自救和解放道路上洒下了最多的热情与鲜血？历史已经昭示，那就是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面对着这一代震古烁今的共产党领袖们，我们常想：同处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为什么他们能走出封建中国凝重的历史和文化壁垒，在改造社会中不断抛弃旧我，完善新我？为什么他们会有如此宏大的理想，如此不屈的求索精神，如此撼人的牺牲精神？为什么他们能脱颖而出，成为领着中华民族走向独立与富强的领袖，成为我们这个悠久、灿烂而又一度落伍的古老民族的脊梁？

我们企望沿着他们从平凡走向伟大所留下的履迹寻求答案。

我们努力地求索。

我们坚信，这中间蕴含着一个不屈民族永恒的内力。

我们还坚信，中华民族走向明天的灿烂与辉煌，依旧需要这种永恒的力量。

《伟人之初》丛书，正是我们这种努力的记录和结果。如果青年朋友们在与这些也曾从年轻时代走过来的伟人们的心灵对话中有所启迪的话，那末，这就是对我们这种努力和追求的最大鼓励。

《伟人之初》丛书编委会

陈云

一 自强不息的少年

故乡

陈云的故乡在青浦县练塘镇。

青浦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它位于上海西郊，太湖平原东侧，形如彩蝶。因境内有青龙江，东部又有五浦（赵屯、大盈、顾会、盘龙、崧子）汇于吴淞江，故名青浦。全县地势低平，东片河港交错，西片湖荡群集；西北部跨越青浦、昆山两县的淀山湖，烟波浩淼，是上海最大的淡水湖。因水源丰富，气候适度，雨量充沛，此地又以“鱼米之乡”著称。

青浦历史悠久。7000年前这里已经成陆，6000年前已有先民居住。他们在青浦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崧泽、福泉山、寺前村、金山坟等几处古文化遗址的发掘，特别是崧泽古文化遗址中土层出土墓葬中的大批文物和生活、生产遗迹，证实了这些延续约900年左右的古文化，为前承马家浜文化（6000年前），后接良渚文化（4000年前）的“崧泽文化”，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典型的原始社会文化。专家们还由此断定，青浦地区是上海迄今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的聚居地。

练塘镇是青浦县三大镇（青浦镇、朱家角镇和练塘镇）之一，旧名章练塘，相传因五代闽国高州刺史宋仔钧与妻练夫人居此而得名。

练塘镇呈长方形，东西走向。镇的东西南北，各设水栅为障，四周绿水青山，平林修竹。镇内有三里塘，贯穿全镇。两岸是街道，长达1.5公里。北岸称上塘街，南岸称下塘街。河上有桥八座，连接上、下塘街。练塘经济向来较为发达，并以米业为主。解放前，镇上先后开设7家碾米厂，太平桥左右为米市，上海及杭、湖、虞的贩米船，多停泊于此，热闹异常。从新街到湾塘，每至早市，舟楫塞港，乡人云集，街道摩肩，一片繁盛景象。除此之外，镇上还设有油坊、槽坊、饴糖等作坊和农具、日用家具等手工业品店铺，有榨油、磨面、发电厂各一家。

陈云故居位于练塘镇的下塘街。这位世人皆知，在中共两代领导核心集体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就是在这样一块经济和文化都较发达的地方，度过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的。

父母双亡的苦孩子

陈云，号怀民，1905年6月13日诞生于青浦练塘一户贫苦人家。家里既无田地，又无房产。父亲陈梅堂，是个朴实的庄稼汉，有一套种田本领，空闲时也捉鱼摸蟹，或帮人宰猪。母亲廖顺妹，祖籍广东，其父早年参加太平军起义，以后转战在江南一带，太平军失败后，落户练塘地区；外祖母系本地人，生有一女二男，陈云的母亲排行老二。廖家也十分清苦，主要靠陈云母亲和外祖母的针线活度日。

陈云在家排行第二，上有一个姐姐，名陈星，年长他8岁。陈云2岁时，父亲病故，全家靠母亲帮人做散工及缝衣为生，生活极其艰苦。但就是这样的日子，他也没过上多久。4岁那年，母亲积劳成疾，也离开了人世。从此，陈云和姐姐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外祖父怜惜他们，把姐弟俩接了过去，和舅舅、舅妈一起过。舅舅、舅妈因膝下无子，便认陈云作儿子，改姓廖，名陈云。

陈云的舅舅廖文光，俗名龙相，心地善良，性情温和，爱好文艺。起初，舅舅做裁缝，后因生意清淡，改经营小饭铺，勉强维持生计。舅母是个和善

而且能干的妇女，除了操持家务，有时也给人家缝缝补补，以贴补家用。陈云过继过去后，廖家喜添一子，起名廖倪云。倪云有先天残疾，跛脚，两手均有风湿，身体很弱。

陈云舅父一家所住的小屋原为练塘镇下塘街18号，现为19号。小屋分前后两间，沿街一间街面房原是舅父做裁缝活的场所，后在屋里摆了张四方桌，几条板凳，砌了个灶头，当做小饭铺。里进一间是舅父母和表弟的卧室。卧室上方搭有一阁楼，原来堆放杂物，陈云姐弟来到练塘后，便住在阁楼上。

陈云自幼丧父失母，过早领略了人间的悲苦。他性格内向、沉静。据他幼时的伙伴回忆，其他孩子在一起玩耍、嬉闹，而陈云总是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陈云自小非常懂事，知道体恤大人的辛苦。舅母手脚均患有风湿病，手臂力弱，陈云便主动当了舅母的小帮手。小饭铺劈柴、洗菜之类的杂活，他都一一承担了下来。因陈云安稳、懂事，舅舅和舅妈都很喜欢他，把他当作自己亲生的儿子对待。

勤奋学童有人助

1913年，陈云满8岁了，舅舅送他到练塘镇刘敏安私塾接受启蒙教育。私塾学生不满10人。小学生们读传统的《三字经》、《百家姓》等书，每天要写毛笔字。陈云年龄虽小，但很听老师的话。他认真读书，用心写字，毛笔字写得很端正。刘敏安老先生很器重陈云，有时还专门深入浅出地给陈云讲授处世做人的道理，使陈云很受启发。

1914年，9岁的陈云被舅舅送到练塘镇西市城隍庙貽善初等小学读书。貽善小学设在城隍庙内，离廖家仅数十米，穿过两座石桥便是。

城隍庙建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有头门、戏台、大殿、后殿、寝宫等建筑。崇祯年间，以“昭示报功之典”，朝廷封故四川布政使沈恩为青浦县城隍。圣旨（绫质）置放在御书楼内。清乾隆十年（1745年）起，在大殿东偏建有觉堂、得月轩、歌熏楼等，供香客憩息，到乾隆四十五年，初具规模，取名“灵园”。嘉庆年间，“灵园”易名“曲水”，成为一处胜境。咸丰年间（1851—1861年），庙内大部分建筑被清军和华尔洋枪队的炮火所毁。光绪十年（1884年），庙与曲水园次第修复。

庙内的城隍像，浓眉大眼，留着三绺髯须，冠笏整齐，甚是庄严。像身上披着大红锦袍，熠熠生光。侧殿里坐着和善的土地公公，留着白须，拄着拐杖，显得有些委顿。这里原本是练塘镇上善男信女烧香问卦的地方。1906年，练塘镇一些开明士绅商定在镇上开办学校，为解决校舍，便决定利用城隍庙。于是，庙内的城隍、土地等神像被挪到正殿的一隅去，保持一角供奉香火的地方，其余的地方排上桌凳，挂上黑板，充作传授知识的课堂。貽善小学就这样诞生了。

陈云在校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天资聪颖，又虚心好学，认真仔细，所以，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老师对他十分赞赏，同学们也很愿意同陈云接近。陈云品格端正，诚挚待人，特别是对班上一些贫寒的学生，他总是尽自己所能去帮助他们，因而深得同学们的信赖。

陈云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他并不因为自己上了学，而推脱家务劳动。下课后，他仍帮助舅父母劈柴、烧火、洗菜、担水以及打扫屋子等。做完这些家务后，他便抓紧时间刻苦学习，很少与邻家的孩子一起玩耍。陈云好学，不仅使舅父、舅母感到欣慰，也受到街坊四邻的夸奖。他们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常常以陈云为榜样，希望自己的孩子像陈云一样，用功读书。

1915年春，陈云初小毕业。他虽然很想继续读书，但由于家境贫寒，舅父无力再供他上学，只得辍学回家，在小饭铺烧火、打杂，照看体质孱弱的表弟。每当陈云看到邻家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心里总是十分难过，他在学校一直是成绩优秀的好学生，他是多么希望把学业继续下去。但他知道舅舅、舅妈生活艰难，因此，虽然心中十分羡慕其他孩子读书，可总是默不作声。

廖家小饭铺有一位常客，叫杜衡伯，又名杜枢，青浦县新桥乡（今大盈乡）人。辛亥革命后，他受聘任练塘镇公立颜安国民小学第一任校长，是当地比较有名的教育家。他长期在乡镇地区从事教育，培养出不少人才，人们都很敬重他。在小饭铺里，他常常见到一个少年蹲在灶前烧火。他是个有心人，便问起陈云的身世来。交谈中，陈云口齿伶俐，记性很好，初级小学的知识对答如流，这引起了杜先生的注意。杜先生从龙相那里了解到陈云辍学的缘故，他觉得让这样一个聪明的孩子辍学在家烧火十分可惜，便向龙相提出，要免费收陈云到颜安小学高小部继续学习。杜衡伯的慷慨和真诚，使龙相十分感动，他答应送陈云到颜安小学继续上学。陈云终于重返校园。

1915年秋，陈云入颜安小学高小部读书。

颜安小学前身是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开办的颜安书院，民国初年（1912年）改为小学。

颜安小学具有比较浓厚的书院气息。校园坐南朝北，校舍用青砖瓦砌成，环境古朴、幽雅。大门口盘花的铁条门上包着铁皮，墨绿色油漆有点暗淡，显示着这座庭院年代久远。铁门两旁的矮墙上爬满了青翠的藤蔓，点缀着白垩粉刷的墙壁。跨过大门是一条长长的通道，通道两侧各有三间厢房，一侧是教员寝室，另一侧是饭间和杂物储藏室。通道尽端是个场地平整的大庭院，庭院里三株百年银杏亭亭玉立，枝干舒展，绿叶茂密，给这座具有浓厚书院气息的学校增添了不少生气。庭院南端是一排砖瓦平房，一色的木门木窗。中间一间是教师办公室，东西两侧各有两个大教室。院子东边有个侧门，黑漆着色，门口一对石狮，显得十分肃穆和庄严。这门平日紧闭，逢到重大节日才敞开。

颜安小学是一所古老而又新生的学校。这所创建于光绪年间的书院，原是为了培养朝廷需要的经世济国人才而设置的。书院传授的是经史子集，老师都是熟谙经书的饱学之士，他们无意于仕途，而专心传道授业，培养学生。辛亥革命后，学校改为国民高等小学校，按照新式学校的编制，调整了课程设置，增设了体育课，在学生中建立了童子军组织。学校又陆续聘请了一些接受新文化的老师来校授课，新的思潮也就不断涌进这所古老的学校。课堂里不但讲授古老的文字，而且也传播着各式各样的新思想。

陈云是个沉静、爱思考、对知识如饥似渴的学生，加之他在贻善初小打下的良好学习基础，到颜安小学后，他很快适应了这里的教学方法和进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他为人正直，待人热情，做事有主见，虽然在同班同学中年龄最小，但同学们都很敬重他。在学校，他连年获品学兼优奖状。

这所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学校，对陈云文化知识的积累，思想品格的磨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学校里，陈云学到不少古典文学的基础知识，他能流利地背诵《古文观止》中有名的篇章，也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陈云始终不忘杜衡伯老先生和颜安小学对他的帮助和培养。1921年，高小毕业已两年的陈云和部分同学集资，为校长树了石碑，并在石碑上刻下自己的名字。1955年5月，身居国务院副总理职位的陈云去南方调查农村情

况时，特地回乡访问了母校。1986年，当他得知颜安母校希望他题写校名后，立即答应了下来，欣然命笔题名。

江南文化的陶冶

陈云性格沉静，对孩子们嬉笑打闹的游戏，他不感兴趣，自小便喜爱上了江南丝竹和评弹。

江南丝竹早在清代中叶就开始在青浦流行。所谓“丝竹”，系指二胡、琵琶、三弦、秦琴、曲笛、箫、笙等丝弦竹管乐器，音色清丽柔美，音响细腻典雅。其代表性曲目有《中花六板》、《三六》、《行街》、《慢三六》、《慢六板》、《云庆》、《欢乐歌》、《四合如意》，俗称八大名曲。

在城隍庙西侧，有座隐真道院，始建于明嘉靖年间。隐真道院属正一道派，与全真道派不同，道院内除了几名出家道士外，多数是俗家道士，每逢斋期，才齐集拢来，平时就由几名出家道士留守院内。有时应施主邀请，道士们便道冠穿戴整齐，赶去设醮做场。道士诵经很重视乐器伴奏，所以，他们不仅要背诵经文，还要学得一手娴熟调弄丝竹的本领。

隐真道院离陈云舅舅家约50米，在上塘街中市，隔河相望。院内幽雅的乐声，深深吸引着陈云。做完功课和家务后，他常到道院请求道士们教他拉二胡，吹笛子和箫。

道士中有个叫万隆泰的，又名万秉璋，幼年时因家贫被卖给道院，比陈云年长8岁。万母曾和陈云的母亲结拜为姐妹，陈云幼年时，曾受到万家的照顾。因而，陈云和万隆泰相处得很好。陈云到道院多是去找万隆泰，万将丝竹技艺传授给他。陈云是个重感情的人，他一直不忘年少时所结下的这段友情。解放后，陈云曾几次去练塘，看望万隆泰，并寄钱给他。

陈云既聪明，又勤奋，很快就学会了拉二胡、吹箫和笛子。有时他自拉自唱。荡气回肠的二胡声和着陈云稚嫩的少年之音，给练塘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空闲时间，陈云除了学拉二胡、吹笛子和箫外，还特别喜爱听评弹。评弹发源于苏州，流行于江苏、上海和浙江地区，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积累了近百部传统长篇书目，是江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说唱艺术。

练塘镇有个畅园书场，开设于清朝末年，就在混堂浜，离陈云舅舅家仅30多米。民国初，畅园边上又造了一个书场，名“长春园”，这书场有200多个座位。书场为了招揽听众，每天上午派个伙计，掬着一块写有当天书目及艺人姓名的木牌，敲着小锣在全镇上塘街、下塘街兜一圈，有些孩子就兴致勃勃地跟着这伙计走。有时，陈云也兴高采烈地跟在人群后面。书场一般每天开日夜两场，听书的人进去后，选择最佳位置坐好，跑堂的泡上一壶茶，并向听众收取茶资，书场与艺人以四六开或对半折来分配茶资收入。书场的小台仅一尺高，台上一张书桌，两把椅子，面对书场大门。大门两旁墙壁前，有一排钩子，专为农民听书时挂篮子用。陈云小时候，有空就站在书场后面，靠在墙壁上听书，这样可以不花钱，人称听“靠壁书”。

陈云的记性很好，每次听的虽是“靠壁书”，但他回到家基本能将故事原原本本他讲给舅舅、舅妈、姐姐、表弟听。班里的同学也十分爱听陈云讲故事，因为他听的书多，肚子里故事就多，讲起来又很生动。陈云特别爱给同学们讲太平天国的革命故事，讲《水浒》中杀赃官、救百姓、景阳冈武松打虎、野猪林搭救林冲等故事。同学们常常是听得出神，有时连上课铃响也没有听到。

陈云从听书中积累了许多知识，而且，那些杀富济贫的壮士豪情，深谋远虑的谋上智慧，使陈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真善美的教育。

陈云对评弹的爱好，一直保持到晚年。1958年以后，他利用公余和休养时间，听了大量的评弹书目，广泛接触评弹艺人、创作人员和领导干部，对评弹艺术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发表过许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意见。这些意见后被编辑为《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1983年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爱国激情

1917年，12岁的陈云，为了学习专业技能，以便将来谋求生计，从颜安小学转到距练塘20多公里的青浦乙种商业学校读书。

青浦乙种商业学校地处青浦新县场魁星阁（即文昌宫，现为青浦第二中学），1912年3月初创时，是高小性质的学校，除一般高小课程外，设有农科和商科。1916年学校取消农科，改为县立乙种商业学校，以授予青少年较简单的生产知识和技能、使之具有从事某种职业的能力为办学宗旨。学校每学年仅招一班学生，共30至40人，学制为三年。

青浦乙种商业学校离练塘镇较远，陈云只得寄住在青浦码头街8号一所中药仓库里，条件十分艰苦。龙相舅舅是无力供养陈云去读商业学校的，当时，主要是靠舅母的弟弟刘迪庚的资助。刘迪庚是船厂工人，没有子女。陈云小的时候，刘迪庚待他很好，经常给他一点零用钱。陈云上高小后，刘迪庚更关心他了，希望他将来能有一技之长，因而资助他去读商业学校。但终因经济力量薄弱，陈云在青浦乙种商业学校求学不满两个月，就停学回练塘了。

1918年，陈云回颜安高小部继续读书。这时陈云已年满13岁，他开始用自己的头脑去观察和思考这个世界。在思想开始躁动的这段重要时期，颜安小学的张子恭老师给了他很多启发。张子恭是本地柳东人。他讲课不仅语言流畅，生动活泼，而且旁征博引，不时介绍些当时重大的社会变革，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维新运动、八国联军的入侵、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等。这些知识大大地开阔了陈云的视野。从张老师讲授的知识中，陈云和同学们开始懂得青浦的洋教堂、练塘的日本货都是帝国主义经济和文化侵略的产物，在他们远离城市的这个小镇，也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掠夺和压迫。

陈云成长的年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19世纪中叶以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华民族陷入苦难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中。近代中国是带着八国联军侵占京都的民族耻辱进入20世纪的。陈云自懂事起，就耳闻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国土上横行霸道的强盗行径，心里深感愤懑不平。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心中民族自强的情感日益强烈。

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这实际上是由当时世界五强即美、英、法、日、意五个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重新瓜分世界的会议。参加这次和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提出取消外国在中国的某些特权、取消“二十一条”的正义要求，但都遭到列强的无理拒绝。会议竟决定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和会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入京时被德国掠夺去的天文仪器而已。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

发。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在中华大地迅速蔓延。

青浦人民素有反帝反封建的光荣革命传统。早在 1848 年，青浦就发生过运送槽粮的船夫痛打英国传教士的“青浦教案”。1853 年，周立春、周秀英领导塘湾农民开展抗粮斗争，继而发展成为上海小刀会起义的一支重要力量。1862 年，太平天国官兵在青浦重创华尔率领的洋枪队，一时有“铁青浦”之称。1911 年辛亥革命和 1913 年“二次革命”时期，青浦有识之士高举义旗，纷纷响应。所以，当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青浦后，青浦的革命知识青年和爱国群众纷纷响应。青浦教育界开始罢课。5 月 9 日，青浦各校师生响应全国学联的号召，举行声讨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游行示威。11 日，青浦县教育会发动全县各校停课三天，上街宣讲国耻，并致电江苏督军、省长，要求北洋政府开释学生，罢免奸贼。

青浦商界亦相继罢市。6 月 8 日，青浦县城商会邀集商界人士开会，专门商讨抵制日货的问题，并作出四条决议：（1）变卖民国元年商团购买的洋货；（2）通电北京，声援学生运动；（3）提倡国货，抵制日货；（4）从商界、平民界以及法学困等群众组织中推派代表到各船埠对过境和到站口客轮或货船进行逐一检查，倘查有日货，即行焚毁或议罚。城厢镇一些有学之士，还撰写了《商会警告》、《泣告同胞》、《留心灭种》、《劝用国货》等醒目文章，响亮地提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等口号。

陈云所在的颜安小学也积极投入这场爱国运动的洪流之中。当时，陈云已是高年级学生，他品学兼优，又有极好的口才，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望，是学校组织的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活动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和一些老师同学一起，把颜安高小部师生组成童子军和救国十人团及宣传队，连日赴小镇街头、明园寺、小蒸、柳口等地发表演讲，表演短剧。据陈云幼年的同学回忆，陈云与同学们在练塘附近的乡村游行、演讲。他们用带着童声的语言，向乡亲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罪行，号召大家抵制日货，不吃日本来的干贝，不穿东洋纱织的洋布，不玩用日本原料做的赛璐璐玩具。他们侃侃的言辞，义愤的神情，不时博得群众的掌声，有些群众情不自禁地跟着颜安小学师生振臂高呼“打倒袁世凯卖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辱国条约”、“收回青岛”、“睡狮快醒”、“不要做东亚病夫”等口号。

颜安小学所用的宣传经费都是陈云和同学们自筹的。孩子们把自己平时积攒的一个铜板、两个铜板都捐献出来，买纸张，做小旗。他们还发起了爱国贮金会，到街头募捐，为反日宣传活动筹措资金。

颜安小学在这场不平凡的爱国运动中展现出它生机勃勃的风貌。陈云虽年少，但已初露出他非凡的组织才能和沉着、坚毅的性格。爱国运动的洪流将他内心稚嫩的爱国之情，凝聚成坚定的报国之志。从此，陈云经常以“有志者事竟成”的格言勉励自己，更加刻苦地读书和学习。

走向社会

1919 年 5 月底，陈云从颜安小学高小部毕业。在人生的道路上，他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这时他已 14 岁，对自己今后的生活道路有了一些考虑。他内心十分感激这些年来龙相舅舅对他的供养和社衡伯校长的无私帮助。但他感到有志的青年不能老是靠着别人过日子，何况舅舅家境并不宽裕，舅妈体弱多病，表弟年纪尚小，自己应该在家里多承担一些责任，不能再加重家里的负担。所以，他放弃了继续求学的念头，但又不甘于在家当个饭铺的小伙计，碌碌无为地荒度时光。

就在陈云十分苦闷、困惑的时候，张子恭老师找到了他。原来杜校长十分关心陈云，要求老师们设法安置他。张子恭是陈云的老师，本来就很欣赏陈云勤奋刻苦的精神和他的才干，又深知他的身世和家境，对他抱有深深的同情之心。正好张子恭老师的弟弟张子宏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于是他就托弟弟介绍陈云去商务印书馆当学徒。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出版社，1897年创办于上海，最初印刷商业簿册，故名“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夏瑞芳善于经营，印书馆由印刷簿册转为出版教科书、工具书、科学和文学著作。不久，清朝进士张元济（曾任刑部主事）因参加戊戌政变遭革职，由官场进入商务印书馆，创办广有影响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先后影印了《四库珍本》、《（四部丛刊）续编》、《百衲本二十四史》，排印了《万有文库》和《丛书集成》等，并出版大型辞书《辞源》，商务印书馆因而名声大振。陈云到商务当学徒，既可以解决生活问题，又能有机会多看一些书，多接触新事物，开阔视野，所以，当张老师把这一消息告诉他时，他心里高兴极了。他深深感激老师对他的关怀、理解和帮助。

1919年11月26日，陈云告别了抚养他的舅舅和舅母，告别了和他朝夕相伴的姐姐和表弟，告别了培养、教育他的杜衡伯校长和老师们，告别了同窗几载、亲如手足的幼时朋友和同学，在张子恭老师的陪伴下，登上了东去上海的小船。

在东去的小舟上，陈云久久凝望着养育他的练塘镇，心里很不平静。在练塘的14年，是他人生道路的开始阶段。这14年，他过早地尝到了世间的悲苦和辛酸，也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情和友爱。他虽只有14岁，但不幸的身世已使他有了较为丰富的人生阅历，知识又给予了他理性，爱国运动拓宽了他的胸怀。

陈云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已开始迈出坚定的脚步，一个远大的理想正在他充满生机的心中萌生！

二 步入革命家生涯

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

陈云初到商务印书馆时，被分配到发行所文具柜台做练习生。时值开学前后，店里生意很忙。陈云虽然是刚来的学徒，老板却把他当成人使用。柜台很高，陈云的个子却比较矮小，仅比柜台稍高一点。一些老职工很为他担心，怕他做不了卖货的工作，就对文具柜主任说：

“廖陈云做这事恐怕不行吧？”

“试试看吧！”文具柜主任勉强地说。

陈云是一个不怕吃苦，勇于克服困难的孩子的。为了卖货方便，他在柜台前放了条凳子，自己站在上面给顾客取东西。陈云的悟性很高，很快便熟悉了业务，文具柜内的事情他都能料理妥当。特别是陈云待人态度诚恳、谦虚，对那些比自己年岁大的人，他一律尊敬地称呼先生，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总是主动问别人。因而，来店不久，他就受到师傅和店内老职工的信任和称赞。

陈云年纪虽小，却很有志气。在当学徒期间，他不仅很快熟悉了业务，而且抓紧业余时间自修，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营业时间长达12个小时，早晨8点钟开门，晚上8点钟收市，加上路上往返时间，实际上要超过十四五个小时。一天工作下来，疲惫不堪，所以，工友们回到宿舍就都早早地歇息了。陈云却与众不同，他在宿舍总是最后一个休息，最早一个起床。每天清晨天未放明，他便起身读书、习字。下班后他去补习班学习中文和英文，课后到宿舍继续学习，直到深夜。

在商务练习生中，学习英文和毛笔字是比较普遍的。陈云除了刻苦学习英文和习字外，还选读其他书籍。他当时读的书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选择一些文化知识书籍，充实自己的知识；二是研读一些政治书籍，以认识社会，探求救民强国的真理。起初，他看了一些介绍三民主义的书，感到道理蛮多；以后又看了国家主义派的书，很相信他们说的“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这些书籍使陈云头脑中产生了不少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青年工人的益友

据商务的一些老工人回忆，陈云自到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后，不管工作多忙、多累，始终坚持自学。在商务印书馆的青年当中，他是学识最渊博，最有志向和抱负的青年人之一。因而，在青年工人中，陈云的威信很高，受到他们的尊敬和信赖。

在商务的练习生中，陈云的年龄差不多最小，可他却显得成熟，有头脑，对生活有着正确的态度和追求。当时，商务印书馆有一种奢侈的生活风气，有不少青年职工和学徒都受到了沾染。陈云来后，不但丝毫没有受坏风气的影响，而且还时常勉励周围的伙伴：“青年人应当奋发有为，做些对民众有益的事情，这样生活才有意义。”他还说：“一个青年人，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安排得是否得当，对一个人的前途很有关系。”他劝青年同事们不要沉湎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腐蚀自己的意志，残害自己的身心，而应当多看些有益的书。

陈云虽从小离家，但独立生活能力很强，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除了尽责奉职、勤奋读书外，他每天还要抽出一定的时间进行有意义的娱乐活动。最初，有的工友不大理解陈云学拉胡琴这件事，就问他：“你不是常说应当抓紧时间多看些进步书籍吗？我看你读书已经够累了，怎么还花时间学拉胡

琴呀？不会用那时间歇歇吗？”

陈云听后笑了，解释说：“学习拉胡琴正是为了更好地休息呀！我们的生活很苦，很单调，没有什么娱乐，学会了拉胡琴，空时大家拉拉唱唱，兴奋兴奋精神，对身心不是很有益处吗？这是积极的休息。”

陈云还常对周围的伙伴说：“我们应当认真看些有意义的书，也应当学会过正当的生活。我们要掌握环境，掌握生活，不要做环境和生活的奴隶。”陈云这种正确积极的生活态度，丰富多采的生活情趣，深深地感染着他身边的伙伴。

陈云生活十分俭朴。那时，学徒的月薪很少，第一年两元，第二年四元，第三年六元。陈云非常懂事，他从不乱花一分钱，省吃俭用，将余下的钱一点点积攒起来，或寄给抚养他成人的舅舅和舅母，或去买一些有用的书籍。遇到有困难的同事，他又总是尽自己最大力量给予帮助。他这种克己助人的品格，给商务的同事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陈云待人谦和，而且一视同仁。商务学徒工中有个叫赵恨奉的，人很老实，反应较迟钝。有些青年同事经常拿他的弱点开心。陈云却和那些同事不同，从来不跟着大家起哄，对别人这种随便拿人取笑的做法很看不惯。陈云特别关心赵恨奉，和他很要好，经常讲些知识性的事情给他听，还经常劝大家不要寻他开心。在和其他伙伴相处时，偶有意见不一致，特别是对方意见明显不对的时候，陈云也从不急躁或大声争论，而是非常耐心地听对方把意见讲完，然后分析情况，说明道理，直到对方口服心服，高兴地接受他的意见。

陈云不怕困难，做事很有主见。就拿学拉胡琴这件事来说，他也遇到不少困难：一是他没有良好的乐理基础；二是时间少；三是没有练习场所，住在集体宿舍，拉琴必然会影响别人。但这些困难他都一一克服了。为了不影响别人学习和休息，陈云便到楼顶凉台上去练习拉琴，冬天有时下着大雪，他冒雪在凉台上坚持练习。学拉胡琴时，同事们时常给他提各种各样的建议。这个要他按照甲派调子拉，那个要他按照乙派调子拉，每当这时，陈云总是向提建议者投以善意的微笑，婉言拒绝说：“不能那样啊！我现在连最基本的调子还没学会，应当按照老师教的步骤，先打好基础，以后再学专门的调子，不然就把老师的计划打乱了。”

商务印书馆的一些年轻人，从平日陈云处理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中，也感到他年纪虽小，但有很强的自制力。当时商务不少青工生活随意性很大，有时小菜好，就多吃一点饭，小菜不好就少吃。但陈云不管什么情况，总吃两小碗饭。一位伙伴为此有些好奇，就问陈云：“你怎么总吃两小碗饭？”陈云微笑着对他说：“吃饭忽多忽少对身体不好啊！”这件事很小，可给这位伙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几十年后，他在回忆中写道：“这虽是一件生活小事，但事后想想，这难道不也能说明陈云同志从那时候起，就很有自制能力吗？”

由于陈云有这些好的品质，加之他稳重、平和的气质，尊重人、理解人的处事态度，使他的人格显出特有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周围的青年工友，大家有事都爱找他说，也以和他做朋友为荣。

踏上革命征程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无产阶级最集中的上海诞生。随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工人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中国最

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当时已有工人 80 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近 1/3。上海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这里主要有由英国控制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日、英等国在这里开设了许多工厂，残酷地榨取中国工人的血汗，民族矛盾一直异常尖锐。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中是有工作基础的。那时，中共中央设在上海。共产党人以上海大学为重要据点，深入到工人中去做工作，先后在七个地区创办了工人夜校。1924 年夏，在邓中夏、项英等领导下，成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会员发展到近 2000 人，是推动上海工人运动重新走向高潮的群众性团体。1925 年 2 月，日商内外棉八厂工人因为日本监工殴打中国女工而罢工，迅速导致 21 家日本纱厂的 3.5 万名工人总罢工。这次斗争取得胜利，给了全国工人很大的鼓舞。

在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二月大罢工胜利的影响下，上海印刷界工人亦纷纷行动起来。1925 年 2 月 15 日，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工人为主，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简称印联），会址设在北浙江路华兴坊 24 号。5 月初，商务工人徐洪生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5 月 15 日，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大班枪杀工人顾正红，引起群众极大的愤怒。16 日，日商内外棉七、八、十二厂联合大罢工。5 月 24 日，在沪西潭子湾沪西工人俱乐部前的空地上，召开了全市性的追悼顾正红烈士大会。陈云和商务印书馆的部分职工怀着悲愤的心情参加了这次追悼会。5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工人的经济斗争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并定于 5 月 30 日在上海租界内举行反帝示威，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血腥镇压中国工人的罪行。

30 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援助纱厂工人的街头宣传演讲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向密集的人群射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大惨案。

这件事，激起了全上海以至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多少年来深埋在中国人民心里的对帝国主义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陈云与商务印书馆的广大职工以对帝国主义的极大愤慨之情，投身于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民族运动之中。

陈云和商务的许多青年工人除了参加罢工和示威游行外，还积极参加了上街卖《公理日报》的活动。《公理日报》是何刊物？陈云为什么要参加卖报呢？

事情是这样的：五卅惨案发生后，迫于租界当局的淫威，上海各报对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都没有作如实的报道。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一些青年编辑，对此十分愤慨，决定创办报纸来伸张正义，抗议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

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郑振铎、王伯祥、叶圣陶、胡愈之等，立即邀请少年中国学会、醒狮周报社、学术研究会、上海通讯图书馆、孤军杂志社、太平洋杂志社、妇女问题研究会、中华学艺社、中国科学社上海分社、中华农学会、文学研究会、上海世界语学会等 12 个团体的代表，商定组成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并以联合会名义主编《公理日报》。

6 月 3 日，《公理日报》创刊号正式出版，公开发行。报纸八开大小，排成四版。报头“公理日报”四个字由叶圣陶题写。报头下左角印有“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主编”字样。《公理日报》的编辑部和发行所，设在商

务主山路总厂附近的宝兴西里九号郑振铎的家里。办报的经费是大家凑集的。

《公理日报》反对和抗议英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的立场是极其鲜明的。该报说了其他各报不敢说的话，登了其他各报不敢登的消息，并不断发表文章敦促各大报纸采取鲜明立场，拒绝登载英商广告，还陆续列表刊出英货的商标、英国公司的名称，号召大家抵制英货。这种不畏强暴的精神，受到上海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普遍称赞。《公理日报》实际成为宣传、指导五卅运动的重要舆论工具，和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一样受到欢迎，日销2万份以上。

为了进一步扩大《公理日报》在群众中的影响，更快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商务印书馆的许多青年工人自动承担了卖报任务，陈云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每天，天蒙蒙亮，陈云和伙伴们就来到郑家门口，领取报纸。天一亮，上海的大街小巷便能听到他们“《公理日报》一个铜板”的叫卖声。卖报是很辛苦的，既要起得早，还要穿街走巷叫卖。6月，上海的天气已经很热，陈云和伙伴们常常是走得汗流浹背、腿软脚痛，喊得口干舌燥、声音嘶哑，但没有人退缩。《公理日报》从6月3日创刊，到6月24日停刊，共出了22期，陈云和伙伴们一直坚持卖报到最后一期。

陈云除了参加上街卖报的工作外，还积极参加馆里组织的募捐活动。五卅大罢工期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职工首先发起组织商务印书馆国人经济后援会，决定从6月1日起，省吃俭用，从工资中抽出一部分，捐给学生和罢工工人。印刷所和陈云所在的发行所的职工纷纷响应，也从工资中拿出一部分参加捐款。商务印书馆除参加捐款外，并献出一批书刊及文具赠送给学生。据当年的老工人回忆，陈云不仅把自己省吃俭用积攒的工资拿出来募捐，还组织一些青年工人上街动员和宣传募捐。1925年6月14日出版的《申报》有这样的记载：“商务印书馆已捐付1000元给上海总工会，后又捐付5000元给上海临时济安会，转给罢工工人和学生。印刷所工人也纷纷到街头宣传募捐。”

在五卅运动中，商务印书馆在舆论宣传和物质支援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陈云也在这场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和考验。特别是残酷的阶级斗争事实，使陈云对他原来信奉的三民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的主张产生了怀疑。为了解开对人生、社会和国家命运的许多疑团，陈云在进步同事的引导下，来到上海通讯图书馆。

上海通讯图书馆是进步青年应修人和楼适夷创办的，实际上是友人读书团体。参加团体的会员都拿出自己的图书，集中在一起，无条件外借，并对远道和外地读者采用通讯邮借的办法，以此为要求进步、坚持自学的青年服务。它不仅在图书馆事业中是新的创举，受到广大青年，特别是职业青年的欢迎，同时也在与群众的联系中，逐渐树立起明确的政治倾向。图书馆秘密推广共产党的书刊，并经常请党的领导同志、青年运动的指导者赵世炎、恽代英、杨贤江、沈雁冰等到图书馆作报告。上海通讯图书馆既是党团的秘密联络机关，也是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许多青年读者正是通过这个图书馆参加了革命。对他们来说，这个图书馆已成为革命的摇篮。

在上海通讯图书馆，陈云开始研读马列主义和苏联革命书籍，如《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辩证唯物论》、《唯物史观》等等。这些书在公开场合是不便阅读的，陈云有时就拿着书躲到厕所里去读，常常

读到疲惫不堪时，才去休息。这些革命书籍给陈云以根深刻的启迪，使他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陈云看了革命书籍以后，常把他读到的苏联革命故事，以及中国一定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争取全国劳苦大众彻底解放的道理讲给工友们听，并主动介绍一些有关十月革命或其他先进思想的书让工友们去看。

通过阅读革命书籍，特别是五卅反帝斗争的锻炼，陈云深深感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比三民主义更好，并逐步确立了只有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的政治信仰。

年轻的罢工委员会委员长

五卅运动后，上海工人运动有转向低潮的趋势，党中央准备再次掀起罢工高潮，以打击反动军阀政府。鉴于商务印书馆职工的革命觉悟较高，1925年6、7月间，中共上海区委派曾当过印刷工人的中共早期党员徐梅坤到商务印书馆组织临时党团，党团成员有沈雁冰、杨贤江等10余人。陈云因平时在发行所青年工人中有较高的威信，五卅运动中又表现得顽强坚定，虽然年轻，也被党组织指定为临时党团成员。

为了给罢工打下一个很好的群众基础，陈云和临时党团成员纷纷到工人中间去宣传和组织群众。为了减少工友们害怕罢工失败，丢了饭碗的畏惧情绪，陈云多次向他们讲述自己对形势的分析。他说：“五卅惨案以后，民族主义革命思想蓬勃发展，上海邮务工会罢工刚胜利，给职工群众很大的启发；而8月下旬学校又将准备秋季开学，全国大、中、小学，大都要采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课本，就是说，正是资本家猎取最大利润的前夕。在这个时期罢工，老板必然要考虑到生意被中华书局夺去的危险。只要工友们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罢工胜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陈云还启发工友们要把眼光放远些。他说：“我们罢工的目的不单是为了增加点工资福利，而且为了更美好的未来。我们不能永远过这种受剥削受压迫的黑暗生活！我们的斗争一定会胜利！”陈云的话使工友们受到很大鼓舞。

在进行广泛、深入、细致的动员工作的基础上，8月20日晚，罢工临时党团以五卅宣传队的名义，在天通庵路德兴里三民学校内秘密召开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会议，讨论组织罢工的策略、方法和步骤。

次日晚，陈云又在青云路上海大学附中主持召开商务印书馆党团成员、工会执行委员和工会积极分子会议，到会168人。会议作出举行罢工的决议，草拟了《罢工宣言》、《复工条件》等文件，选举了由15人组成的临时委员会，陈云为委员长。会议至22日凌晨结束。

会后，陈云没有休息，马上投入了罢工的准备工作。领导这次罢工的临时党团，考虑到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地处河南路租界闹市区，传播消息快，社会影响大，又因发行所尚未成立工会，可以出乎馆方预料，所以决定发动发行所职工首先罢工。为了确保罢工的顺利进行，陈云连夜派纠察队员把发行所的大门及各部门办公室的钥匙全部集中到手，并把工人们上下班的记录卡片都拿掉，以免资本家查考。

22日早晨，发行所职工上班时，纠察队员们已把前后门把守起来了，工人们从后门进去，到了四楼饭堂，只见里面早已布置成一个大会场。纠察队员们忙着把一份份油印的《罢工宣言》和对资方提出的书面要求发给到会的

三所一处、指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印刷听、编译所和总务处。

人。工人们在那种气氛影响下，情绪更高涨了。会议一致通过了要求馆方承认工会和改善待遇的 12 项复工条件，并宣告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成立职工会（筹）。当时陈云仅 20 岁，由于他平时公正无私，肯为职工办事，并且敢于同资本家斗争，深得大家信任，因而工人们一致推举他为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陈云在会上向工友们讲了罢工的意义和目的。他说：“今天我们要罢工，是资本家压迫我们的结果，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努力，跟资本家斗争到底。提出的条件要全部达到，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发行所罢工后，陈云等人立即前往宝山路印刷所活动，协商相互配合行动等问题。上午 12 时半，印刷所职工响应罢工。接着，总务处职工也参加罢工，并和发行所、印刷所代表商定一致的复工条件。

当晚，总务处同人会、发行所职工会、印刷所工会在俱乐部开会，宣布联合行动，成立罢工执行委员会，陈云再次被推选为委员长。

23 日上午，陈云与其他执行委员分别到印刷所、发行所工人当中解释复工条件。陈云工作十分耐心、细致。他把复工条件，包括要求馆方成立工会、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废除包工制、优待女工、优待学徒、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一一向工人作了讲解。听了陈云详细、透彻的解说，工人们对自己应争得的权益有了明确的认识，斗志更加高昂。

面对工人罢工的强大压力，狡猾的资本家也不甘示弱：一方面，他们拒绝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手段来破坏罢工。最阴险的一着就是寻找内奸，分化罢工队伍。他们利用群众中的复杂关系，挑拨离间，拉拢分化；利用金钱和花天酒地的生活引诱意志薄弱分子；组织资方御用的同人会，和工会唱对台戏。此外，他们还欲利用出版同业，代为推销教科书，从而破坏工人们在罢工时机上的有利条件，迫使罢工无法持续下去。

在复杂的斗争面前，陈云显露了他杰出的领导才干。他及时在群众中揭发资本家的各种阴谋；以低薪职工及青工为中坚力量，积极培养骨干；尽力团结那些可能被资方拉拢而又有群众影响的中间分子；对已被资方拉走的工贼走狗，则利用群众力量，晓以大义，使其悔过。在陈云领导下，罢工执行委员会对各种不同对象采取了不同措施，彻底粉碎了资本家的阴谋。工人们紧密团结，坚持罢工，至 27 日，资本家被迫全部接受工人们提出的复工条件。罢工斗争终于胜利了。

陈云在罢工斗争中表现出的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出色的组织才能，引起了商务印书馆党组织的高度重视。罢工结束后，经中共早期革命家、商务印书馆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董亦湘和商务发行所第一位党员恽雨棠的介绍，陈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编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总务处、发行所联合支部。9 月 1 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召开全体大会，正式成立职工会，陈云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从此，陈云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再度领导罢工

陈云入党后，为工人阶级彻底解放而奋斗到底的信念更加坚定了，在他身上迸发出一股强烈的革命激情，深深地吸引和影响着他周围的工友们。

为了限制陈云在工人中的活动，资方将他调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派到仅有三四名职工的虹口分店工作。但这未能限制陈云在工人中的活动和影响。上工时无法接触到更多的工人群众，他就利用下工的时间，到工友中去，仍像往常一样给他们讲解革命道理，向青年工人推荐进步书籍，并有意识地为党培养后备力量。商务老工人谢庆斋，就是在陈云的启发和帮助下，走上

了革命道路，并经他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谢庆斋老人在回忆中写道：“陈云同志经常启发我，向我传授一些革命道理，让我阅读革命刊物。每当我读完1册刊物后，陈云同志必要我谈点心得，于是他更进一步启发我认识世事变迁的因故，使我更深认识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剥削及被剥削关系，同时积极地参加了当时由党领导的一些活动。”

反对派对工人日益的觉悟，特别是对把工人组织起来十分害怕。1925年9月18日，奉系军阀查封了上海总工会。9月22日，商务印书馆工会发表反对查封上海总工会的宣言，因此遭到反动当局的仇视。10月，商务印书馆工会亦被反动派无理查抄。

反动当局的野蛮行为，引起陈云的极大愤慨。11月，他在商务发行所职工会编辑的地下刊物《职工》创刊号上，以“怀”署名发表了《总工会是什么》一文，尖锐地揭露了反动派查封总工会的可耻行径。文章指出：总工会代表工人一切利益，领导工人阶级向帝国主义进攻，完成急需的民族革命，它所处的地位是与帝国主义对峙的，它的强大使帝国主义“终夜傍惶，眠不安枕”。国内资产阶级一方面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想借工人这支生力军来反抗帝国主义，一方面又害怕工人的势力太大，不能保持他们的剥削手段，有去此障碍的必要。所以，总工会被封是意中之事。然而，工人运动虽处处受摧残，但其势力只有日日增加，不会消灭的，这“好比不倒翁一般，虽则暂时被压，但随时有雄立的可能，只要压力一松”。

为了进一步启发工友们的觉悟，使他们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担负的历史责任，陈云在同期《职工》上，又以“民”署名，发表《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一文。文章指出：欧美工人已取得相当地位，组织了政党，夺取了政权。而中国工人阶级没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权利，深受几重压迫。满腔苦痛无处诉。但最近几年，尤其是五卅运动，中国工人运动比较急进了。工人阶级成为领导群众向帝国主义不屈不挠进攻的民族革命先锋队。中国工人阶级肩负着两大责任：“第一，必须联络各阶级起来，作民族革命。第二，解放在水深火热中的自己，要继续不断地奋斗，争到我们最后胜利。”但这两大责任，“空口谈兵，是办不了的”。只有“大家集中一个团体，作共同有组织的奋斗，才有成功的可能”。

陈云对形势发展的反应十分敏锐，自商务印书馆工会被查抄后，他就不时地提醒周围的伙伴，要警惕资方的报复和反动当局更残酷的迫害，随时准备再次进行罢工斗争。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此。

这年12月，商务印书馆馆方突然违反几个月前签定的复工条件，无理解雇近百名职工，其中不少是工会的积极分子。资方的背信弃义，引起很大公愤。商务发行所和印刷所的工人立即行动起来，分别组成罢工委员会。陈云是两处罢工委员会的实际总负责人。

12月22日，商务发行所、印刷所开始第二次罢工。陈云代表罢工委员会，向资方提出八条复工条件：（一）恢复被裁职工职务，以后无重大过失，不得借故开除，并须另订保障条件。（二）履行前次复工条件：甲、疾病扶助金，月薪在50元以下者不扣薪水，并不得有期限，余多不得移他用。乙、同人俱乐部照现在情形，可无条件全部开放。丙、实行发行所同人服务时间减少一小时之条件。（三）惩戒二所各部部长，并撤换印刷所副所长鲍庆林。（四）大小便及说话自由。（五）反对夜班工作增加时间，并要求加点心费两角。（六）女工、出店（即勤杂工）、短工与职工一律待遇。（七）退俸

金无论自辞或被辞及有故开除者，均一律发给。（八）罢工期内工资一律照发。23日，罢工委员会代表与馆方进行谈判。谈判持续到24日晚11时尚无结果，陷入僵局。资本家表面上保持沉默，暗地里却在密谋策划，勾结军警到厂里镇压工人。次日，军阀戒严司令派百余佩枪士兵，来到厂门前，沿街林立。接着，又有三四十名保卫团马队士兵陆续来到，武装军警用枪柄殴打纠察队员，将看守厂门口的纠察队员赶走。工厂内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此时，陈云毫不惊慌，表现出一个20岁青年罕有的沉着和镇静。他把罢工委员会委员召集到工人俱乐部，商讨应付办法。

下午2时，戒严司令部派士兵到工人俱乐部通知工人代表进厂商谈。在代表进厂后，工人纠察队与军警发生了武力冲突。在搏斗中，不少工友受重伤，部分纠察队员遭逮捕。与此同时，在劳资谈判会上，军警威胁工人代表迅速达成协议，否则就把他们与抓来的纠察队员一起枪毙。

面对气势汹汹的反动派，陈云和代表们毫无惧色。陈云严正地向资方指出：“这些条件是工人们提出的，如果厂方不答应，枪毙我们几个人没啥关系，但我们还有好几千工人。”在代表们无所畏惧的气势的威慑下，资方心虚了，为了不把事情扩大，基本上接受了罢工委员会提出的条件。代表们考虑到大部分被开除的工人已找到职业，同意被开除工人复工这一条改为由资本家出钱1.5万元给这些工人作为退职金。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

26日，上海各报头版都刊登了商务印书馆劳资双方谈判达成协议的消息。这是当时上海最成功的一次罢工。

在商务第二次罢工中，陈云进一步显示了他杰出的领导才干，也更受工人的信任和拥戴。这年底，商务印书馆成立党总支，陈云被任命为发行所分支机构书记兼商务印书馆总支部干事。

思想火花

商务第二次罢工后，至次年秋，陈云在《职工》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如《我们为什么要罢工》、《罢工后职工应有的觉悟》、《职工与革命》、《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等。这些文章是陈云革命初期思想的重要结晶，它反映了陈云已不是仅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参加革命斗争，而是对中国革命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理性认识，成为有较高觉悟的自觉的革命战士。陈云的这些文章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阐明罢工是劳动界的武器，但劳动界是不喜欢使用这个武器的。因为它使社会不安，并给军、警、保卫团以压迫工人的口实，商务职工两度罢工，完全是因为资方所迫，工人为谋生计不得已而为之。

第二，阐明在资本家压迫之下，出卖劳力的职工等于一种商品。这种地位决定工人和资本家是势不两立的两个阶级，有着根本不同的利益。

第三，阐明工人所受帝国主义、国内反动军阀、资本家三层压迫，有政治的关系，工人要求解放，当先从事政治革命的工作，进而再做经济革命的事业。

第四，阐明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位置。他指出：“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强的农民，是民族运动中唯一大主力。农民不参加运动，中国革命鲜有希望。”因此，具有世界性的中国民族运动，在今

参见《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史料辑要》，第11页。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后长时期的奋斗过程中，出路在于组织农民，这是中国很急迫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已经觉悟的青年，应该担负起这种责任。“到民间去”，这是今后中国民族运动中的重要口号。

陈云不仅对中国革命中的一些问题有了认识，而且对当时国内政治中的一些大事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当时一些工人并不真正懂得北伐的意义，而恐战火蔓延，民无宁日。为了启发大家的觉悟，陈云在《职工》第12、13期合刊上以“民”署名，发表了《和平之路》一文。文章指出：“北伐是和平运动，更是真正和平。”“一切政权建立在民众上，才有真正的和平出现。”这是中国数十年政局变化中反映出来的一个结论。“只想在军阀势力下要求苟安的和平，却反跑入不和平的道路。”要永久和平的成功，就要解决如何把政权建立在民众势力基础上。现在国民政府的北伐，正是建立民众政权的初步实施，是中国真和平的一线曙光。当然（北伐还不能说就是民众的武力，但“北伐是民族运动中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的一种主要的有意义的军事行动”，而且是被压迫的中国民众争取和平的捷径。因此，中国民众绝对不应该消极赞成或阻碍北伐的发展，更应积极参加赞助北伐，使简单的军事行动变成民众的伟大武力，只有如此，北伐才有意义，真正的和平方可实现。

陈云当时年仅20岁，只有高小文化水平，他之所以能对中国革命问题和国内政治谈出较深刻的认识，有着较为开阔的思想胸怀，除了革命斗争的磨练外，与他平时的勤奋学习是密不可分的。据当时同陈云一起从事罢工斗争的老工人回忆，即使在紧张的斗争中，陈云仍然没有放弃学习，只要有空闲，他就学习俄文，研读革命书籍。有了知识，也就有了智慧和力量。这是陈云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第一、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

北伐军自出师以来，连战告捷，进展神速。军阀孙传芳在江西被北伐军打败，军心动摇，后方空虚。10月，浙江省省长夏超宣布独立，转向广东革命政府。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决定利用时机举行武装起义，以配合北伐军的进攻。

经过五卅运动和两次大罢工的锻炼，商务印书馆职工的觉悟有了提高，组织上也有了较大发展。这时的商务不仅有了健全的工会组织，还拥有近千名工人积极分子和工人纠察队员，是闸北工人纠察队的主力。陈云因担任职工会负责工作，未能参加纠察队，但他直接参与了商务印书馆工人准备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

1926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决定上海工人阶级举行历史上第一次武装起义。商务印书馆党支部接受了闸北区部分战斗任务。起义预定在24日1时开始。陈云与伙伴们在厂里集中，精神抖擞地等待起义信号——黄浦江上军舰的号炮声。可是，一直等到清晨三四点钟，仍未听到号炮声。后来才得知是由于夏超的军队在进兵到嘉兴时，被孙传芳调来的军队打败，而与夏超约好合作起义的国民党上海负责人钮永建又毫无动静，起义指挥部在即将发动起义时，才得到准确的消息，火速通知各地区停止行动。由于通讯条件的限制，有几个地区在接到通知前，已经起义，以致遭受牺牲。陈云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群众在上海第一次武装起义中，虽然没有正式行动，却也经受了一次斗争的锻炼和考验。

第一次武装起义流产后，中共上海区委和上海总工会认真总结经验，认为在第一次武装起义前，对全市广大工人群众组织和发动不够，因此必须深入发动和团结工人群众，加速发展和扩大工会组织，帮助和支持各行各业工人的罢工斗争。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埠，如能把各行各业的店员组织起来，将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为此，上海党组织积极努力，于12月5日召集各业店员代表在布业公益会举行会议，宣告成立上海店员总联合会，并推选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华洋布业、估衣业、南货业公会，药业、煤业友谊会，典质业同人会等九个团体为执行委员，其中的核心力量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和布业公会。陈云受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委托，参加了成立大会。

此后，陈云参加了店员总工会的工作。他积极做店员的思想工作，把党和工会的革命主张深入浅出地讲给店员们听，使店员们逐步认识到，为了得到待遇的改善和不受欺压，只有在工会组织的率领下，团结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才是根本的出路，同时，陈云还和店员总工会的其他同志积极领导各业店员开展经济斗争。最大的一次是这年底，上海估衣、米业、南货、百货、中药业等行业店员举行的罢工斗争。这次斗争也取得了胜利。

显然，这时陈云革命活动的范围，已不是仅仅局限于商务印书馆内，而是逐步扩展到上海整个工运活动之中，并积极参与了上海党领导的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

1927年2月7日，陈云出席中共上海区委在杨树浦英电俱乐部召开的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准备会议。次日，他又出席了上海总工会在此召开的各工会负责人联席会。会间，陈云不幸被英巡捕房逮捕，同时抓走的还有64名党和工会的积极分子，他们一起被押往提篮桥捕房。事发之后，中共上海区委组织部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赵世炎，立即赶往杨树浦组织营救。于是，由英电、老怡和工会出面，向捕房提出，这些工人是他们请来开庆祝会的客人，被无理抓去，如不立即释放，翌日将举行全市总罢工。在广大工人群众的压力下，加上陈云等积极分子均未暴露共产党员身分，当晚10时，陈云等65人获释。

此次被捕，未使陈云产生丝毫畏惧情绪。出狱后，他立刻又投入紧张的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在一次店员总工会召开的会议上，不少同志提出，店员总工会成立后，工作是有成绩的，但由于店员均分散于各条马路，无法集中行动，而未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影响，给帝国主义以有力的打击，如能在主要闹市地区发动一次联合罢工，就会狠狠打击帝国主义的气焰。这个建议得到采纳。于是店员总工会派陈云等商务发行所工会负责同志去与上海南京路先施、永安、新文、丽华四大百货公司的职工接触，动员他们准备罢工，以配合上海市总工会预定2月19日举行的总同盟罢工。陈云接受任务后，与商务印书馆的章郁庵、徐新之等在先施等四大百货公司的职工中做了许多组织罢工的筹备工作。

19日，上海总工会正式下达了总同盟罢工令。当日，参加罢工的人数即达15万之多。陈云等领导先施、永安、新文、丽华的职工加入了总同盟罢工的行列。顿时，昔日繁华喧闹的都市中心陷入一片沉寂。与此同时，陈云还参与领导了当日商务印书馆工人的罢工。在紧张的斗争中，陈云这个年仅二十几岁的青年工运领导者，显得异常镇定，从容地处理着他应该负责的一切事情。

罢工人数在不断增加。22日，中共上海区委及时将罢工引向暴动，下午4时，发布了暴动的特别紧急通告。武装起义定于当晚6时开始，以兵舰“建康”、“建威”号炮击兵工厂为起义信号。起义开始后，由于北伐军抵达嘉兴后按兵不动，工人武装起义失去里应外合之机，而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总工会考虑到敌强我弱，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以备日后进行更大的斗争，决定停止起义，于24日全市复工。

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整个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政治环境日益恶劣。为了保存实力，坚持斗争，商务发行所党支部奉中共上海区委和上海市总工会的命令，通知该所部分党员、工会骨干和积极分子暂时离开上海，分别去常州、福州、宁波等地隐蔽。

2月下旬，陈云受命带领商务印书馆的陈公庆、徐新之、谢庆斋、孙诗圃、孙琨瑜等人，乘船抵达宁波余姚。

宗姚之行

随陈云赴余姚的五人，除孙琨瑜是工会积极分子外，其余均为中共党员。他们当时为何要选择余姚作为隐蔽之地呢？

原来，余姚是随陈云同行的陈公庆的家乡，陈公庆又与当时在余姚主持国民党余姚县党部工作的中共党员郭静唐相识。更重要的是，在陈云等来余姚之前，北伐“浙东人民自卫军”已进驻余姚城，军阀政府已经垮台，军阀县长方允中已仓皇逃往宁波，以郭静唐为常务委员的国民党余姚县党部恢复了办公，共产党员楼适夷、张水影、蔡肖鸿参加了国民党余姚县党部的工作，并担任了县党部组织部长、妇女部长、农工部干事等职。在中共组织方面，余姚已建立了坎镇、马家路和余姚三个党支部，工农群众的革命情绪甚为高涨，盐民、农民及城区职工运动的高潮逐渐兴起。这种政治、社会环境对陈云等的隐蔽是极其有利的。

陈云等抵达余姚后，由陈公庆安排住在北城龙泉山东北助海庙后面，这里是陈公庆岳父徐子彪家。翌日，陈公庆即与郭静唐取得了联系。

郭静唐1920年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从浙东第一师范毕业后，在余姚县立一小任教。1924年5月，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下，郭静唐与部分进步青年集资创办了《余姚评论》，由郭静唐任主编。《余姚评论》以宣传新思想、抨击时弊为宗旨，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发行量由开办时的500份，很快增加到2000份。五卅运动后，郭静唐等因遭受军阀孙传芳的迫害，撤往上海，《余姚评论》遂同时被迫停刊。郭静唐到上海后，经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早期共产党员杨贤江介绍，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工作，并由杨贤江、梅电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郭静唐对上海的情况十分了解，对商务印书馆的情况也比较了解，因而对陈云等一行来余姚，甚为欣喜。在得知陈云等人已到余姚的当天，郭静唐即亲自去徐宅探望，并要求陈云等在余姚期间能帮助、指导和协助余姚县党部开展工作。

此时的陈云，经过近两年的革命斗争的磨练，已是一个较为成熟、坚定无畏的革命战士。他并没有把余姚作为消极隐蔽的场所，见郭静唐诚挚地要求他们协助工作，便十分爽快地答应下来，并对内部人员作了适当分工：他本人担任了对余姚县党部宣传方面的指导工作；徐新之负责对庵东盐场等地的盐民的发动工作；谢庆斋去盐场二灶做盐民的工作；陈公庆、孙诗圃、孙琨瑜三人则留在城区，负责工运工作。

陈云对县党部的宣传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均被县党部接受。

县党部还专门为陈云安排了几次群众性的讲演会，向余姚各界民众进行反帝、反军阀和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宣传鼓动。陈云在讲演会上向群众详细阐述和分析了国内军阀、官僚、上豪劣绅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的事实和今后革命运动的方向等问题，号召各界民众团结一致，斗争到底，树立反帝、反封建的决心。陈云的讲演，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余姚民众的斗争精神。

此外，陈云还对其他同志分担的工作进行指导。陈云指示谢庆斋在二灶深入盐民中间，与盐民生活在一起，亲身体会盐民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动，以便详细了解盐民受廋商、秤放局、蓬长等层层剥削的情况，更好地进行组织、发动盐民的工作。谢庆斋按照陈云的要求，做了许多工作，成功地把当地盐民组织了起来，建立了基层盐民协会。陈云自己还亲自去余姚北庵东盐场和道路头等地视察，指导当地盐工和农民开展群众斗争。

陈云对留在城区负责工运活动的陈公庆、孙诗圃、孙琨瑜三人的工作也进行了指导。当时余姚产业工人尚少，大部分是店员工人，而且，中共余姚县党组织和国民党余姚县党部都把发动盐民作为各自工作的重点，主要精力放在庵东盐场，而对城镇的职工运动没有设专门的领导机构，工人运动还由商民部兼管。而广大店员职工投入大革命运动的要求迫切，渴望改善职工福利和生活待遇。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建议陈公庆等人把店员工人作为工人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努力在他们中间开展工作。在陈云的指导下，陈公庆等人成功地在药业职工中发动了罢工运动。

3月上旬，国民革命军接近上海，上海市总工会有许多工作等待着陈云他们去开展，而余姚已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的热潮，因此，陈云等决定离开余姚，返回上海。

此时的上海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

义无反顾

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共上海党组织曾多次召集各工会负责人开会，总结起义失败的教训，研究再发动起义的事项。陈云返沪后，便不分昼夜地投入研究、组织商务印书馆工人参加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工作。

整顿工人纠察队，加强对工人纠察队员的军事训练，是起义准备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是闸北工人纠察队的骨干力量，党组织和上海总工会对它特别重视。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特别委员会委员周恩来、赵世炎在徐梅坤、陈云等陪同下，几次到商务印书馆召集党和工会骨干了解两次起义的情况和观察地形。周恩来指示大家，首先要树立起军阀必倒、工人阶级必胜的信心，要发动群众，组织坚强有力的战斗队伍——工人武装纠察队，随时准备投入战

斗。

陈云与商务印书馆党和工会的其他负责人，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组织部分纠察队员参加商务资方组织的保卫辅助团，以此获取枪支，取得合法地位，进行公开的军事训练。另外，他们还派出一批纠察队骨干去法租界自忠路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军事训练班轮流接受军事训练，受训的同志后来分别担任了工人纠察队的大、中、小队长。大部分纠察队员则在厂内接受周恩来派来的黄埔军校毕业生胡公冕的军事训练。经过多种训练，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员普遍掌握了使用武器及城市起义的基本战术，成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的一支骨干力量。

1927年3月21日，天气晴朗。中午12时整，全市的工厂和轮船以及救

火会的救火车突然同时汽笛齐鸣、警铃齐响。这是战斗的号角声，它宣告上海 80 万产业工人总同盟罢工，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了。宝山路商务印书馆钟楼上的大钟也敲响了，阵阵钟声召唤着工人投入战斗。陈云和商务工会的其他负责同志立即集合全体工人，下达口令，发给纠察队员武器弹药和铁棍、斧头等。12 点 45 分，集合在商务印书馆钟楼下铁门里的纠察队，臂带红袖章，分成三路，以急行军步伐，分别奔向东方图书馆、五区警察署以及北火车站等敌人据点附近待命。这时，群众的喊杀声和空油箱里燃放的爆竹声（似机枪声）混杂在一起，如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吓得据点里的敌人不敢越雷池一步。

暴动开始一小时后，陈云接到上海总工会命令，要他同中共代表一起到龙华，与驻扎在那里的白崇禧率领的北伐东路军谈判。原来，白崇禧率领的北伐军已于 3 月 20 日傍晚抵达上海近郊的龙华。但白崇禧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在离上海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企图待上海工人与军阀两败俱伤时进兵上海，坐收渔利。陈云与中共代表要求白崇禧立即下令出兵上海，遭到无理拒绝。陈云愤然返回。

此时，市内的战斗已接近尾声。七个暴动战区中已有六个区完成了任务，只剩下闸北区的作战任务尚未完成。闸北区是敌人力量集中之地，有据点 20 余处，工人们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仍有北火车站、东方图书馆等敌人重要据点没有攻下。周恩来得知白崇禧按兵不动的消息后，激愤地说：“我们决不依靠北伐军拿下北站，我们有决心和信心，凭自己的力量最后消灭军阀残余部队。”陈云加入了最后决战的队伍。经过 20 多个小时的浴血奋战，工人们终于在 22 日下午 6 时，占领了敌人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至此，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上海工人阶级以自己的鲜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起义胜利后，陈云参加了成立上海特别市政府的筹备工作。正当上海工人阶级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伪装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露出了狰狞的面目。4 月 12 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员和工人纠察队员遭到屠杀，上海顿时一片白色恐怖。面对蒋介石的无耻行径，陈云悲愤至极，他不顾反动政府的通缉，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与国民党反动派血战到底的革命道路。

由于陈云在上海从事工运已有几年，很多敌人认识他，因此，遭到反动政府的通缉后，处境十分艰难。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陈云转入地下活动，在商务继续领导工友们坚持斗争。当年的老工人回忆说，陈云为躲避敌人，不得不住到工友家去。有一段时期，陈云和几个搞过罢工斗争的工友一起住在带钩桥一个同志家里，房子很小，要住五人，陈云只能睡在潮湿的水泥地面上，每天吃饭也成问题。但不管生活如何窘迫，陈云的精神始终是乐观的，他总是把全部精力用来考虑如何继续开展对敌斗争的问题，还常常对身边的工友说起这样一首打油诗：

铁窗风味，
家常便饭。
杀头枪毙，
告老还乡

陈云这种坚定的意志，乐观不屈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身边的工友们。

随着斗争环境的日益恶劣，陈云已无法在商务立足，不得不离开这个自己走向社会的第一个驿站。临别时，他深沉地对朝夕相处的工友们说：“我此去一不做官，二不要钱，三不妥协，只为了要跟反动派坚决斗争到底，求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这一腔掷地有声的赤诚之言，道出了陈云的雄心壮志，给工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此，不管环境如何险恶，在为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谋求解放和幸福的道路上，陈云始终是义无反顾，以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三 有勇有谋的农运领袖

返乡

陈云告别了商务印书馆的工友后，并没有立刻离开上海。1927年8月，他担任了中共上海市沪中区委委员，在敌人的血雨腥风中，坚持斗争。残酷的斗争环境，使原本就稳重、谨慎的陈云，更加沉着和干练了。

这年的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旗帜鲜明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会议决议，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9月初，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第一次发出《江苏农民运动计划》，指出：目前江苏农运的主要工作是抗租、抗税、抗捐和利用冬防土匪蜂起时，造成各地暴动的形势。不久，陈云便接到上级命他返乡建立党的组织，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的指示。

自14岁离开家乡，七八年来，陈云很少有机会返乡，但他对家乡故土及乡亲们的深厚感情，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有丝毫的减弱。陈云在上海一直和家乡的伙伴们保持着联系。1926年春，陈云和在上海大学任中共独立支部书记的青浦老乡高尔柏一起发出重建青浦旅沪学友会的倡议。在他们的倡议下，当时在沪的24名青浦年轻人聚到了一起，重建了“青浦旅沪学友会”。根据陈云的提议，学友会的宗旨立为“联络感情，互相砥砺，团结青年，改造家乡”。从此，只要有机会，陈云便和学友会的会友们一起磋商如何在家乡开展民主革命活动，发动农民同黑暗势力进行斗争，以及如何在家建党的问题。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陈云还嘱咐自己儿时的好友刘国桢，在家乡组织商民毅勇团。

在陈云心中，可以说早就孕育着一个改造家乡的革命计划，现在他就要返乡，去施展自己的抱负，为家乡百姓争得利益，心情非常激动。他迅速与在沪的中共青浦独立支部取得联系，参加了独立支部在上海南市刘公祠附近的旅馆召开的会议，会议确定了于10月1日返回青浦的计划。

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陈云没有直奔青浦，他先到嘉兴西塘老同学高庭梁处住了两三天，然后才坐小船回到青浦。高庭梁是陈云在颜安小学的同窗好友，同陈云是换帖弟兄，两人感情甚厚。高庭梁一再恳求陈云在西塘多住几天，但陈云重任在身，不便久留，又不能向好友说明情由。望着高庭梁因他坚决要走而失望的神情，陈云只是紧紧握住老同学的手，用意味深长的目光良久地注视着他……

故乡播火种

10月初，陈云返回青浦。

此时的青浦县，也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青浦县党组织遭到破坏，不少党员被迫转移，留下的部分党员一面坚持斗争，一面积极寻找党组织。1927年8月，他们终于与中共江苏省委接上了关系。9月，江苏省委任命叶昌治为中共青浦独立支部书记，并在青浦、练塘及黄渡三个地区成立了三个特别支部，共有党员27人。青浦的农会组织也被迫停止了活动，农会骨干有的暂时隐蔽起来，有的被迫远走他乡，有的则跟着国民党跑了，背叛了革命。大革命高潮时被农民赶跑了的大地主，一个个卷土重

来，农民群众又陷入了苦难和悲惨的境地。

陈云在冷静地分析了家乡的情况后，决定从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建立党的组织，恢复和发展农会工作入手来推进家乡工作。他顾不得回家看望舅舅、舅妈和弟弟，到青浦后，立即开始了工作。为了不被敌人察觉，陈云化名陈明。

陈云首先与出狱后仍坚持在青浦地区开展地下斗争的中共黄渡特别支部书记夏采曦取得了联系，召开了东乡党员会议。陈云向东乡党员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江苏省委的指示，根据中央的精神和省委的指示，陈云和同志们认真分析和讨论了青浦地区开展秋收暴动的有利条件和斗争策略。陈云指出：青浦地处苏州、嘉兴、上海三角地带的中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青浦东乡与岗山、嘉定相接，东乡农民的抗租斗争如能和嘉定外岗地区农民的“五抗”斗争联合起来，则可切断沪宁铁路，支援苏州、无锡地区的农民暴动；青浦西乡的小蒸，紧靠沪杭铁路一侧，是松江、金山、青浦三县交界处，如能和松江、金山农民斗争联成一片，就可切断沪杭铁路，支援浙江及浦东地区的秋收暴动，并可以配合上海的工人运动。同志们对陈云的分析十分赞同。会议决定从东乡的观音堂和西乡的小蒸入手，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斗争，进而组织农民进行暴动。

会后，陈云到小蒸，和正在那里开展工作的中共党员吴志喜取得了联系。吴志喜曾在武汉军校学习，大革命失败后，他也按江苏省委的指示回故乡青浦发动农民革命。陈云和吴志喜根据小蒸地区的斗争特点，研究了开展秋收起义的策略，决定首先恢复和整顿农民协会，积极培养农会骨干，建立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开展农民革命斗争。接着，陈云和吴志喜一起会见了农会骨干曹兴达、曹象波、徐秋松、胡秀清等人，宣传了马列主义和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分析了革命形势，激发他们的革命斗志，使这些农会骨干受到极大的鼓舞，决心重整旗鼓，迎接新的战斗。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陈云和吴志喜住在小蒸中共党员陆铨生等人家中。他们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到处串连，找积极分子谈话、开会，向农民宣讲抗租意义，宣传翻身闹革命的道理；有时在小蒸天主教堂、竹园里，给农民算收支帐，指出农民贫困的根源是租米和高利贷，教育大家只有组织起来，同豪绅地主斗，才能挖掉穷根。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他们不仅在附近 20 多个村子里恢复和发展了农会组织，而且从许多农会积极分子中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领导骨干，吸收了曹兴达、曹象波、徐秋松、胡秀清等 12 名农会骨干加入共产党，建立了青浦西乡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帮助西乡建立党支部后，陈云和吴志喜进一步深入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他们以拉二胡、吹笛子、讲山海经等作掩护，与广大群众接触，扩大党的影响。由于陈云能够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主张，把农民如何解放如何翻身的道理，说得既通俗，又透彻，因此，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陈先生”这个尊称四处传开，在当地影响很大。

为了进一步使党的抗租抗息的口号深入人心，陈云感到有必要公开地、大规模地向群众进行一次抗租教育。每逢农历十月初一，小蒸地区有举行“十月潮”迎神祭坛庙会的习俗。西乡党支部经过讨论，决定乘农民迎神祭坛的机会，召开群众大会，进一步动员群众。

农历十月初一，天刚亮，练塘、石湖荡、枫泾等地三四十个村庄的农民抬着偶像拥向小蒸。小蒸东南面的庙地上挤满了来自四乡的农民群众。祭神

刚结束，陈云、吴志喜、陆铨生等立即跑到小蒸庙后的荒坟地上召集群众，陈云站在最高的坟堆上，向 3000 多名农民发表了生动的演说。他历数了地主剥削农民的罪行，阐明了农民养活地主，而农民却世代受苦，只有打倒地主豪绅，实行耕者有其田，才能有饭吃、有衣穿的道理，号召广大农民团结起来，进行抗租斗争。演讲深深地感染了广大农民群众，他们越听心里越亮堂，觉得“陈先生”讲得很在理，应该行动起来，同剥削、压迫他们的老财们斗争到底。

陈云除了在小蒸积极发动农民群众外，还在练塘发动店员和小手工业者起来斗争，帮助他们成立工会。1927 年 11 月 13 日，练塘镇南北货茶食业职工在城隍庙内召开工会成立大会，有 400 多人参加。陈云到会并发表演讲，详尽阐述了工会组织及团结、改善工人待遇等问题。

当陈云和吴志喜在小蒸一带努力推进农运工作的同时，被派到东乡观音堂地区工作的同志也在那里打开了局面。他们组织了农民协会，发动农民进行抗租斗争，并制定了减租“十大要求”，农民抗租斗争的热情十分高涨。为了使观音堂地区的农运工作更深入地开展，陈云两次到曹家浜村曹银泉家晒场上发表演说，号召大家抗租，打倒土豪劣绅。陈云在演讲中生动地说：“今年是丰收年，但贫苦农民荒年借当头，熟年吃苦头，因为头上压了租米、高利贷两块大石头，只有团结起来，办好农会，和土豪劣绅斗，才能过上好日子！”

陈云的工作得到了中共江苏省委的充分肯定。1927 年 11 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建立中共青浦县委员会，陈云为书记，吴志喜为常委，袁世钊为委员，下辖小蒸、枫泾、观音堂三个区委。不久，江苏省委第二次发出《江苏省农民运动的计划》。《计划》肯定了上半年以来江苏农民斗争的形势，要求在最近几个月内加紧工作，充分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军，开展农民抗租抗税斗争，提出“一切政权归农民委员会”的口号。

根据江苏省委的指示，以陈云为首的中共青浦县委认真研究了青浦地区的情况。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这一地区的农民被发动起来了，他们进行抗租抗息斗争的勇气日益增长。各地的地主豪绅收不到租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勾结官府，企图向四乡农民进行武装逼租。斗争日趋尖锐。陈云等认识到，要巩固和进一步扩大前一段农民运动取得的成果，必须有自己的革命武装，以对付反革命的武装，所以，决定迅速建立一支农民武装队伍。11 月，中共青浦县委建立了农民革命军（简称农民军）总指挥部，吴志喜任总指挥，陈云任政治委员。接着，东乡观音堂地区建立了农民武装纠察队，西乡小蒸、枫泾地区建立了农民革命军。为了武装农民军，陈云还组织部分党员和农会积极分子到上海把省委军委下拨的 10 余支枪巧妙地运到枫泾镇屈家洪。

12 月上旬，东乡农民从抗租发展到暴动。土豪勾结县政府电请省府派军队镇压，当局派国民党松江驻军两个连进驻青浦，和公安局、水警队联合建立临时军警督察处，镇压农民暴动，青浦城实行临时戒严。10 日，国民党军队进驻观音堂，11 日晚，农民运动领导人顾复生的父亲、哥哥及农运骨干 20 多人被逮捕。顾复生为了不使群众遭受迫害，不久即去青浦，被反动政府关进监牢。陈云得知顾复生等农运骨干被捕后，立即与夏采曦等星夜走遍了火烧庙、蔡家港、北张角、宜桥等村看望农协委员、纠察队员，鼓励大家坚持斗争。许多被看望的农民诚挚地对陈云说：“共产党这样关心我们，我们一

定要斗争到底！”

就在这时，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农民运动第三次计划》，提出了发动、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创造总暴动局面的任务。陈云受省委委派，调任松江（管辖松江、金山、青浦三县）党的负责人，领导该区党的工作及农民运动。中共青浦县委改建力松（江）青（浦）县委（也称松江县委），书记夏采曦，常委吴志喜，委员袁世钊、丁剑青。

一场农民武装斗争的暴风骤雨就要来临。

小蒸烽火

1928年对于小蒸人民来说，是不寻常的、值得记忆的一年。

年初，中共江苏省委再次发出《江苏各县暴动计划》，指出：“江苏客观形势已到了‘直接革命’的时候，但并不是即刻定期暴动，而是要创造总暴动的局面。暴动的目的是要建立苏维埃政权，实现土地革命及劳动问题。”此时，练塘、小蒸地区能直接指挥的农协会员有800余人，黄渡、观音堂地区能直接指挥的农协会员有500余人。

秋收结束后，练塘地区的催租局一次次地发出交租限单，但终不见有人交租。小蒸镇上有名的大地主倾千、胡祖文等，见收不到租米，从练塘请来了流氓头子袁伯祥，带水警队杨远新部，开了一只“二号枪船”到小蒸，荷枪实弹地向小蒸农民催租逼租，并在三官桥挽摆起了收租台。小蒸四乡的地主在茶坊、酒店和街头巷尾拦截上镇的农民逼租讨债。枫泾等地的地主也摇船下乡上门逼租，有的地主还带了狗腿子威胁农民群众。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农民开始动摇了，有的甚至开始交租了。

鉴于地主勾结水警队下乡逼租的情况，为巩固已经取得的抗租抗息成果，1月2日晚，陈云在小蒸主持召开了中共松青县委扩大会议。会上，陈云传达了中共江苏省委关于青浦县暴动的指示，决定西乡于翌日暴动。会议部署在小蒸缴袁伯祥枪船上的枪械，东乡缴黄渡水警队的枪械。暴动期间，陈云化名陈亨。

会后，陈云把攻打“枪船”的计划告诉陆铨生夫妇，并要他们3日清晨到上海，建立秘密联络站，以备斗争失利后接待去沪的同志。二人接受指示后立即赶赴上海，在闸北虹口公园附近的余庆里租了一间房子，作为地下工作联络站。

不料，打枪船的计划走漏了风声，枪船准备逃跑了。陈云当机立断，与吴志喜商议决定立即行动，提前举行武装暴动。陈云一面派人在小蒸周围的几个村子里发动群众，造成巨大的抗租声势，一面和吴志喜一起亲自带领农民军拦阻敌船。一会儿功夫，一支百余人的农民军队已集合起来，有的拿长枪、短枪，有的持大刀、铁矛，他们高呼“打倒土豪劣绅”、“大家不要还租”等口号，穿过小蒸街，直抵小蒸西北的殷庄坟头。

队伍刚到那里，就看到枪船在镇西边的大庵头转弯过来了。农民军马上埋伏下来。当敌船驶到距埋伏地点100多米的方时，吴志喜吹响了哨子。听到射击的命令，农民军纷纷向敌船开火。这时，小蒸周围的几百名群众也都迅速地汇集到小蒸，顿时枪声大作，口号声四起，枪船上的水警吓得目瞪口呆，大流氓袁伯祥临阵脱逃，只有一个巡长在船上哇哇乱叫，逼迫水警还击。在激烈的战斗中，农民军有几支枪发生了故障，剩下的两支枪也不太好用，大刀、铁矛等武器又施展不上，而敌人的人力却很猛烈。敌人发现了农民军的弱点，便乘机弃船上岸，重新组织火力，十来支枪猛烈向农民军射击。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减少损失，陈云与吴志喜指挥农民军撤退，把小蒸地区的农运骨干与农民军一起转移到塘南钱家草一带待命。

小蒸的农民军向塘南转移后，小蒸镇上的地主汪倾千、胡祖文等误以为共产党、农民协会已被打垮，又在镇上猖狂起来。他们在茶馆里谩骂农民革命军，扬言要杀农民军，并对参加武装暴动的农民的家属严厉训斥，还邀请巡官坐镇小蒸，一时土豪劣绅的气焰十分嚣张。为了给群众壮胆，陈云决定抓住时机，扫奸除霸，以安定民心。

1月5日傍晚，陈云和吴志喜带领一支农民军小分队从西河山洪出发，越过沪杭路，渡过大蒸塘，直奔小蒸。晚上10时许，小分队包围了地主汪倾千家，处置了汪氏兄弟；接着又到地保胡祖文家，把胡从夹墙里拖出处决了。

农民军在小蒸地区怒杀土豪的革命行动，有力地支持了农民群众的抗租抗息斗争，农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当时曾流传着“共产党，扒平王，一夜打死七只狼，财主人家泪汪汪”的歌谣。广大农民抗租抗息的决心更大了，农民革命军斗争的信心也更加坚定了。

陈云是个善于总结经验，很有谋略的领导者。他从农民军打枪船的战斗中吸取了武器缺少且陈旧的教训，决定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来武装自己。

1月9日晚，30多名农民军手执武器，臂缠红布，在吴志喜带领下，分坐两只快船，来到范浜新镇（现蒸淀乡）。按预定计划，他们悄悄地包围了团防局。农民军一面向团防局施加压力，一面交代政策，迫使团防局局长吴章书把六支枪全部缴了出来。

陈云指示农民革命军以范浜新镇团防局缴枪不杀为例子扩大宣传，警告敌人只要不反对农民军，向农民军缴枪，就有活路，同时，写信给各地的团防局，展开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很快，除枫泾、练塘两个重镇的反动军警未动外，其余的都把枪缴出来了。这样，农民革命军先后从自卫团和地主武装那里缴获枪支三四十支，农民革命军的装备得到很大改善。

小蒸起义以来，农民军的革命活动大大地激励了四乡农民群众，他们在党的号召和全国农民运动胜利发展的形势的鼓舞下，纷纷要求参加农民协会。南到朱泾，西到枫泾，东到松江，北到练塘，方圆15多公里，六七十个村庄都被发动起来了，有几千农民加入了农会组织。在此期间，农民革命军的队伍也不断壮大，人员、武器进一步扩充，除了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枪支外，还通过上海党组织从上海等地搞来了一批武器，农民军声威大振。

然而，敌人是不会坐视农民革命力量的发展的。当地的反动势力在小蒸农民军暴动以后，联合起来组织了疯狂的反扑。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陈云和吴志喜等带领农民军转移到枫泾农村。

枫泾暴动

枫泾地处江浙边界，当时枫泾的南镇属浙江省的嘉善县，北镇属江苏省松江县。枫泾地区河道纵横，沪杭铁路横贯全境，素称江南鱼米之乡。但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地主残酷剥削，广大农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困苦不堪。此地早已孕育着革命的社会基础。

1926年9月，中共枫泾支部建立，归属中共江浙区委领导。当时，党组织派中共党员陆龙飞回乡开展革命斗争，公开身份是枫泾北土地堂小学教员。陆龙飞回乡后，便与中共党员袁世钊一起，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很快在枫泾城隍庙桥堍的税谷仓里成立了农民自己的反封建、反恶霸组织——农民协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五六百人。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杭州，袁世钊

奉命去嘉善参加筹组国民党嘉善县党部，担任执行委员兼农工部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搞“清党”，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袁世钊、陆龙飞等被迫转入地下工作。自1927年秋陈云奉命返回青浦，成立中共青浦县委以后，枫泾支部改组为中共枫泾区委，袁世钊任书记。枫泾地区的农民运动和党组织直接受陈云和青浦县委领导，农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上千人，并建立起农民革命军。陆龙飞任枫泾农民军指挥。

陈云和吴志喜率领农民军到达枫泾与袁世钊、陆龙飞会合后，青浦和枫泾的农民军合二为一，准备在枫泾再次举行暴动，进而切断沪杭铁路，支援和配合浙江、浦东一带的农民暴动。

为了使暴动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陈云、吴志喜、袁世钊等率领农民军，经常在新浜、枫泾、土地堂、福登庵、大方庵等处，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农民开展抗租斗争。广大农民纷纷揭发地主、土豪带领警察逼租的罪行，控诉地主雇佣“大佃”（即地痞流氓）向农民逼租，如缴不出租，这些“大佃”就住在贫苦农民家里吃白食，甚至把农民拖去吃租米官司。群众强烈要求农民军镇压土豪劣绅和他们的帮凶——地痞流氓分子。

1928年1月11日晚，袁世钊、吴志喜、陆龙飞等应广大农会会员和群众的要求，率农民军数百人，组成三队，颈系红布，分赴屈家浜、钱家草、西官村三地，处决了破坏抗租抗税的恶霸地主金海琴、李新发、李善庆、李海龙等人，烧毁了他们的田契，分掉了钱粮，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并沿途张贴标语和布告，公布金海琴、李新发等土豪劣绅的罪状，民心大快。

1月12日，陈云来到枫泾。

袁世钊向陈云汇报了11日晚的暴动情况和攻打枫泾的计划。鉴于农民军士气高涨和为推动农民武装斗争的进一步深入，陈云同意当天晚上攻打枫泾镇，并与袁世钊等人研究了攻打的具体方案。正当农民军整装待发时，吴志喜接到枫泾送来的紧急情报，告知枫泾敌人已有准备，松江敌人援兵也将到达枫泾。根据新的敌情，陈云等果断决定，暂不攻打枫泾。

攻打枫泾的计划虽然由于敌情的变化而搁置下来，但枫泾地区农会的活动更加频繁了。枫泾的街头巷尾到处张贴着“打倒土豪劣绅”、“共产党万岁”等标语。“枫泾要暴动”的风声传遍了枫泾镇。枫泾镇的地主劣绅惊恐万状，联合要求松江、嘉善两县政府派兵驻防枫泾镇，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于是，枫泾镇公安分局派水警队到各乡加紧巡逻，在镇上搜查旅馆等公共场所，并派水警协助土豪劣绅们下乡逼租。

为了对付敌人的武装行动，陈云一方面命令农民军加强港口船只检查，一旦发现武装逼租的船只，立即扣留；另一方面，他与吴志喜、袁世钊等人，进一步加紧了在群众中宣传抗租的工作，并为枫泾暴动计划的再度实施做准备。

1月15日，陈云、吴志喜等秘密开会，决定在1月22日（农历十二月三十日），乘豪绅地主回家过年之际，攻打枫泾镇。会议还对进攻的准备工作作了安排：陈云到上海设法搞武器，吴志喜等在农村收缴团防局及地主的武器，并发动群众参加战斗。

决定作出后，陈云在草长浜何明金茶馆前向400多名农民和农会会员发表演说，号召大家起来斗争，把受地主老财们压迫剥削的苦楚统统诉说出来，并告诉大家，共产党总有一天会打下枫泾，替大家报仇申冤。觉悟了的农民一个个倾诉了受地主、豪绅压迫的苦楚，坚决表示一定要参加攻打枫泾的革

命行动。这是一次诉苦会，也是一次枫泾暴动的誓师会。会上提出了“待到西风起，打到枫泾去”的响亮口号。

会后，陈云赴上海筹运武器。吴志喜等按计划先后收缴了范浜、新镇、石弄泾、新中浜、齐家浜等地保卫团和地主私人的枪支。1月18日，农民军和群众200多人，来到枫泾与金山交界处，包围了西乡韩家坞，在行政局长李伯贤及土豪曹体乾、张伯翰家，又收缴了枪械多支。农民的武装力量日益壮大。

正当农民军加紧准备暴动的时候，枫泾镇自卫团团总周清怀和商会会长大地主吴获帆等秘密策划，连连向江苏省民政厅、松江县政府及驻防嘉兴的26军求援。松江县长戴忠骏、公安局局长程季英、驻松补充团团团长赵踵武等共同策划“围剿”松江区农民军，增派一连兵力开赴枫泾，派一名团副亲临指挥。

1月18日傍晚，袁世钊的叔父从枫泾赶到了农民军驻地四八亩荡庵内，告诉袁世钊当晚国民党军队进攻农民军的消息。得知消息后，吴志喜与袁世钊立即率领农民军转移到蒋家浜村，并商议决定：袁世钊率领部分农民军住在库浪村，吴志喜、陆龙飞率领其余农民军开往蒋家浜村分散住宿。

1月19日凌晨4时，大雾迷漫，国民党补充团分水陆两路进攻农民军驻地。团副薛蔚英带领9连沿枫泾铁路向北，5时半到达新浜；11连由一个姓许的连长带领，分乘四只船从枫泾北栅出发，5时半到达林家浜。两路军队挨家挨户搜索，拘捕农会会员三四十人。7时半，水陆两路敌军到土地堂村会合，又开往蒋家浜村。这时，查家浜一农民军发现10多个国民党士兵，急忙向袁世钊报告，袁即组织农民军一面开枪还击，一面渡河向青浦县境内转移。住在蒋家浜村的农民军哨兵，因浓雾密布，发现敌情已迟，吴志喜、陆龙飞组织农民军奋力突围，战斗一个小时，终因弹尽援绝，不幸被捕。下午1时，反动军队撤回枫泾，被捕的农民军及农会会员60余人也被押到枫泾。吴志喜、陆龙飞等六人被押解到松江驻军团部。枫泾农民暴动尚未举行，就被凶恶的敌人扼杀了。

营救战友

在枫泾农民军遭到反动派残酷镇压之际，陈云正风尘仆仆地由上海赶回枫泾。

当天下午3时许，陈云到达蒋家浜。村里已没有了往日的欢腾，街上行人神情慌张，脚步匆匆。陈云预感到出事了。他顾不上个人安危，向当地群众详细询问了事情经过及被捕人员情况，随后，又心急如焚地赶往库浪村，了解那里农民军的情况。在库浪村，他遇到了农民骨干、共产党员曹叔明，曹向陈云详细汇报了农民军失利的经过。陈云感到问题严重，必须马上把情况报告省委。翌日，他便在曹叔明的陪同下，返回上海。

中共江苏省委了解了情况后，非常重视，立即派省委农运部长王若飞会同陈云、夏采曦一起设法营救吴志喜、陆龙飞等被捕人员。1月24日，陈云和曹叔明从上海赶往松江，与夏采曦取得联系。这时，松江已到处贴出悬赏通缉陈亨（陈云的化名）的布告，陈云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他丝毫没有恐惧和慌张，仍像往常一样从容不迫地开展工作的。他先安排曹叔明到石湖荡隐蔽，自己只身找到吴志喜姐姐吴昌权家。吴的婆婆是地主，知道陈云是被通缉的，不敢留他住下，后吴昌权把陈云安排在一个穷亲戚家住下。

陈云住下后，便和夏采曦一起商议如何营救战友出狱。当时驻扎在松江

的是国民党的一个补充团，里面有共产党员，如能争取这个补充团起义，营救战友出狱是有希望的。于是，陈云通过监狱中的关系，送信给狱中的吴志喜、陆龙飞，告诉他们组织正在设法营救。但终因补充团内共产党力量薄弱，时间又很紧迫，营救战友出狱的计划落空了。陈云内心十分焦急和沉重。

吴志喜、陆龙飞二人被捕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他们义正词严地揭露国民党的罪行。在接到陈云从外边传来的营救信后，吴、陆二人也从狱中传出信来，他们坚强地向陈云表示：他们已经准备牺牲，这里危险，赶快离开，免得敌人发现后下毒子。他们还把牺牲时准备呼喊的口号写在信上。

1月26日，吴志喜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松江马路桥南笏冢高墩上。临刑前，吴志喜神态自若，向群众发表慷慨激昂

的演说：“共产党是工农贫民的党，我为共产党而死，为工农贫民而死，死也甘心！”接着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列宁主义万岁！”牺牲时年仅17岁。同日，陆龙飞亦被杀害于枫泾镇文昌阁。陆龙飞就义时，威武不屈，大义凛然，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大声吼道：“18年后，我陆龙飞还是个好汉！”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是杀不完的”等革命口号，吓得行刑的士兵不敢开枪，反动派只好更换行刑士兵。

陈云对吴志喜、陆龙飞二人一直十分怀念。1984年8月21日，青浦早期中共党员陆铨生之子陆恺悌受青浦县委委托，请陈云为吴志喜烈士题写碑文，陈云欣然同意。陆恺悌去取碑文时，见陈云已写了好多张，其中有“吴志喜烈士永垂不朽！”、“陆龙飞烈士永垂不朽！”两条。陈云心情沉重地对陆恺悌说：“陆龙飞和吴志喜是同时被捕牺牲的，我也给他写了一条，也要给他立个纪念碑。他们两人牺牲时都很英勇。”

吴志喜、陆龙飞两人殉难后，中国共产党在松江、青浦、金山地区的革命活动并未终止。在陈云和中共松青县委的领导下，部分党员在松江北门、淞县张贴悼念吴志喜、陆龙飞的文章，还秘密为二人召开追悼会。袁世钊等在石湖荡附近钱家草、屈家浜等地，召集农会积极分子开会，研究为吴志喜、陆龙飞报仇的方案。中共松青县委还以松江共产党支部名义，抄写了《共产党宣言》，张贴在松江城厢地区。松江、青浦、金山地区的农民运动此起彼伏，搅得地主豪绅和当地反动政府不得安宁。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把松、青、金地区的农民抗租风潮归罪于青浦县政府，撤了青浦县县长韦松琴的职，逮捕了青浦县水巡队队长、保安团团总杨安青及青浦水警第3号巡船舱长徐日搅。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在枫泾、小蒸等地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农会会员及其家属。2月21日，国民党松江驻军团部、松江县政府贴出布告，通缉“枫泾区案犯”陈云等20余人。陈云等已无法在松、青、金地区立足。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陈云把已暴露身分的共产党员、农民军和农会骨干转移至上海，自己则秘密返回练塘舅舅家。

陈云自返乡后，为革命事业日夜奔忙，很少回家看望舅父母。舅舅、舅母知道陈云干的是为穷苦人翻身解放的大事，很为他的安全担心。舅舅拉着

《吴志喜烈士》，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10期，第7页。

杨明辉：《英勇的陆龙飞》，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10期，第14页

陆恺悌：《陈云伯伯与我的一次谈话》，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10期，第1页。

陈云的手，流着泪劝说他不要再做“造反”之事，并准备为他成亲。见到二老难过的样子，陈云心里像针扎一样难受。他从小失去了父母，是舅舅、舅母抚养他成人，他怎忍心让他们这样伤心和惦念呢？但此时的陈云，已是一位坚定的革命战士，早已把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他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冷静地对舅舅和舅妈说：“不推翻现在黑暗的社会制度，个人及家庭问题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到了革命成功时，每人可以劳动而得食时，人人家庭都可解放，我的家庭也就解放了。”舅舅见他态度这样坚决，也就不再阻拦。

陈云与舅舅、舅妈商量转移的地方。舅舅认为，往东近上海，熟人太多，不易隐蔽；去乡间，一个上海来的青年突然在农村出现，也太引人注目。最后，舅妈主张，最好往西去浙江嘉善李桂卿家隐蔽。那里人地生疏，较为安全；另外，嘉善地处江浙两省交界地区，又是水乡，出入很方便。于是，陈云辞别了舅舅，在舅妈的陪同下，乘小船前往嘉善李桂卿家。

坚持斗争

李桂卿是陈云舅舅廖文光的挚友，原在练塘元康南货店学生意，后来到万泰源当伙计，常来廖家，对陈云比较熟悉。在万泰源干了一段时间后，李桂卿回嘉善老家，在浦弄口开了一爿麻饼店，但两家往来始终没有中断。

陈云到李家后，化名李介生，与李桂卿叔侄相称，陈云呼李桂卿夫妇为三叔三婶，李桂卿夫妇则对外佯称这位李家宗侄因病失业，回来暂住。

陈云来嘉善后，与党组织始终保持联系，党的活动从未间断过。他有时去上海，有时去松江农村，指导、联系当地党的秘密工作，坚持领导着松、青、金、平、嘉一带的农民革命斗争，有时他还与李桂卿一起到镇上卖鱼桥茶馆、附近农村茶馆喝茶，了解各方面情况，听取群众的呼声。

经过大革命风暴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在认真总结经验，摸索着中国革命的规律。1928年6月18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总结了大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盲动主义错误，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并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会后，中共中央批评了中共江苏省委在以往工作中的盲动主义错误，指出今后应扩大农民委员会的群众基础，普遍地组织农民赤卫队，注意小的斗争并力争胜利。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江苏省委调整了人选，徐锡根、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康生为省委委员，李富春任宣传部长、代理书记（书记徐锡根赴莫斯科参加六大未归）。为了加强对秋收斗争的领导，省委发出《关于江苏农民秋收斗争决议案》。《决议案》规定了秋收斗争的目的、策略和任务，决定为加强秋收斗争的领导，组织淞浦、沪宁、南通、淮盐、徐海、扬州等六个特委。

这年夏，陈云来到金山，住在甸山李新民家。在这里，他主持召开有30多人参加的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江苏农民秋收斗争决议案》的精神，并指示浦南区委组织工农（盐民）群众，发展党组织，开展抗租抗债抗税斗争，筹建农民武装，准备秋收起义，把金山（浦南）的农运斗争，引导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上来。

为了帮助金山建立农民武装，陈云还派袁世钊到金山，给浦南区委送去

三支短枪，接着又帮浦南区委购置了12支盒子枪。

8月，袁世钊等来到嘉善，陈云根据省委秋收斗争决议的精神，部署袁世钊、顾桂龙、王子琴等人回枫泾东面新浜等地农村，继续发动农民，重建枫泾区委，恢复农民协会。

依照陈云的指示和要求，袁世钊、顾桂龙、王子琴等重新回乡发动群众，首先恢复了铁路以南地区的工作，重建了枫泾区委，王子琴任书记。经过近三个月的努力，党组织和农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他们不仅在原来的大方庵、钱家草一带恢复了农会，而且还在西翼浙江省嘉善县的姚庄、里泽一带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到11月初，区委下属组织已有50多个支部，党员和农会会员六七百人，活动遍及10余个村庄，积极开展抗租抗税斗争。

随着松江地区农运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加强组织领导的问题日益突出。陈云敏锐地感到，如果这个问题不尽快解决，斗争的进一步深入将缺乏组织上的保障。于是，陈云在同夏采曦分析、研究了松江区党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后，于7月28日向中共江苏省委负责宣传和农村工作的何孟雄作了书面报告，详细地汇报了大革命失败后淞江区党的工作、干部状况、群众情绪等方面的情况。陈云在报告中说：松江区的群众革命情绪，尤其是枫泾和小蒸地区正在高涨，但因为县委不健全，故未抓住机会去恢复和开展工作。陈云认为他可以负责枫泾、小蒸一带的农运，或者也可在松江城乡兼顾一些，但希望省委将夏采曦调回松江，负责浦南及松江城乡的工作。

9月上旬，中共江苏省委派巡视员巡视了枫泾、浦南地区的工作。随后，省委决定，建立中共淞浦特委，由杭果人、陈云、严朴、林钧、顾桂龙等五人组成。9月13日，中共淞浦特委在松江钱家草村顾桂龙家召开成立会议，杭果人为书记，陈云为组织部长。特委辖松江、金山、青浦、奉贤、南汇、川沙、嘉定、崇明、太仓、宝山等10县，有130多个党支部，1700余名党员。淞浦特委成立后，陈云的活动范围更广了，他除了继续在松、金、青各县农村活动外，还深入奉贤、川沙、南汇等地农村，继续发展农运。

淞浦特委成立后，立即着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入了解各县实际情况，加强对各县的巡视工作；二是帮助建立各县的指导机关。陈云主要负责松、金、青一带党组织的恢复和农民运动的发动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松、金、青一带的党组织都遭到严重破坏。以青浦地区为例，自小蒸、枫泾暴动后，当地国民党政府先后进行了七次大规模武装搜查，小蒸、枫泾地区的农运骨干及群众被拘捕的就有180余人，被悬赏通缉的有24人。县委及多数党员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被迫转移他乡，青浦党组织基本上暂时停止了活动。1928年4月，江苏省委派王精忠先到嘉定，然后负责恢复青浦、黄渡、观音堂党组织的工作。与此同时，因遭通缉而在外隐蔽的观音堂地区共产党员顾达珍返回长浜村，与王精忠取得联系，白天隐蔽，晚上工作，积极发展党员。至7月，观音堂地区建立了长浜等两个支部及区委。9月，中共淞浦特委成立后，陈云对青浦地区党组织的恢复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9月下旬，陈云来到练塘，在中共党员、农运积极分子胡秉钺家秘密召开小蒸、练塘地区党员骨干分子会议，商量恢复中共青浦县委和整顿青浦基层党组织等问题。陈云在会上指出：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但不能轻举妄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必须采取隐蔽斗争，要加强团结，保持力量，继续活动。

陈云还指示观音堂地区党支部书记顾达珍，尽快与同志们接上关系，恢复党的活动，开展农运工作。顾达珍根据陈云的布置，立即召集李阿三、陆雪雄等党员开会，研究发展组织、恢复农会等工作。以后，顾达珍等在观音堂地区发展了一批党员，又建立了嵩子庙、火烧庙、森森庙三个党支部。

在陈云的指导下，青浦地区党员骨干经过一个多月的的工作，在青浦东乡黄渡、观音堂一带恢复了四个支部，有党员 40 余人；在青浦西乡练塘恢复了市镇支部，小蒸恢复了农民支部。11 月 3 日，陈云在淞浦特委向省委的报告中，反映了上述情况，并要求派人到青浦加强党的领导。

不久，中共淞浦特委决定成立中共青浦临时县委，由胡秉钺任临时县委书记，并派宋文光到青浦负责党的工作。

1929 年 2 月，陈云又一次来到练塘，在胡秉钺家主持召开中共青浦党员代表会议，会议连续开了两天。陈云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作了国内外形势报告，以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胜利、平江农民武装暴动取得的成功来鼓励大家树立斗争到底的信心。他代表淞浦特委宣布关于重新建立中共青浦县委的决定，并提出县委今后的工作总方针是：力求隐蔽，积蓄力量，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新党员，重点是整顿组织。会议最后决定建立县委交通站，东、西乡各设一个区委。

除了在青浦县从事党的指导工作外，陈云对松江、金山恢复党组织的工作也十分重视。1928 年冬，中共松江县委正式成立，不久，淞浦特委机关迁移至上海。陈云也辞别了李桂卿一家，离开嘉善前往上海。

指挥奉贤暴动

淞浦特委移至上海后，设在山海关路育麟里。山海关路位于新闻路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之间，东起梅白格路（今新昌路），西至卡德路（今石门二路）。育麟里是一条旧式里弄，淞浦特委设在其中一幢一上一下的石库门房屋里。特委驻地对外声称是小学，门口挂着正德小学的木牌。

淞浦特委移至上海后，首先面临的便是如何领导奉贤农民暴动的问题。

奉贤庄行农民自从发动抗租抗债的斗争后，受到当地反动势力的严重压迫，眼看年关将至，土豪劣绅又要逼债了，庄行的农民一致要求起来暴动，烧毁庄行。

1928 年 12 月，奉贤县委向淞浦特委提出，把农民抗租抗税斗争发展到武装暴动，并希望特委派人指导。特委同意了奉贤县委的暴动计划，并提出三条原则：一是缴公安部队的械；二是杀几个豪绅地主；三是在地主豪绅处筹些款作为活动经费。特委同时决定派陈云、杭果人、严朴等三人去奉贤指挥暴动。

陈云和严朴奉命后立即前往奉贤，不久，杭果人也赶到奉贤，一同筹划暴动事宜。

1929 年 1 月 21 日晚 8 时，奉贤庄行武装农民 60 余人在茅学勤率领的江阴红军的配合下举行暴动。武装的农民分三路向当地反动派的大本营——庄行镇进攻。第一队由茅学勤、杭果人、严朴率领，进攻公安队；第二队由奉贤县委书记刘晓率领，进攻商会和公安局；第三队为放火队。暴动农民攻占了庄行公安分局，缴获长短枪 30 余支，焚烧了公安分局、商团、地主和奸商的住宅、店铺等，但在战斗中，也盲目侵入了一些农民家中。天明后，奉贤县反动政府闻讯派大批军警前来镇压，暴动队大部分人员安全转移。

小镇新街有一批地方恶霸，鱼肉百姓，无恶不作，民愤很大。2 月 6 日，

陈云又指导浦南县委组织党、团员 100 多人、“红队”队员 200 多人，发动了新街暴动，打击了新街小镇上的土豪张忍伯，烧掉其前埭房屋，焚烧了他家的田单地契，镇压了劣绅陆百希及缉私队队长张冷泉，给气焰嚣张的地方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百姓拍手称快。

这两次农民暴动狠狠打击了敌人，但是在白色恐怖下，这些暴动替代了群众的斗争，使党有脱离群众的危险，而且用焚烧的方法也是不可取的，为此受到了中共江苏省委的批评。陈云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暴动后，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两次起草书面报告，向省委详细汇报了淞浦特委两次讨论奉贤县委要求举行暴动的请求和特委作出决定的经过，以及奉贤暴动的基本情况，并在第二次汇报中认真检讨了这次暴动的错误。陈云在报告中说：这次斗争是由经济斗争转变为武装斗争的一例，是党领导的农民群众反抗地主豪绅、抗租抗债的行动，但暴动有明显的游民无产者的表现。“庄行斗争的行动，客观上是盲动主义残余的复活。”特委认为，决定举行这次武装斗争是不正确的，同时认为必须指出这次斗争中存在的错误，“以改变党的工作方法及一般同志的观念”。这次斗争的错误和教训是：（一）没有以正确的策略和方法领导农民抗租抗债斗争。（二）没有了解攻打城市是一种不正确的农民意识。（三）对城市小商人采取了不正确的打击态度。（四）没有宣传与组织市镇上的贫民手工业者。（五）斗争中缺乏很好的组织与集中指导。（六）斗争中没有扩大政治宣传，也有放松对反动派惩治等错误。

奉贤庄行农民暴动后，淞浦特委工作一度停顿。3 月，淞浦特委撤销，特委所辖各县由省委直接领导。此后，陈云调任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机智、顽强地坚持地下斗争。

四 在上海秘密工作的日子里

进入中共江苏省委

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于1927年6月上旬。成立伊始，它既是江苏省，又是上海市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机构。江苏省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它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秘书处和工、农、妇、军四个委员会，其管辖范围除上海和江苏省的党组织外，还曾包括安徽省的凤阳、泗县、宿县、灵璧、砀山、肖县和蚌埠等地党的组织。省委领导机关及其工作机构一直驻在上海市市区内。

1928年11月1日，中共江苏省委召开常委会议，陈云被任命为省委农委委员。但因当时陈云在沪宁一线巡视，并未到省委机关就任。

1929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调中央政治局委员、江苏省委常委彭湃去中央工作，为此，江苏省委于8月12日、15日连续召开会议，讨论调整常委人选及把军委与农委分开（原由彭湃一人负责）等问题。经过两次会议讨论，省委决定，增补陈云、李富春为省委常委，李富春负责军委和组织部，陈云因对外县和农运工作较熟悉，省委决定由他负责农委。

但就在这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以及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军委的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五人被叛徒白鑫出卖，8月24日，在中央军委机关开会时不幸被捕。彭湃在监狱里受尽各种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凭着钢铁般的意志，与敌人斗争到底。在狱中，彭湃、杨殷联名写信给中央。信中说，同案五人尽量设法避免死刑，如果不能做到，那么他们两人可做牺牲，请尽快营救其余三位同志，并请狱外同志不要伤心，保重身体。短短数语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高尚品质，表现了他们对真理的信仰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贞。中共中央调动特科的全部力量营救彭湃等同志，但都未获成功。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在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内，被敌人秘密杀害。

战友的牺牲，使陈云十分悲痛。他怀着对敌人的无比痛恨、对战友的深切哀悼和誓死继承战友遗志的决心，走上江苏省委常委及农委书记的岗位，开始了他在上海这个敌人统治中心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

9月8日，陈云出席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于8月31日发出的《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动群众书》的第47号通告。通告愤怒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残杀彭湃等同志的罪行，沉痛哀悼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号召人民学习烈士的高贵品质，以实际行动回答反革命的屠杀。会议认为，中央通告中追悼的同志，大部分是在江苏省工作的，因此，江苏要特别执行中央的指示。会议决定由陈云起草贯彻中央第47号通告的省委通告。

9月9日，陈云为江苏省委起草的第32号通告《号召广大群众反抗国民党屠杀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发出。通告指出：各级党部要用各种方式召集群众集会与示威，反抗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屠杀，追悼死难的领袖。在群众中要扩大宣传帝国主义、国民党残酷压迫中国革命，不断屠杀革命工农，一致向革命势力进攻的事实，在农村中间，要广泛宣传彭湃等同志是广东几千万农民的领袖，加紧今年秋收斗争的发动。

这是陈云进入中共江苏省委后，为省委起草的第一份文告。此时的陈云，已拥有较为丰富的基层工运和农运斗争经验、较为高超的秘密工作的斗争艺术，完全能够胜任党的中层机构的领导职务，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又向前迈进

了坚实的一步。

出色的外县巡视员

1929年3月,中共淞浦特委撤消后,陈云调任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负责在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南京等地巡视。5月,陈云遭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军事委员会通缉。在这种危急情况下,陈云一方面机智地躲避着敌人的搜捕,一方面从容不迫地坚持到镇江等地巡视检查工作达两月之久。

9月初,陈云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及农委书记后,省委又指派他负责常熟和扬州一带的联络与指导工作。陈云接受任务后,马上投入了工作。从9月4日至15日,在短短的11天中,他先后对常熟、丹阳、常州、苏州、无锡、扬州、南京等地党组织的恢复以及工运、农运斗争情况进行了了解,并在省常委会上作了汇报,提出自己对这些地方工作的意见。比如,他在了解了丹阳、常州农民斗争的情况后,明确指出,这个地方农民对抗租斗争的要求是解决土地问题。在这一问题上,陈云反对对土地要原价赎回的口号,认为这是后退的口号。在了解了丹阳地区党组织恢复及群众斗争的情况后,陈云敏锐地认识到,在这一地区的城市,党必须注意发动、领导工人的日常斗争;在农村,必须发动秋收斗争。在了解了南京地区的情况后,陈云也明确指出:这一地区目前首先应加强党在学生和码头工人中的活动。陈云的这些意见均得到了省委的重视。

陈云到无锡视察时,这个地方党的组织仅有两个支部。陈云到后很快发觉无锡工业有较大发展,从1928年到1929年的一年时间里增加了11家丝厂,工人斗争情绪日益高涨,特别是丝厂女工不断有自发斗争。如果党能抓住机会,加强领导,群众基础是不难建立的。他指导无锡地区的党员同志成立了一个区委、两个乡镇支部、一个农民支部,大大加强了这一地区党的领导力量。

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后不久,陈云便在外县巡视工作中显露出他卓越的才干。于是,9月中旬,省委又派遣他前往常州武进县指导和督促当地的秋收斗争。这是陈云初到江苏省委后接受的一项重要的巡视任务。省委为什么这时候派陈云去常州呢?

8月9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关于秋收斗争的通告》。《通告》指出,今年的秋收斗争中,不仅要扩大党在农村的组织,有系统地在农民中建立革命组织,同时要组织武装,建立游击队,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军做好准备。

根据省委的指示,常州武进县委经过研究,决定把秋收斗争的重点放在天宁寺佃户抗租斗争上,城市斗争主要采取合法的、隐蔽的斗争方式,以积极的精神配合天宁寺佃户的抗租斗争。如对天宁寺的抗租斗争取得胜利,则立即转向暴动,抗租委员会上升为行动委员会,率领群众把暴动地区和附近地区的地主武装全部解除,用来武装农民,并请省委军委派一批军事干部来帮助建立红军,开往苏浙边区去建立苏维埃政权。同时,搞兵运工作的同志要积极、秘密地组织士兵哗变,与农民暴动武装汇合。计划拟好后,武进县委即上报省委批准。

江苏省委接到报告后,十分重视,于9月12日发出了给武进县委的指示信,要求县委在农运方面特别注意天宁寺的农民斗争。为加强对农运工作的领导,省委感到有必要派一位经验丰富的同志作为省委特派员前去指导工

作。于是，陈云便作为省委的特派员前往常州，当时他化名罗思凡。

农历中秋节前两三天，陈云到达常州。为安全起见，县委的同志把他安置在前黄公学。前黄虽然也常有敌探出没，但是周围的谭庄、都家桥一带群众基础特别好。

陈云在前黄公学住下后，就在这里主持召开县委会议，传达省委的指示，并详细听取了县委关于武进工作的汇报。会后，陈云先找县委负责同志分别谈话，后又与前黄的支部书记陈枕白和支部委员邵产林、都家桥的支部书记周华、谭庄的支部书记徐祖英等分别谈话，询问那里的情况和群众的要求。当年任中共苏常特委巡视员的管文蔚在回忆中谈到，那是他第一次见到陈云同志，觉得陈云“考虑问题比较实际，工作作风深入细致”，在听县委同志的工作汇报时，陈云“十分认真，问得也非常仔细”。

在详细了解了武进的工作情况后，陈云对县委的同志说，常州这一段时间工作有很大成绩，但对城市工作，特别是工厂的工作注意很不够。关于农村工作问题，他说：武进东南乡如谭庄、运村、管庄、杨桥、寨桥等处，天宁寺佃户集中，多年来，寺方以浮收增加对佃户的剥削，群众普遍对此不满，党应该因势利导，开展公开合法的斗争。成立天宁寺佃户清算田租浮收委员会，搞抗租斗争是对的，要在这个基础上，把不种天宁寺田的农民也吸收到农会里来，造成声势。对天宁寺的斗争一定要紧紧抓住。天宁寺佃户斗争的扩大，一定能推动整个武进东南乡的斗争。至于武进西北乡，东西两面分别与江阴、丹阳毗邻，土地贫瘠，农民生活更为困苦。这两年来茅学勤等在武澄、武丹交界处的武装斗争，对他们有很大影响。在那里搞武装斗争，条件比较好，而且东西两面都可以互相支援。

陈云重申了省委9月12日给武进县委的指示信的精神：“目前敌人严密向我们进攻的时候，必然容易走向武装冲突的阶段，……我们必须准备力量，领导这一不可避免的武装斗争。”他指示县委的同志们，赶紧把抗租斗争搞起来，发展为秋收暴动，从而组织一支武装，拉到苏浙边区的山里，如郎溪、广德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任务是省委决定的，不能改变。

针对当时县委内部有的同志对这次暴动能否成功信心不足的思想状况，陈云结合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耐心地开导说：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以上，他们受帝国主义、封建地主的剥削、压迫很深。同时，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连年战乱，造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有利条件。因此，党决定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条道路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我们已建立了许多根据地，如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有了革命根据地；方志敏、邵式平在赣东北有了革命根据地；贺龙、周逸群等在湘鄂西有了革命根据地；彭湃在广东海陆丰，刘志丹、谢子长在陕西渭南，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在闽西，冯白驹在海南岛，也都建立了革命武装和根据地。这些都充分说明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是完全有可能的。根据这些经验，我们在苏浙边区建立一块根据地，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对此一定要有信心。

陈云深入浅出的一番话，有理有据，使县委的同志对今后的工作如何开

管文蔚：《陈三同志巡视武进与天宁寺佃户的抗租斗争》。载《江苏革命史料》第12辑。

茅学勤（1900—1929），江苏江阴人，小学教员。1927年冬由钱正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当时江阴后塍、杨舍农民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9年1月被捕，同年2月6日牺牲。

展有了明确认识，增强了他们搞武装暴动和建立根据地的信心。他们望着眼前这位面目清秀、个头不高、年纪很轻的特派员，心里很是钦佩。

9月18日，陈云离开常州。陈云走后，武进县委又在都家桥召开会议，商量组织秋收斗争的具体部署。会议最后确定秋收斗争分三步进行：第一，发动农民从清算天宁寺田租浮收，走向大规模的群众抗租运动。第二，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后，趁热打铁，组织一支一二百人的青年突击队，作为暴动的骨干力量，这支队伍尽量配备武装。第三，去郎溪、广德一带建立苏维埃政权。

按照这个计划，武进县委积极投入了暴动的准备工作。

秋收已近，天宁寺收租也将开始。

10月1日，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再次决定，派陈云去常州指导对天宁寺的抗租斗争。10月3日，中共常州县委为加强对抗租斗争的领导，成立常州天宁寺佃农三乡清算田租浮收委员会。10月4日，陈云到达常州。次日，陈云至天宁寺斗争区域，召集县委、区委和都家桥党组织负责人开会，讨论省委关于对天宁寺斗争的指示精神。

10月9日，武进天宁寺和尚钦峰、慧融、皓澄等前往武进太平乡官庄收租，张贴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10月7日发布的会衔布告，强迫佃农交租。清算田租浮收委员会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次日一早在前黄公学大操场上召开减租大会，清算天宁寺和尚浮收的田租，要求前黄、谭庄、都家桥、官庄等几个党支部连夜对群众进行动员，保证佃户联合会的300多家佃户至少每家去一人，按时到指定地点开会。

10月10日，中共武进县委农运部长蒋何畏在善堂庵主持召开佃农大会。下午4时，佃农大闹殷市桥，怒砸收租船，和尚被打，并勒令钦峰写下笔据：“不清算浮收，永不下乡收租。”和尚狼狈逃回城中。11日，县警察队到谭庄捕去徐祖英。次日，农民徐连法、王云士两人又被捕。14日，县委领导群众包围县府，要求释放被捕农民，遭警察镇压，蒋何畏等八人被捕，顾志鹤等多人受伤。事发后，陈云即返回上海，向省委汇报情况。

江苏省委听取了陈云的汇报后认为，对天宁寺的抗租斗争，充分发动了群众，取得了初步胜利，县委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县委参加打和尚、闹县政府等群众行动是不妥的。陈云在巡视中，未对此举加以制止，指导上是有失误的。陈云诚恳地接受了省委的批评，认真总结了经验，在10月20日为省委起草的《江苏省委致常州县委信》中指出：目前，在天宁寺佃农斗争中，尤其要提出反对地主阶级而实行抗租的口号和加紧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宣传，立刻召集“三乡清算浮收委员会”各分会、各乡群众会，以组织群众采取直接的革命行动，并发动天宁寺以外的农民，反对其他地主的苛捐杂税。在组织上，必须纠正过去的工作方式。县委是全县工作的指导机关，工作方式应该是指导和推动区委、支部的一切工作，而决不是代替区委、支部的工作。全体县委委员去参加打和尚、闹县政府等群众行动，这样的工作方式是要不得的，一方面是使党整个工作上受损失，另一方面县委代替了支部、区委的工作，就减少了提高支部、区委同志工作能力的机会，在地下党秘密工作条件下，这尤其是不允许的。

陈云的信表现出了一个职业革命者知过即改和对革命事业极端负责的态度。武进县在秋收斗争的发动方面是有成绩的，但陈云并未因此而文过饰非，对于指导方面的失误他毫不掩饰地承认了。陈云正是把认真总结失误中的经

验教训，作为自己不断成熟和进取的重要阶梯。这是陈云年轻时期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农委书记的谋略

农民运动是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内容。1928年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中明确指出：“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底真正统一”；“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为此，党在农村，必须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

根据中央精神和江苏农村的实际情况，1929年3月，中共江苏省委扩大会议指出，江苏的农民运动“要注意领导自发斗争，恢复暴动失败区域的工作，既要反对畏惧斗争的右倾情绪，又要注意纠正盲动主义的残余。农村斗争是以贫雇农为主体，并建立包括富农在内的农村中极大多数的统一战线，并加紧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的宣传”。9月，陈云到任农委书记后，江苏省委常委明确了农委任务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调查统计农村经济材料。第二，专门讨论外县农民斗争策略，特别要注意研究秋收和年关斗争的策略，以提供给省委。第三，恢复外县工作，与外县来人谈话。遵照这些指示精神和工作原则，陈云开始在农委书记这个岗位上，施展他的才华。

从9月到11月仅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陈云先后调查了崇明、苏州、盐城、丹阳、涟水、镇江、宜兴、常熟、如皋、淮盐、江阴等地的农民运动情况，并向省委作了汇报。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陈云先后代省委起草了致常州、扬州、苏州、崇明、丹阳、南汇、涟水、盐城等地县委的信。在这些信中，陈云对上海外县农民运动，特别是秋收和年关斗争，根据当地党组织和农运的实际状况，作了具体部署，对各县的农运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具体领导农运斗争的实践中，陈云逐步形成了对江苏农运斗争规律性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党领导江苏农村斗争的策略，有了较为系统的见解。

1929年11月18日，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期九天。会上，李立三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中央组织问题》的报告；康生作《江苏组织问题》的报告；徐锡根作《江苏职工运动》的报告；陈云则代表省农委作了《江苏农民运动》的报告。陈云对江苏农运的看法集中体现在这篇报告中。

陈云认为，在江苏农村，土地日益集中于地主阶级。各地除实行铁租制以外，预租制、押租制，收租使用大秤和大斗等，都在日益普遍化。苛捐杂税有60多种，高利贷和商业资本的剥削也十分严重。所有这些，使广大农民破产，无衣无食，以致造成江苏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抗租、抗税、抗债的斗争，四乡都有。如果这些日常的斗争继续向前发展，就会逐步动摇封建的土地关系，给国民党军阀统治以打击。

根据江苏农运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陈云认为，党领导农村斗争的任务和策略，目前应注意以下各点：（一）党在现时农民运动中的政治路线，仍然是加紧争取群众，组织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二）根据农民的迫切要求，有计划地在农村提出斗争的口号、任务和方式，发动农民开展抗租、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84页。

铁租制，指不论丰歉，地租额固定不变。预租制，指佃农向地主租种土地时，要预付田租。押租制，指佃农向地主租种土地时，要缴纳一定数额的押金，直到退佃时才归还。

抗税、抗债等斗争，并使这些日常斗争互相推动，汇合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总斗争。（三）党应该确立独立的农民运动政策。要打入刀会，争取其中的广大群众，但不应对刀会有过分的幻想。（四）要注意争取土匪中的农民群众。（五）有系统地建立各级农民协会。为了防止农民的分裂，不宜用佃农、贫农名义组织；在名称上也不一定单用农民协会，以利于把更多的群众组织起来。农会中要排斥富农，对富农领导的组织和斗争，要参加进去，夺取领导权。对黄色农会 尤应选用这一策略去争取群众。（六）地方党部要加强对农会中党团工作的指导，以巩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政治领导。

在上海市区的地下工作

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的上海市区内，设有七个区委，即沪东、沪西、沪中、法南、闸北、浦东、吴淞。各区地域的划分大致是：沪东区为提篮桥以东地区，闸北区为苏州河以北地区，法南区是法租界与南市的中国地界，沪西区以曹家渡康脑脱路为界，沪中区是公共租界市中心区。陈云任江苏省委常委后，除负责农委工作外，曾先后到沪中、法南、闸北区指导工运工作。

9月初，陈云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后不久，即被省委指派负责上海沪中区委工作。因当时外县农运巡视工作繁重，他未能立即深入到沪中区去。10月中旬，省委再度派陈云去沪中巡视。此时，陈云刚从常州指导武进天宁寺佃户抗租斗争返回上海，接受任务后，随即前往沪中。

陈云在沪中巡视近一个星期，除每日同党组织工作人员接头，了解情况外，还参加了三次区常委会，一次药业支部会。巡视后，陈云写了《沪中巡视记》，就沪中区群众和党组织的一般情形向省委作了汇报。

1929年以来，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国内蒋桂战争的影响，上海的经济开始衰退，资本家常以裁员减薪、加重工作、延长工时、停工关厂或大批开除等手段应付经济领域中出现的危机，工人生活更加恶化。国民党政府却借口军事时期，以“扰乱后防”为名，禁止罢工。因此，工人运动受到极大的限制，较之1928年更趋低落。沪中区的情况也不例外。自1929年以来，多是资方向劳方进攻，过去罢工争取到的条件许多被取消，但工人下敢起来斗争，主要是怕失业。沪中区的群众以店员居多、人员相对分散，担心失业的顾虑更重。另外，黄色工会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差不多每个行业都有伪工会。沪中区党组织的力量也很薄弱。陈云初到沪中区巡视时，区委只有书记和宣传委员两个人。沪中区下属支部名义上有八个，但比较健全的支部仅有估衣、药业、彩印、煤炭等四个；在区委挂名的同志约110人，能到会的不过50人；支部生活几乎已不存在。这样的群众状况和党组织情形，给陈云在沪中区开展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陈云凭着坚韧不拔的工作精神，深入到沪中区各行业店员和工人中，一边做细致的群众工作，一边寻找时机把群众重新组织起来同敌人斗争。

10月下旬，由于国民党军阀之间战争频繁，导致物价飞涨，上海各行业的工人不顾当局和资方严酷压制，纷纷起来斗争，要求增加工资和米贴。陈云抓住这个时机，把沪中区划分为估衣、药业、报界、煤炭、彩印五个工作

刀会，指大刀会，是带有迷信色彩的民间武装团体。产生于清末，同白莲教有密切关系。主要活动在山东、苏北、皖北一带，成员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在一些地区进行过反抗官僚、地主压迫和外国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并参加了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但也常被地主阶级利用来镇压农民的反抗。

黄色农会，指国民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农会。

中心开展工作，领导群众进行要求米贴的斗争，其中报界所进行的斗争获得了胜利。

10月27日，陈云在江苏省委全体会议讨论省委工作报告时，尖锐地指出：资本家向我们的进攻现在更明显了，工人都要斗争，但无人领导，如能把目前争取米贴的斗争坚决地发动起来，是可以发展为大规模的罢工斗争的。陈云的意见引起了省委的重视。从群众最切身的利益出发去动员和组织群众，这已被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运实践证明是一条成功的经验。

在领导群众进行争取米贴的斗争的同时，陈云还在沪中区积极开展筹备纪念十月革命节的群众革命活动。他在沪中各支部分别召开会议，研究了纪念活动的具体步骤和内容。区委准备了2000份宣传品，工联准备了2万份宣传品，还有四种小报，由各支部的宣传队散发；纠察队则预备在榆鸡桥、众安公司门口举行两个飞行集会。10月31日，陈云把沪中的这些准备情况报告了省委。

11月7日，上海工人、学生1200多人聚集在公共租界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一带举行示威，纪念十月革命。中共江苏省委于当日发出《为十月革命十二周年纪念告江苏民众书》，号召农民与工人、兵士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统治，没收地主土地，建立苏维埃政府。陈云率领沪中的150名群众，参加了这次较大规模的纪念活动。预先准备的宣传品，由于陈云周密的安排，也都在预定的时间内，分发到了各行各业，在群众中造成了广泛影响。

这年冬，上海美商安迪生灯泡厂部分工人准备组织俱乐部（属赤色工会）。但在1930年1月11日，俱乐部成立大会前夕，资方闻讯勾结国民党政政府逮捕了3名工人代表。13日，全厂800多名工人罢工，国民党六区公安局派警察到厂，强迫工人上工。冲突中，国民党六区区长及资方代表被殴打，警察开枪打伤4名工人，12名工人被捕。接着，大批美国水兵登岸，到厂驱散群众。

事发后，中共江苏省委于14日、16日、17日、19日连续召开常委会，讨论安迪生灯泡厂反对国民党压迫工会、屠杀工人的斗争。陈云均到会参加讨论和研究。省委对安迪生事件确定的主要路线是：“组织各厂工人的同情罢工以领导四郊农民、城市贫民、士兵群众的同情反抗运动和各学校的同情罢课，汇成总的反抗国民党帝国主义争自由的斗争与示威，推进同盟罢工的实现，争取总同盟政治罢工的前途。”2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的第70号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组织政治罢工和地方暴动，组织和发动国民党军队的兵变。

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的精神，以声援上海美商安迪生灯泡厂工人罢工为中心，积极准备五一总示威行动。3月，江苏省委决定成立五一总行动委员会。陈云任总行动委员会候补常委。与此相对应，省委决定各区也成立行动委员会。陈云兼任中共上海市法南区行动委员会书记及区委书记。3月22日，上海成立总行动委员会，并成立了全市五一纪念筹备会。

这期间，在省、市总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在南京路频频举行飞行集会。4月7日，上海工人在南京路新世界附近举行飞行集会，抗议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屠杀工人、学生，制造四三惨案，10余人被捕。5月1日，工人们在南京路上又举行飞行集会，群众高唱《国际歌》，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政权”等口号，并散发了大批传单，多人被捕。5月30日，南京路上又举行飞行集会，群众队伍从新世界直奔外滩，沿外白渡桥冲向北四川路，沿途高呼“推翻国民党政府”、“中国苏维埃万岁”、“推翻帝国主义，全世界无产阶级劳苦群众联合起来”等口号，并在中华艺术大学门前召开群众大会，一路上遭到军警镇压，多人被捕。陈云组织法南区的部分群众参加了这几次飞行集会，但他对飞行集会这种斗争形式的频繁采用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飞行集会这种斗争形式，起源于1926年五卅周年纪念。那大，邮局投递员骑卒飞驰南京路，呼口号，散传单，事先等候在附近的群众立即集合在南京路进行示威。飞行集会在革命正处于高潮时对迅速发动群众、鼓舞群众斗志确实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仍然频繁采用这种斗争形式，是否与当时的客观情况相符呢？陈云对此是有疑问的。在一次上海各区行动委员会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上，陈云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在南京路示威政治影响是有的，但是对于工人的讲演来说，还是分区好得多。不过分区讲演一定要避免飞行集会的方式。在当时“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上风的情况下，陈云能实事求是地指出飞行集会这种斗争形式的不适应性，是难能可贵的，充分体现了他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事实上，飞行集会到后来参加者越来越少，以至无法举行。这表明，飞行集会这种斗争形式在当时已是严重脱离群众的错误的斗争形式。

法南是上海的一个大工业区。陈云到法南后，把主要精力放在做铁路、兵工厂、造船厂、电车、丝厂工人的工作上。在这五个工作中，又以兵工厂的工作为重中之重。6月初，法南兵工厂资本家为赶制3000枚炮弹，雇了临时工。因他们工艺不熟练，导致炮弹爆炸，死亡40多人，伤18人。事发后，资方草率处理死者后事，激起工人不满，引发斗争。这一斗争引起陈云的重视，他和区委的同志一起研究了兵工厂的斗争情况，认为这场斗争不是一般的工人罢工斗争，而是一场反军阀的实际斗争，在斗争中应提出反对军阀战争，反对额外做工，增加工资三成，抚恤死者5000元，伤者500元等口号，并成立家属后援会。以陈云为首的法南区委提出的这些口号，与当时工人的实际觉悟和利益要求都是相符合的，因此，起到了迅速团结和组织群众的作用，使兵工厂的斗争更加深入。6月5日，陈云向江苏省委常委会汇报了兵工厂斗争的情况。省委常委会对兵工厂的斗争进行了专门讨论，认为要进一步深入地发动兵工厂反军阀战争的罢工，直至扩展到全上海，形成一场反军阀战争运动；法南区要成立后援会；各工会团体要加强宣传鼓动。陈云按照省委的指示，对兵工厂的斗争作了进一步的部署和指导，使这场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31年6月11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于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错误的的主张，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不久，李立三等人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随后又把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7月中旬，中共江苏省委为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的6月11日决议，执行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

领导江苏各地的暴动和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决定成立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其主席团由中共江苏省委、共青团江苏省委、上海工会联合会和中共中央派人组成。陈云被任命为总行委委员兼外县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并被派往闸北区任行动委员会书记。

从7月到9月，江苏省总行委在上海全力以赴地投入纱厂工人、法商、英商电车汽车工人、黄包车夫等举行的罢工运动，举行了七一六、八一、九七等三次闹市中心的示威游行和飞行集会，并在南汇县发动了泥城农民暴动。这些活动由于缺乏群众基础，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都失败了。几个月来的冒险行动，使几年来艰苦积聚的革命力量受到重大损失。到8月底，江苏全省仅存徐海蚌、通海两个特委，县委也从69个减少到22个。从1930年4月到9月的半年中，江苏被杀害的党员和群众有3130人，被捕1480人。血的事实使陈云对李立三的“左”倾路线产生了怀疑。

8月22日和2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的精神，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之后，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的指示和决定，开始纠正各地实际工作中的冒险主义错误。9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的组织系统，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政治罢工。为了处理执行冒险计划后的善后工作，江苏省委成立了上海工作委员会和外县工作委员会，把陈云从外县工作委员会和闸北区调回总行委主席团。

从1929年9月至1930年9月一年多的时间里，陈云先后被派往上海沪中、法南、闸北三个区从事艰苦的地下工运斗争。尽管这一时期的上海工人运动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而遭到严重挫折，但是曲折复杂的斗争使陈云在政治上更趋成熟，为他以后承担更重要的工作任务打下了基础。

进入中央领导机构

1930年9月24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全会批评了李立三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错误，决定立即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陈云与李维汉、李富春、王克全代表江苏省区出席了会议。在会上，陈云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开始了他进入中央领导层的革命里程，时年25岁。

六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共中央曾指示江苏省撤销总行委和上海市各区行委，恢复党、团、工会各自独立的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恢复上海市11个区（含四个分区）的中共区委员会建制。10月初，中共江苏省委改建为中共江南省委。江南省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管辖江苏（包括上海）、浙江、安徽三省党的组织，领导机关设在上海。江南省委是江苏和上海地方党组织统一的领导机构。陈云被任命为江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和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后又兼任妇女工作部部长。

在江南省委工作期间，陈云在总结前一段工作的经验教训时，对省委的组织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意见。在江南省委成立之初，陈云便向省委常委提出，省委要有集体领导，对工作大家都要负责；区委成员不宜经常调换，否则，对建立中心工作是不利的；要恢复巡视制度。不久，在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讨论组织问题时，陈云又指出：支部工作必须深入群众，必须深入到厂内，只有这样，党的路线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才能消灭尾巴主义。党与

群众组织要有所划分，不管在城市或农村，支部都不能代替群众组织包办其活动。要恢复团的独立系统，尤其是在外县。

1931年1月1日，陈云代表省委组织部在省委常委会上作组织工作报告，对支部、区委、省委的工作方式进一步提出改进意见。陈云尖锐地指出，现在上海党的支部的情形一般是退步的，应注意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一）党的中心支部要建立在重要产业之中，一区只能有一个或两个中心支部，而且要确保中心支部的作用；中心支部书记联席会议要经常召开。（二）街道支部要以街道和职业来划分，要有一个很强的干事会来领导，不仅要有宣传、组织干事，还要有妇女干事。（三）学校支部可并在街道支部，便于做城市贫民工作。（四）对支部成员要加强政治教育，办流动训练班。陈云认为，支部组织方式进行上述转变，是有利于区委集中领导和发动群众的。区委每星期要召开一两次较长的会议，讨论政治问题。工作要预先有计划，要有一个训练委员会专门培训干部。省委常委要减少每天接头时间，一星期开两次会，集中讨论大的政治问题。省职工运动委员会可取消，巡视委员会要成立，上海中心支部书记联席会议要马上召集。陈云的这些意见是针对当时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提出来的，对当时省委工作的改进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得到省委常委会的肯定。

除了对省委组织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建议外，对省委的宣传工作，陈云也从组织这个角度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

中共江苏省委曾有两份重要的报刊，一份《上海报》，是上海总工会的机关报；一份《红旗日报》，是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合办的机关报。《上海报》最初是由上海工人联合会创办的上海工人的报纸，每日一张，因篇幅较小，当时党内称之为“小报”或“日报”。1929年3月，根据中央对“日报的管理应由省委负责”的意见，省委常委会决定“日报”由省委接办，从此，《上海报》成为江苏省委的党报。该报由李求实、谢觉哉等负责编辑，因国民党政府不断查禁进步书刊，该报曾用过《白话日报》、《小沪报》、《天声》、《晨光》等名称。1930年8月3日，当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立三在江苏省行动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小日报和红旗合并，出红旗日刊，每天一张。”省委根据中央的决定，把两报合并，改称为《红旗日报》。由于《红旗日报》在上海地区出版，中央要求省委“对《红旗日报》在政治上、工作上应多加负责”。因此，中共江苏省委对日报的工作是十分关心的，并视《红旗日报》为中央和省委共同的机关报，积极承担了对该报的领导责任。

1930年10月初，中共江苏省委改为江南省委后，首先抓了创刊不久的《红旗日报》的工作，提出要扩大日报的发行面。陈云对此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建设性意见。10月28日，在江南省委扩大会议讨论党报工作时，陈云说：对于党报我们必须有正确观念。党报不仅是政治宣传工具，而且是群众集体的组织者，如果一个厂内有几个阅读者，就可以训练出最好的干部。会上，陈云首次提出和阐述了建立全肯发行网、通讯网的见解和办法，得到了扩大会议的确认。10月下旬，陈云为中共江南省委起草了《江南省委扩大会议关于（红旗日报）工作大纲的决议》，对建立全省发行网、通讯网作出了具体规定：（一）每一个工厂建立代派处，工人聚居的工厂建立工房代派处，学校、机关、街道都要建立各自的代派处。（二）日报在上海建立总发行部，在各重要城市、地方设发行分部。必要时小报可以送阅和张贴。（三）

在每一工厂、农村、兵营、学校、劳苦群众集聚之地，上海各区的中心产业，无锡、南通、杭州、芜湖、宁波、苏州、安庆以及上海各区设日报的采访员。

《决议》发出后，江苏建立发行网、通讯网的工作有了迅速发展，至 1932 年底，江苏全省自上而下独立的发行通讯网基本形成。陈云的这些意见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红旗日报》工作的展开，同时对其他革命出版物的工作也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陈云在江南省委工作期间所提出的一系列有关组织建设和宣传工作方面的建议，显露出一个党的中层机构的领导者少有的成熟、干练和远见卓识，因此，在 1931 年 1 月 7 日的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他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但仍担任江南省委的领导工作。

1 月 17 日，根据陈云的提议，中共江南省委又改组为中共江苏省委，领导江苏省和上海市区委党的工作，原属江南省委管辖的浙江省以及安徽皖北地区的党组织划归中共中央领导，安徽皖南（芜湖）、蚌埠（长淮）地区的党组织仍由江苏省委管理。在新改组的江苏省委中，陈云仍担任省委常委，分管上海市沪东、浦东、吴淞、铁总地区的工作和外县淞浦、沪宁地区的工作，并兼任省委组织部部长和妇工委书记。

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中，陈云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胆略，沉着、顽强地同敌人斗争着。他没有想到，一项更艰巨的任务，就要落到他的身上。

出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

1931 年 4 月 24 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

顾顺章，又名顾凤鸣，化名黎明、张华，上海宝山人，少年时入南洋烟草公司当学徒，后当钳工。1925 年五卅运动期间，顾顺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 年，顾顺章被中共中央派到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同年冬回到上海。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局成立后，顾顺章任局长，负责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1927 年 5 月，顾顺章在汉口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以后，顾顺章出席中共八七会议，由于片面强调工人出身，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 年 11 月，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顾顺章任委员。1928 年中共六大后，顾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兼任中央特科第三科（行动科）科长。

由于顾顺章长期负责党中央的保卫工作，掌握许多党的重要机密，了解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中共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也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因此，顾的叛变对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可幸的是，顾叛变的消息，被中共秘密党员钱壮飞获悉。钱壮飞是中共中央特科安插在敌人内部的一把“尖刀”，奉命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收集重要情报，以保护党中央机关的安全。此时，钱壮飞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后扩为中央调查统计局）科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当他破译出武汉绥靖主任公署拍给徐恩曾的关于顾顺章被捕叛变的绝密电报后，当机立断，派自己的女婿刘札夫，连夜乘特快列车从南京赶赴上海向党中央报告。

中央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得此消息后，异常冷静和沉着，他先找到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陈云商量对策。陈云和周恩来仔细地估量了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然后召集特科的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举行紧急会议。会议决定迅速采取挽救措施，全力粉碎敌人的罪恶企图：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好周密的保卫和转移工作，迅速调换顾顺章能侦察到和熟悉的负责同志的秘书，销毁可能落入敌手的机密文件；把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

迅速转移到安全的地区或调离上海；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置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各部门迅速进行紧急改变。当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等机关全部安全转移，国民党企图一举破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阴谋未能得逞。

虽然因及时得知顾顺章叛变的情况，上海党的机关未受到很大损失，但是由此引起的内部收缩，还是给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几年来克服重重困难，在敌人内部逐渐建立起的特情组织，部分遭到破坏，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特情关系杨登瀛，因为顾顺章的出卖而被捕。许多中央特科的骨干，如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李强等，相继转移离开上海。

此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的处境更加困难，活动范围被迫大大缩小，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会议难以举行。中央工作一度陷于停顿状态。1931年6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对今后特委工作的组织、工作方针、纪律等作了原则规定。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逐步稳定下来。但是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多久，新的打击又接踵而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了。

向忠发被捕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特别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康生（赵容）、陈云、潘汉年、邝惠安等五人主持中央特科工作，由陈云负总责。从此，陈云离开了战斗近两年的江苏省委，全身心投入了中央特科的领导工作。

中央特科始建于1927年11月。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机关从武汉陆续搬到上海。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地方大，容易隐蔽。此外，租界情况复杂，不登记户口，因此易找住处，设立机关、搞秘密活动便于掩护。上海的工作基础也很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工人群众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党中央机关设在上海的条件比其他任何大城市都要好。但上海的敌情也很复杂。一方面，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横行上海；另一方面，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力量也很强，有军队、警察、宪兵、特务机关等。此外，上海还有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一帮流氓势力，他们既为国民党服务，又为帝国主义服务。面对这样复杂的斗争局面，党中央要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必须建立自己的秘密保卫组织，严惩叛徒，保卫党的首脑机关的安全。1927年11月，周恩来奉命从广东来到上海。周恩来来到上海不久，便着手组建了中央机关的保卫机构——中共中央特科。中央特科共分为四个科：

第一科是总务科，负责总务事项。党中央在上海设立各种领导机关，需要有一个专门组织来负责后勤工作。找房子、办家具、建立联络点等，统一由一科办理。

第二科是情报科，负责情报工作。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各种情报，及时掌握敌情，开展对敌人侦探机关的反间谍工作。它的工作是党中央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严密统治的上海能否安全开展工作的前提条件。不及时、准确地了解敌人，就不可能有效地保卫自己。为此，情报科采取了“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办法，成功地把党的情报工作做到了敌人的心脏里，把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这样的优秀共产党员打入了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情报科第一任负责人就是后来威震敌胆的著名红军将领陈赓。

第三科是行动科，直接领导着一支威震敌胆的武装力量——红队，俗称“打狗队”。这只以保卫党中央安全，打击、镇压叛徒奸细为主要任务的“红

色铁拳”，以其神出鬼没的行踪，冷酷无情、及时准确的打击，令上海中外反动派闻风丧胆，使卑鄙的叛徒和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刽子手惶惶不可终日。但红队绝不是单纯搞镇压僧动的武装，一方面，它担负着保卫党中央安全、打击叛徒奸细的双重任务；另一方面，在情报科的支持。配合下，红队可以及时从敌人内部得到叛徒奸细的活动情报和罪证，先敌一步采取行动，防止叛徒奸细对党造成进一步破坏。

第四科是交通科，承担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秘密交通任务。1929年以后，由于红军的扩大，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原来的交通手段已不能适应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中央迫切需要和各苏区建立无线电通讯联系，于是特科设立了四科，由李强负责。1930年红军攻打长沙时，无线电通讯工作已初步搞起来了。

陈云担任中央特科负责人期间，除了四个科密切配合，协同行动外，还有两个重要的掩护机构协助工作。一个叫新生印刷所，它既负责秘密印制党内机密文件，又是上海党的一个秘密联络中心。另一个叫裕大南货店，负责党的地下活动经费的收入和支出。曾在这两个党的地下活动机关工作过的李伟基老人回忆说：陈云同志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胆量大，又很机警，对一个人可靠不可靠，有超人的辨别力。因此，由他布置的工作，极少出事。李老回忆了这样几件事：

——有一次，党的负责人决定在新生印刷所召开重要会议。在当时上海险恶的环境下，举行这样一个会议是很不容易的。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保证到会的人的安全，陈云想了个办法。他们在门口贴了张出租房屋的广告，参加会议的人都以看房子为名来到印刷所，等人到齐了，再把广告撕下来。结果会议开得很安全。

——陈云在地下活动中，很注意利用敌人的弱点。一次，一位重要的同志被关进捕房，但身分未暴露。当时，党组织有要紧的工作与他联系。陈云决定亲自去捕房与那位同志接触。特科的其他同志都为他的安全担忧，陈云却胸有成竹。他巧作安排，用钱打通了捕房的关系，顺利地见到了那位同志，完成了任务。事后他对同志们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钱的作用不可小觑，应该善于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只要把钱花得恰当，我们在敌人堡垒里进出是完全可能的。”

——陈云在地下活动中，还很注意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为我所用。裕大南货店开张时，陈云估计到会有一批流氓来讨所谓的“喜钱”（开门钱），如果不打发他们，那么在开张的头三天里，大小流氓就会强赊硬买，买下东西不付钱。于是，他花了40元钱，买通了捕房的包打听。结果开张那天，大包打听派了两个小包探，带着手枪在店门口“保护”了两天，使得大小流氓都以为这家老板有“后台”，一个也没敢上门。陈云花了这40元钱，不仅使南货店顺利开张，而且对以后开展工作，也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就这样，陈云凭着自己的胆量和智慧，怀着对党、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赤胆忠心，在军警遍布、白色恐怖森严的上海滩，为保卫中共中央和其他党组织的安全，打击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出色地指挥了一次又一次战斗，为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战友情谊

陈云负责中央特科工作时，中央特科一科科长是杨森，二科科长是潘汉年，三科科长是赵云，四科科长是陈寿昌。潘汉年是陈云最主要的助手。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1925年秋，潘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潘汉年在武汉、南昌等地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大革命失败后，潘汉年被组织上派往上海从事革命文化活动，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他代表党组织与鲁迅建立了联系，在1928至1929年的革命文学论战中，对论战双方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发表了《普罗文艺运动的自我批判》等文章，为纠正革命文艺界的宗派倾向起了一定的作用。1929年10月，潘汉年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论战双方及有关人员开会，传达了中央关于停止论争的意见，同时进行“左联”的筹建工作，在“左联”及不久成立的左翼文化总同盟中任中共党组书记，对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潘汉年一度调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不久便被派往特科，协助陈云负责特科工作。

潘汉年精明能干，在他的协助下，陈云领导中央特科处理了几件重要的事情。

一是惩处叛徒王世德。王世德绰号“老先生”，原是特科三科工作人员，叛变后，泄露了特科工作机密，给特科工作造成很大困难，后受到特科“红队”应有的惩治。

二是配合营救国际职工运动领袖牛兰及“夫人”。牛兰是太平洋劳动书记局秘书长，当时他和汪德利在上海做地下工运工作。为了工作上的便利，两人假装成夫妇。1931年6月间，他们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帝国主义无理逮捕，后又被国民党反动政府解往南京，关在“模范监狱”。

牛兰被捕后，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在牛兰和汪德利被解往南京时，上海地下党组织曾发动数千名群众赴上海北火车站示威，要求国民党反动当局释放他们。

牛兰“夫妇”被解往南京后，中国共产党继续设法进行营救。但营救活动有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要证明牛兰“夫妇”是蒋介石指使人抓的；二是要证明牛兰“夫妇”还活着。为了搞到这两个证据，必须获得牛兰从狱中写出的亲笔信。中央把这件棘手的事情交给了中央特科二科。潘汉年通过各种关系，买通了军统头子张冲，获得了牛兰的亲笔信，为营救工作提供了重要条件。

三是派遣宗益寿打入敌人内部。宗益寿是江苏宜兴人，1927年曾参与发动宜兴农民暴动。暴动失败后，他到上海参加了党的工会工作，改名孟平。后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和特科的安排，他在上海报上刊登《脱党启事》，打入敌人内部。在敌人内部他曾成功地保护了被捕的同志。

四是揭穿国民党伪造《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真相，这是陈云领导特科期间，与潘汉年一起处理的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

“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敌人用此化名，刊登伪造启事，目的是想诬陷周恩来，在中共广大党员和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以使中共溃散解体。此事是叛徒顾顺章勾结国民党中统特务黄凯（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驻沪调查员）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况股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的。此时，周恩来已经按照中央的决定，于两个多月前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

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叛徒顾顺章的造谣、诽谤，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是一定要坚决还击的。但当时周恩来已去苏区，所以就由在上海的临时中央研究对策，中央特科协同上海党的地下组织付诸实施，以反击国民党的攻击。当

时采取的主要反击行动是：

——在《申报》刊登《伍豪启事》。《申报》是上海很有影响的一家报纸，共产党和申报馆又有一定的关系。1932年2月16日《时报》刊出伪造启事后，中共党组织即派人给申报馆广告处送去临时中央代写的《伍豪启事》，以否定国民党反动派的伪词。但申报馆广告处的律师看后说：《申报》没有刊登《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所以不便刊登《伍豪启事》。

2月20日，申报馆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下，刊登了伪造启事。因此，党组织又派人于当日上午到申报馆询问：已登《伍豪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为何不登《伍豪启事》？申报馆广告处律师答称：铺保手续不合，不能刊登《伍豪启事》。几经交涉，在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的支持下，申报馆同意用广告处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这是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启事的一种方法。这则启事的作用有二：其一是使人知道有两个伍豪，因为《伍豪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已在《申报》登出，而又说伍豪有个启事未能刊出，可见后一个伍豪与前一个伍豪不是一个人；二是使人明白，后一个伍豪的启事是对着《时报》已登出的伍豪启事来的。这正如陈云在1972年6月13日指出的：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欺骗。

——在上海散发反击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诬蔑的传单。传单于2月20日发出，由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传单指出：“最近在《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堆中所登载的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在党内披露事实真相。2月27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第11期上，刊登了另一则《伍豪启事》。《伍豪启事》指出：《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同期《实报》还发表了题为《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标本》的文章。文章指出：“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谣，……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

——以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请法国律师巴和代登启事以否认伪造启事，进一步肃清其影响。巴和律师是《申报》常年法律顾问，付以重金后，他在3月4日的《申报》上刊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启事》说：“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有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做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同时脱离共产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与此同时，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也曾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布告》说：“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243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

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据国民党特务黄凯于1953年6月供称，伪造启事“丝毫未达预期的效果”，“好久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国民党反动派演出的伪造启事这一幕丑剧，最后仍以失败而告终。

陈云始终没有忘记同潘汉年一起并肩战斗的这段岁月。1981年11月，陈云在回忆特科工作时曾讲。在特科中，“潘汉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实际上是他领导”。

1955年4月，潘汉年因所谓“内奸问题”被逮捕并定罪判刑，政治名誉一直未能恢复，1977年4月14日，在长沙蒙冤病逝。

对此，陈云的心情一直十分沉重。潘汉年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党内了解他情况的同志并不多，特别是经过“文革”后，中央领导层中，与潘汉年共事过的仅有陈云一位了。因而，无论是从党的利益，还是从战友情谊角度讲，陈云都认为必须彻底搞清潘汉年的问题。

1978年11月，陈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上，率先提出了要重新评定“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文革”前遗留的某些重大历史问题。三中全会后，陈云便委托曾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刘晓收集潘汉年的材料，以查清问题。

1979年10月，陈云因病需要动大手术，手术前，陈云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有的事必须抓紧去解决，因而郑重地给当时任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写了一个条子，提出重新复查潘汉年的案子。对前来探望的姚依林同志，陈云也谈了这件事。在疾病威胁生命的严重时刻，陈云提出了复查潘案的问题，这一举动充分显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历史和事业及战友高度负责的精神。

1981年3月1日，陈云病情稍有好转，再次就潘案复查问题，专门致信当时已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及邓小平、李先念等人，信中说：“我认为潘汉年的案子要复查一下。”“我收集下一些公安部的材料，和与潘汉年同案人的材料。这些材料，并无潘投敌的材料确证。”而且，刘晓领导下的上海党的组织的完整保存，从反面证明了潘汉年并未投敌出卖组织或某一个同志。“我提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这件事如中央同意，可交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理。”3月3日，胡耀邦即批示按陈云的意见，由中纪委复查潘案。

同年11月18日，陈云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特科工作者”的座谈会上，又向当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询问潘汉年案复查的情况，并对在场的原特科工作人员说：“潘汉年的案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为他平反。我必信他将恢复名誉。”短短的几句话，凝结着陈云对战友的深厚情谊和无比的信任，它深深震撼着在场的每位特科老战士的心。

历史不容歪曲，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中纪委在公检法有关部门的配合下，根据档案材料和大量人证物证，彻底否定了强加在潘汉年身上的“罪状”及错误结论。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据中纪委的复查结果，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应予彻底纠正。《通知》还充分肯定了潘汉年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卓著功绩。

陈云因此而感到欣慰，他可以告慰战友的英灵了！

五 年轻有为的全总党团书记

出任于工运发展曲折之时

大革命失败后，白区工运陷入低潮，客观形势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在革命高潮时期实行的工运策略。

1928年7月，中共六大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了《职工运动决议案》，提出了新时期的工运策略。《决议案》明确了工运的任务不是马上组织暴动，而是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在斗争策略方面，《决议案》提出组织罢工时，必须估计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工人战斗力，要有充分准备，斗争口号估计不宜过高，等等。在组织形式上，《决议案》指出“反动工会有群众便须加入去争取群众”。这些关于白区工运任务和策略的规定，是中共六大对白区工运指导的正确方面，对白区工运的恢复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六大以后，城市工人斗争开始复兴，罢工次数和参加人数显著增长，革命工会会员也有明显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左”倾情绪又重新抬头。1929年11月7日至1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劳工大会。会议期间，正值蒋介石和桂系军阀在广西，特别是蒋介石和冯玉祥在鄂、豫酣战。同时，党领导的红军也有了新的发展。于是，会议的主要领导者对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已经日暮途穷，中国工人阶级在目前阶段，最根本的革命任务是“准备武装暴动，积极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会议提出“必须普遍的在产业区域的工人中建立坚固的赤色工会组织，”并且“要有独立的发展”。会议要求赤色工会“应该经常的在群众中公开宣传自己的纲领和主张，尽可能在群众斗争中公开起来领导，即或在极端白色恐怖之下，也应公开的利用各种会议，提出他的主张”，以争取群众，战胜黄色工会。这样，第五次劳工大会就正式取消了六大及其以后党在工人运动方面的正确规定和做法，重新采取了关门主义和盲目冒险的进攻方针。

第五次劳工大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情绪继续发展，先后发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第二次“左”倾错误和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从而使工运进一步误入盲目冒险主义的歧途。

1932年1月，上海沪西区的同兴、喜和等日本纱厂工人，为了反抗日本资本家的压迫，进行罢工。一二八抗战开始后，15个日本纱厂联合停业，把工人统统开除。中国的永安、申新等厂也因战争关系先后歇业。原有罢工工人加上新失业工人，共计4万多人，在中央职工部部长刘少奇的领导下，于1月21日宣布进行反日大罢工。刘少奇在领导沪西罢工中，一反过去以赤色工会出面领导罢工的做法，成立了沪西反日罢工委员会（简称“罢委会”），以“罢委会”的合法形式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募捐活动。他们不拒绝有抗日倾向的资产阶级的捐款，组织几千人包围“地方维持会”要求救济，包围国民党社会局代表，强迫他们签发救济米和救济款。他们用筹集的米和款开大锅饭，创造坚持罢工最起码的条件，使历时三个月的沪西大罢工成为上海民众反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重要力量。在斗争实践中，刘少奇总结经验，提出在群众罢工结束时组织公开的工会，同由国民党

脱离出来的工会联系起来，建立公开工会的系统，同时保留秘密工会系统的主张。为了使工会走出秘密状态，获得合法地位，他还提出上海工人反日救国会就可以当作赤色工会。

刘少奇的上述主张被推行“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完全否定。在此之前，鉴于王明将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也将前往中央苏区，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1931年9月，临时中央由秦邦宪、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1932年3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局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工会工作问题。会议认为，中央职工部和全总党团在领导职工运动中，不能执行中央的路线，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方式。会议批评刘少奇犯有对形势估计不足、在经济恐慌中不能组织工厂的罢工取得胜利、拒绝参加反帝运动、对黄色工会投降、有合法倾向、充满工团主义的领导等错误。会议决定撤销刘少奇的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和鲁生全总党团书记的职务，由陈云兼任全总党团书记，康生兼任中央职工部部长。

陈云就是在工运处于低潮、党内对如何开展工运斗争存在严重分歧的复杂的历史环境下，走上全总党团书记岗位的。作为临时中央的一员，陈云就任初始，并没能摆脱“左”的工运路线的影响，仍坚持以赤色工会的组织形式来领导工人斗争。4月6日，全总发出红五月计划，要求各地以竞赛的方法发展赤色工会会员。6月到10月，临时中央连续给山东、满洲、河北、上海等地省委和工会发出指示，摊派发展数字。同年10月，全总作出《对于白色区域十月革命节工作的决议》，把发展和巩固赤色工会作为最主要的工作，要求赤色工会小组必须去工人大会征求工人入会。上海纱厂工会必须迅速地在厂内各种群众会上去征求会员，发展5300名会员。烟厂要完成发展2000名会员的任务。《决议》要求每个赤色工会及革命反对派的会员，要从自己厂内的宣传、组织及领导斗争中去完成工联1万会员的发展目标。《决议》要求满洲、河北、山东等省同样要广泛地发展会员。但由于这种组织形式与当时的斗争环境不相适应，辛苦聚集的革命力量总是随聚随散，在白区发展赤色工会会员的工作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

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陈云是个理智的实干家，斗争中遭受的挫折引起他深刻的思考。在一次讨论南洋烟草公司工人斗争问题的会议上，陈云提到在斗争中提的条件要切合实际，斗争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应提出一些群众易于接受和了解的斗争组织名称，如“惨案后援会”、“工人自救会”等。他起草的《全总失业工人工作的决议》也指出：在领导失业工人斗争中，除了围绕目前赤色工会的基本任务提出动员群众的口号外，必须提出要求失业救济等一系列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口号来动员群众。要组织失业工人委员会。这些情况说明，陈云已在努力寻找适合当时斗争形势的合法群众组织形式来领导工人斗争。

“一个深晚”

1932年5月，国民党中央特务总部派大特务史济美（化名马绍武）到上海活动，筹备建立上海行动区。史济美到上海后，先在新闻路斯文里建立了接头处，由赵伯谦负责。不久，斯文里接头处就被陈云负责的中央特科给“端掉”了。史济美又安排叛徒陈蔚如在老西门电车站旁西阁里另建接头处。1932

年 11 月，在南京沿马路（职华路）东侧的石库门内正式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局上海行动区总部。上海行动区总部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为行动目标，疯狂地破坏上海的中共组织，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的行动日趋艰难，临时中央不得不把一些党的重要领导人转移出上海。

1932 年底，陈云受党组织的委托，秘密到上海北四川路鲁迅先生的寓所，去接应曾主持过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及其夫人杨之华。

瞿秋白自 1932 年党内接连出现叛徒后，一直受到敌侦探的追踪。当时他病得很重，不能远离上海，党组织把他安置在鲁迅家中隐蔽。虽然鲁迅也为暗探跟踪，但他还是尽全力把瞿秋白夫妇保护了几个月。随着上海特务组织活动的日益猖獗，中统特务对鲁迅的监视越来越严密，一个名叫刘翰荪的特务经常出入内山书店，监视鲁迅的活动以及与鲁迅交往的人员的动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瞿秋白的安全，也为了保护鲁迅先生，党组织决定把瞿秋白转移到其他地方。

这是 1932 年阴历十一月的一个夜晚。

陈云坐在一辆黄包车上，头上戴的铜盆帽压得很低，盖住了前额，身上的旧西装大衣的领子全部翻起，掩住了两颊。黄包车夫拉着车子经过市区纵横交错的小路后，在北四川路口 1 路电车掉头处停了下来。陈云付了钱，看看四周没有人盯梢，便迅速走进沿街的一座三层楼住宅的大门。这是一座分间出租的住宅，走进大门就是楼梯。陈云上了三层楼，按照同志事先告诉他的门上记号，找到了鲁迅先生的家。陈云轻轻地叩了两下房门，里面出来一位妇女。

“周先生在家吗？我是×先生要我来，与×先生会面的。”陈云问。

女主人听罢，很客气地把陈云请了进去。

这时，瞿秋白的东西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瞿秋白的几篇稿子和几本书放在杨之华的包袱里，另有一个小包袱装着他们夫妇的几件换洗衣服。

“还有别的东西吗？”陈云问。

“没有了。”

“为什么提箱也没有一只？”

瞿秋白安然地说：“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他又问陈云：“远不远？”

“很远，我去叫一辆黄包车。”说罢，陈云就要下楼去叫车。

站在一旁、神态庄重的鲁迅先生见此情景，急忙上前十分关切地对陈云说：“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说完，他就叫女主人去叫黄包车。

乘这段间隙，瞿秋白把鲁迅和陈云相互作了介绍。这是陈云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听罢秋白的介绍，他上前尊敬地说了一声：“久仰得很！”

鲁迅身着一件旧的灰布棉袍子，庄重而略带忧愁的面容、流露出为瞿秋白夫妇和陈云的安全而忧虑的神情。他担忧地问陈云：“深晚路上方便吗？”

“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碍事的。”陈云用安慰的口气回答他。

一会儿，女主人回来说：“车子已经停在门口。”

“走吧。”陈云边说边去帮助杨之华提包袱。

瞿秋白走到门口对鲁迅先生说：“我要的那两本书，请你以后就交给×

× 带给我。”他又指着陈云说：“或者再请这位同志到你这里来拿一下。”

陈云随即说：“隔几天我来拿。”

说完，他欲开门下楼，但回头见杨之华仍在与女主人话别，便又稍候了一下。

趁此机会鲁迅又叮嘱瞿秋白：“今晚上你平安到达那里后，明天叫××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

陈云一行三人走出了房门，往楼下走去。鲁迅和女主人在门口连声说：“好走，不送了。”

走到楼梯拐弯处，陈云回头望去，见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着他们，鲁迅仍是那副庄严而略带忧愁的面容，令陈云久久难忘。

瞿秋白也回过头来，深情地对鲁迅先生说：“你们进去吧。”

鲁迅先生没有作声，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陈云他们走完第三层楼梯，到了第二层楼梯的时候，才听到三楼上“啪”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此后，陈云再未去过鲁宅，这是他第一次会见鲁迅，也是他最后一次会见鲁迅。

1936年，正在苏联列宁学院学习的陈云得知鲁迅病逝的噩耗，鲁迅先生身穿灰布棉袍、庄严而略带忧虑的形象立刻在他脑子里浮现。于是，陈云提起笔来，记叙了那个与鲁迅先生唯一一次会面的不寻常的夜晚。文章以《一个深晚》为题，以史平为笔名，发表在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办的《救国日报》上，文中写道：

鲁迅虽然死了，但鲁迅的思想却深印在中国百万青年的脑子里。鲁迅的“坚决、不妥协的反抗”的精神，永远遗留在我们中国青年的思想里，将领着他们走上解放中国民族与解放劳苦大众的光明大道。鲁迅虽死，鲁迅的精神不死。

批评“左”倾经济政策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方针的错误推行，加之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困难，到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已无法在上海立足了。

1月13日，中共临时中央局根据共产国际的提议，决定把党中央机关迁往苏区。当时留在上海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成员有博古（秦邦宪）、康生、陈云、李竹声。临时中央局决定博古、陈云去江西苏区，康生去莫斯科，李竹声留在上海当中央代表，代表党中央指导国民党区域的党的工作。

1月中旬，陈云同博古等从上海乘船至广东省汕头，然后经福建省上杭、长汀等地抵达中央苏区瑞金，住在沙洲坝下肖村。不久，中共苏区中央局与中共临时中央合并，开始仍称苏区中央局，后改称中共中央局。从此，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陈云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党务委员会委员。

与此同时，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也由上海迁至中央苏区，并同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并，改称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既领导苏区的工运工作，也领导全国的工运工作。刘少奇任委员长，陈云继任党团书记。

苏区的环境与白区截然不同。苏区人民除了积极准备反“围剿”战争外，建设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是党、团、工会共同的重要任务。陈云到苏区后，对苏区的经济问题给予很大的关注。

苏区多是反动力量比较薄弱，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这些地区在革命以前，封建残余的压迫是主要压迫形式，一般没有近代产业和产业工人。富农经济也不发达，雇农很少，有些地区仅占总人口的1%。手工业多停留在自给自足阶段。手工业者的人数虽比雇农多，但也散居乡里。商品经济不发达，店员人数很少。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为了满足军需民用，发展苏区工业生产，特别是建立和发展军需工业就显得更加迫切。1933年前后，在中央苏区和其他各苏区普遍建立了一些国营工厂，如枪械所、子弹厂、炸弹厂、炼铁厂、被服厂、造纸厂、造币厂、制糖厂、卫生材料厂、试验厂等，并开发钨、煤、铁、锡等矿。苏区还组织了许多手工业工人参加生产合作社，组织农民搞运输，开设商店。

在这些工厂和企业中，如何处理好雇主与工人的关系，以利于苏区经济的发展，是苏区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并没有成熟的经验。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虽然体现了保障工人阶级利益和工会组织权利的思想，体现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但是由于照搬了苏联的劳动法，其中有许多不适合产业极不发达的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的条文。如该法规定：除每周休息一天外，工人每年连续工作六个月以上者，至少有两个月例假，工资照发。除新年、五一放假外，其他几个纪念日均放假一天。该法片面强调工人福利，规定雇主除支付工人工资外，还要支付全部工资额的10—15%作为社会保险基金；雇主要发给工人工作服、手电筒、牛乳等劳保用品；工人参加社会工作，无论时间久暂，都不得克扣工资；工厂要出资建造工人宿舍，无代价地分给工人及其家庭，等等。这些规定都是雇主难于承受的。此外，在税收、企业管理等方面，还有一系列不利于私营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这些不适合苏区实际情况的政策被强制实行的结果，产生了消极作用，给苏区的经济建设造成了危害。苏区内一度出现了私人企业倒闭、失业工人增加、师徒关系对立、学徒大量减少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现象。

陈云到苏区后不久，便同刘少奇一起到汀州检查指导工会工作。在检查工作的过程中，他很快发现工会在执行《劳动法》时存在“左”的错误。回到瑞金后，他和刘少奇一起立即召开闽赣两省职工联合会委员长联席会议，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

4月，陈云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9期发表《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文章指出：苏区工会在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中，存在着一种极端危险的“左”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只看到行业的狭小的经济利益，妨碍了发展苏区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利益。例如：机械地执行只适用于大城市的《劳动法》，实行八小时和青工六小时工作制；不顾企业情况提出过高的经济要求；强迫介绍失业工人到企业中工作；在年关斗争中，在许多城市到处举行总同盟罢工。陈云在文章中分析了“左”的错误的危害，指出上述做法使许多企业作坊倒闭，破坏了苏区经济的发展，破坏了工农联盟，破坏了苏维埃政权，破坏了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陈云在文章中还深刻地分析了“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科学地提出了纠正“左”倾错误的措施。他认为：“左”倾错误来源于政治上的“工团主义”和领导作风上

汀州即今福建省长汀县。

的“官僚主义”，因此，必须教育工人放开政治视野，把争取日常利益的斗争和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最密切地联系起来；党和工会要审慎地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形，规定适合于每个企业的经济要求，不能千篇一律地抄录《劳动法》；在斗争方式上，要克服不发动群众、命令群众的错误；在斗争艺术上，要分裂资本家的团结，组织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陈云指出：“党和工会只有这样去了解实际情形，给予各种工人以具体的领导，才能提高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取得工人的信仰，团聚群众于我们的周围。”

陈云对“左”倾经济政策的严厉批评，引起了苏区工会的注意。继陈云以后，张闻天、刘少奇也纷纷撰文，批评苏区工运中“左”的错误。他们的正确主张，对苏区经济工作的健康发展起了正确的引导作用。1933年4月和5月，全总苏区执行局召开的中国农业工人和店员手工艺工人代表大会，检讨了千篇一律地照抄和机械执行《劳动法》的错误；明确了应当灵活运用《劳动法》，根据企业的特殊情形，订立合同；指出把资金集中于工人管理，学徒对师傅要求过高和举行同盟罢工是错误的。会后，各业工人根据实际情况修订劳动合同，逐步纠正了经济斗争中的“左”的错误。1933年10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经过修改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

在福建汀州的视察

1933年6月，为了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的错误，陈云再次到福建汀州视察。

汀州不仅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被称为“红色小上海”。在巡视中，陈云发现中央苏区的职工会过去虽然领导工人与雇主签订了许多劳动合同，但合同的条文大多是照抄苏维埃政府的《劳动法》和江西、福建两省工会颁发的斗争纲领，没有地方性，没有企业的特殊性，不能适合当时企业的实际情形。所以，许多合同签订后没有执行，有些合同的条文连工人也感觉到难于实行。例如，合同规定木船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店员到星期日可以关门休息，等等，都是不切合工作实际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合同与实际情况脱节的状况呢？经过仔细了解，陈云发现，在签订合同时，工会领导机关没有发动群众积极讨论，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没有正确地认识到合同上的每一条文必须是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工会领导机关常常拿了自己起草的合同条文，交到群众大会上讨论，就是这样的“讨论”，也常常以举手的方式马马虎虎“通过”。

针对苏区在签订合同中存在的上述问题，陈云决定亲自参与汀州京果业重签合同的全过程，指导企业重新订立劳动合同。

在汀州京果业签订合同之前，陈云先找了两个党员，详细询问了京果业的营业情况、上半年订立的合同的执行情况、工人对五一代表大会的态度以及企业在目前的情形下订立合同的意见和要求。经过了解，陈云知道了水西渡一仗以后，国民党加紧了对苏区的经济封锁，许多货物因为不能从上杭运来，汀州店铺只好从宁化等地远道买进，或者向上杭来的挑贩购买。由于成本提高、营业减少，有些资本家借口封锁，故意不进货。许多工人也感到原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五一代表大会，指1933年5月1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国店员手工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停止向雇主强迫介绍失业工人等纠正经济斗争中“左”倾错误的决议，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修正的劳动法草案，并且决定成立中国店员手工艺人工人工会，征调会员参加红军。

先的工资、福利要求过高，企业已不堪重负了。按照企业目前的情形，即使工人不拿工资，替老板无偿地工作，老板仍要亏本。陈云还了解到，四、五、六这三个月是该业生意清淡的时期，加上上杭完全被封锁的特殊情况，更增加了经营的困难。经过这番考察，陈云对京果业和工人情绪有了大概的了解，心里有了底。

随后，陈云连续主持召开了三次党支部会议，旨在以支部为中心去动员群众，加强支部对工人签订合同的领导，并通过群众工作巩固党的组织。

在京果业党支部的第一次会议上，陈云详细说明了五一代表大会关于纠正“左”倾错误的决议及新起草的劳动法草案的几个主要条文，考察了每个党员对五一代表大会决议和劳动法草案了解的程度，诚恳地要求他们把每个细小的疑点都提出来讨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讨论，到会同志的疑问都一一消除了。

在京果业党支部的第二次会议上，陈云仔细听取了党员们关于上半年签订的合同的执行情况的汇报，从中了解到这样一些情况：（一）不少店铺的老板拖欠工人工资，最多的达400多元。（二）八小时工作制完全没有实行。（三）星期日根本没有休息，做工也没有双倍工资。（四）店员每年有两个月的例假，大多数店铺都做到了。（五）合同的其他条款多半是照抄《劳动法》上的条文。陈云引导支部党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一致主张订立一个临时性质的合同，把工资、工作时间、星期日休息、例假、社会保险等问题归纳为六七个主要的条文，分派每个党员到各店去向工人宣传，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在京果业党支部的第三次会议上，陈云又听取了每个党员向京果业各店店员宣传结果的汇报，了解到工人对条文提出两条要求：一是星期日做工应有双倍工资；二是每月6元的伙食费不包括在工资内。

根据支部的意见和群众提出的要求，陈云指导拟定了合同的条文，由支部负责到各店召集工人征求意见，然后经过京果业工会、支部全体大会讨论，通过了合同的正式条文，选举了签订合同的五人委员会，领导工人同每家店铺的老板签订合同。由于合同条文切合京果业的实际，为绝大多数雇主所接受，劳动合同顺利签订了。

汀州京果业劳动合同的核心内容，表现在苏区工人最关注的工资、工作时间、星期日休息、例假、社会保险等五个问题上。新的劳动合同在这五个问题上规定的条文，既保护了工人的合法经济利益，又兼顾了雇主的承受能力；合同的条文不是呆板的，而是灵活的，富有弹性，便于操作。新合同深受苏区工人的欢迎。

陈云从汀州回来后，撰写了《怎样订立劳动合同》一文，发表在7月15日出版的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在该文中，陈云详细地介绍了他到汀州领导工人订立劳动合同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办法。由于汀州京果业的劳动合同符合实际情况，受到劳资双方的欢迎和认可，因而很快成为中央苏区私营企业劳动合同的范例和样本，被苏区各行业普遍仿效、推广。这种劳动合同的推行，对于改善苏区企业的经营管理，促进根据地工商企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大显身手

经过上海三年多秘密工作的磨练，陈云已成为一个具有较为丰富的斗争经验的职业革命家。特别是通过对党内几次“左”倾错误的反思，陈云对如

何正确组织、宣传群众有了较为深刻的见解。到苏区不久，中央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瑞金洋溪开学，陈云应邀到学校讲解工人运动史。他把自己在商务印书馆闹罢工以来积累的工运经验和生动实例融为一体，讲给学员们听，受到大家的普遍欢迎。

在苏区，陈云除了与刘少奇等全力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和指导工人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外，以他和刘少奇为首的全总苏区中央局还十分注意赤色工会组织的发展。在他们的推动和引导下，1933年3月，川陕省总工会成立；5月、9月，闽赣省、粤赣省职工联合会相继成立；1934年8月，赣南省职工联合会成立。除各省成立总工会外，中央苏区在1933年先后成立了中国农业工人工会、中国店员手艺人工会、中国纸业工人工会和中国苦力运输工人工会等四个产业工会，1934年7月，成立国家企业职工工会。中央苏区、湘鄂赣、湘赣、闽赣、闽北、闽浙赣及附近白区共有赤色工会会员25.66万人，如加上川陕苏区的10万人，全国苏区工会会员超过35万人。

在积极发展壮大苏区赤色工会的同时，陈云与刘少奇领导工会在建设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全总苏区中央局的积极动员和组织下，苏区工人在武装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中坚作用。在中央苏区，凡16岁至22岁的工会会员编为少先队；23岁至45岁的会员都加入赤卫队（军），成为红军的后备军或地方保卫力量，缉盗防匪，积极维护社会治安。苏区工人还积极参加支援前线的各项活动，为红军运送伤病员和各种军用物资。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了创建100万铁的红军战斗任务，并于6月6日发出《关于扩大红军的决定》。为响应中央号召，陈云与刘少奇向全总苏区中央局提出，以全总的名义，号召中央苏区工人带头参军，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正式成立。陈云出席了在瑞金城郊竹马岗举行的庆祝八一建军节盛大阅兵典礼和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誓师授旗仪式。

为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全总苏区中央局还响应苏维埃政府关于“要使工会动员它的会员群众都加入经济战线上来”的号召，积极动员和组织根据地工人参加苏区的经济建设。据当时不完全统计，1934年3月，仅中央苏区就办起了规模较大的公营工厂33个，涉及兵工、弹药、器材、造币、造纸、印刷、被服、织布、硝盐等多个门类，苏区的军需民用工业品一般都能制造。在公营企业中，工会还提出“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企业而斗争”的口号，号召工人增加生产，节约材料，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加强劳动纪律，并经常组织生产突击队和生产竞赛，保证革命战争的需要。为了充分发挥苏维埃船队在反封锁斗争中的作用，陈云还指示工会干部“要学会做生意”。为此，劳力运输工会以江口办事处为据点，派出人员率领船队，深入白区，开展贸易活动。

工会在加强苏维埃的政权建设中也作出了重要贡献。1933年至1934年间，仅中央苏区的各级工会就为党、政府、红军和各种群众团体输送了近万名工人干部。闽西、湘赣、赣南、赣西、鄂豫皖等苏区工会都积极推荐优秀工人参加各级苏维埃政权，充分发挥他们在政权建设中的作用。除此之外，苏区工会在土地革命和查田运动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央苏区正处在国民党反动派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双重围困的恶劣战争环境里，党和苏维埃政府只有最广泛地发动和依靠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才能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对此，陈云是看得十分清楚的。他在领导苏区工人开展经济斗争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大声疾呼反对官僚主义，改进领导作风。1933年4月，他到中央苏区不久，便针对苏区党和工会忽视工人经济斗争、经济要求的倾向，郑重提出：“党和工会对经济斗争的领导，必须纠正官僚主义。”他批评党和工会的某些领导人“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中间，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并不深入群众”，“忽视工人经济斗争，忽视改善工人生活”，认为这种错误是“与党在苏维埃运动中正确的路线不能并立的”。同年8月，他在《克服工会工作的落后》一文中，又针对党和工会严重脱离下层群众的倾向，严肃指出，党与工会“尤其是上层领导机关，必须肃清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必须坚决反对只有决议没有执行的具体步骤的倾向，坚决反对脱离下层群众的现象”。他要求各级工会领导干部要多做实际工作，保护工人的经济权益，建立社会经济部，反对资本进攻，救济失业工人，发动工人群众参加经济建设，巩固各级苏维埃政权。

为了使工会的干部能够形成好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陈云在1933年7月撰写了《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一文，发表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18期上。陈云在文章中写道：农业工人工会会有一个很努力工作的巡视员，他的工作优点是能够深入到支部中去。这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但是，他的领导方式十分呆板，不会具体活泼地领导。陈云在举了这个巡视员的工作实例之后，认真分析了他领导方式的错误之处，生动地阐述了如何克服官僚主义，提高领导艺术的问题。

这篇文章给当时的苏区干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给苏区干部印象更深的还是陈云身体力行的优秀工作作风。

1933年9月，为了解决第五次反“围剿”所需的枪炮弹药的供应问题，陈云在苏区全总国家企业部部长、军事工业委员会委员长马文的陪同下，骑马从瑞金出发，经七堡、九堡，于第二天中午到达中央苏区岗面红军兵工厂视察。

岗面红军兵工厂1931年10月始建于江西兴国县的官田村，1932年搬到瑞金岗面。它的设备和技术虽然落后，但对革命战争的贡献很大。毛主席、朱总司令、叶参谋长对这个厂的创立和发展都很关切。第一任厂长吴汉杰就是毛主席亲自委派的。高自立、杨立三、杨志诚、叶季壮等，都先后领导过这个兵工厂的工作。

陈云视察兵工厂，主要是了解这样一些问题：工厂每日生产的各种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工厂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情况；党政工团协调工作的情况；工人的团结教育与生活福利问题；供给制能否改为经济核算制，等等。其中有些问题当时很少有人研究。

陈云在工厂重点调查了枪炮科和弹药科，先后找了几十个人谈话。谈话时，陈云十分注意听别人讲，中间很少插话。遇到不清楚的地方，他才请人重复，直到了解清楚为止。职工们虽然是第一次和陈云见面，但由于他平易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同上，第9—10页。

同上，第11页。

近人，因此，大家都毫不拘束地和他谈厂里的事。

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下，工厂的各项任务都很紧迫，为了不给厂领导增加负担，陈云没有召集他们作专门汇报，厂领导有什么困难或意见，都在个别谈话中解决了。在短短的一个多星期里，陈云通过这种深入细致的个别谈话方式，不但弄清了他来兵工厂时带来的许多问题，还取得了一些预先未料到的收获。

陈云不仅工作作风细致，实事求是，在生活上也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在这次视察中，陈云与马文到达岗面兵工厂时已近中午，马文因有急事要处理，便同厂部总务科长打了个招呼，请他们安排陈云的食宿。当马文返回厂部时，已过中午，发现陈云还没有吃午饭，桌上只放着一只香烟罐子，马文以为是进口香烟，好奇地打开来。陈云见状，笑了笑说：“里面是辣椒粉，没菜的时候就用它下饭。”看着红红的辣椒粉，马文深为自己的疏忽而不安，立即去总务科联系炒了一盘白菜，打来了饭。陈云没有一句怨言，愉快地和马文同进了这顿简便的午餐。

视察了岗面兵工厂后，陈云又来到塞上红军兵工杂械厂，在这个厂，陈云发现职工们普遍对该厂李厂长意见很大，主要是因为他作风不民主，甚至打人、骂人，体罚职工。掌握了这些情况后，陈云与有关部门进行了研究，认为李厂长身上这种严重的军阀残余作风，妨碍了工人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已经成为生产的绊脚石，必须及时召开职工大会进行处理。

为了稳妥地处理好这件事情，陈云对李厂长的问题作了深入的调查。随后，他主持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在会上，陈云对兵工杂械厂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透彻的分析，并作出了给予李厂长撤职处分的决定，受到全厂职工的热烈拥护。

陈云果断处理李厂长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包括岗面在内的所有兵工厂。工人们对于共产党秉公办事、光明磊落的行为十分称颂，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兵工厂的产量迅速增长，有力地支援了苏区的反“围剿”战争。

50多年过去了，岁月如梭，往事如烟，但马文对当年陈云视察兵工厂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他在回忆中深情地写道：“陈云同志实事求是、深入群众、胸怀磊落、艰苦朴素的高贵品质，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

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

1933年冬，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加强临近苏区的白区的工作，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成立白区工作部，陈云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

陈云任白区工作部部长后，对开展临近苏区的白色区域的工作十分重视。他认为，积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对于胜利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有重大意义的。而且，临近苏区的白色区域的环境极有利于党在这些区域开展工作。一些过去是苏区、现在暂时沦入敌手的地方，群众都在为恢复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殊死的斗争。苏区四周的其他白色区域中，群众不堪军阀团匪、豪绅地主的屠杀、压迫，也在奋起反抗和斗争。群众斗争的形势，已经由消极的拖租与登山躲避，转变为从事积极的武装斗争和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这种形势的发展对党在白色区域内工作的开展，是十分有利的。

但是，当时党在白区的工作却处于落后的状态。为扭转这种局面，这年12月，陈云发表题为《粉碎五次“围剿”面前临近苏区的白区工作》的长篇

文章，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连续刊出。在这篇文章中，陈云着重批评了白区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陈云认为：白区工作之所以处于落后状态，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首要的问题，是没有积极地组织、发动与领导广大群众的日常斗争。他指出，以往的观点，“仅仅注意发展组织”，想“等到组织好了再领导斗争”，这是不能得到预期效果的。而想要能够发动起广大群众的斗争，党“必须领导群众一切日常斗争，才能从群众切身的经济的要求上，把群众斗争发动起来”。他特别强调：“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是组织群众与领导群众为政权而斗争的最重要的步骤。”这些日常斗争，就是“反抗强迫修路，反对限制卖盐（白区群众贩运盐、布等日常必需品进苏区，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来源）等等白区群众生活上的迫切要求”。“党在每一个环境中，每一个斗争中，提出的口号，必须是群众自己斗争的口号，每个口号必须为群众自己所了解，而且为了这个口号来斗争。”陈云还指出，党在城市中领导工人群众的斗争，也必须“放到领导工人日常经济斗争的任务上去”，例如，要求改良待遇与反对失业饥饿；在对敌军士兵的工作中，也要认识日常经济斗争的重要性，发动他们“要求发清欠饷”，“要求发清伙食尾子”，“反对官大大的‘合作社’的剥削”，“反对长官的压迫”等，“这些斗争的发动，都可以提高士兵反对国民党的情绪”。

“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注意客观实际，在白区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方面总是搬用一套机械的公式——小斗争发展成大斗争、大斗争发展成为暴动；他们常常提出过高的要求，把政治要求机械地加在群众的经济要求上，不顾群众的觉悟程度，提出一些群众不理解或接受不了的政治口号。这样就不能真正发动群众，也无所谓革命力量的积聚，每次斗争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对此，陈云是有切身体会的。因而，他特别强调注意领导群众日常的斗争，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斗争。这可以说是他对以往自己在上海工作的反思，也可以说是对“左”倾教条主义不顾条件，不顾群众觉悟，每一次斗争必须联系政治口号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在《斗争》连载陈云《粉碎五次“围剿”面前临近苏区的白区工作》一文后不久，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机关报《苏区工人》又刊登了陈云另一篇题为《福建组织“人民革命政府”与赤色工会在福建的任务》的文章。1933年10月26日，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代表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代表在江西瑞金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2日，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在福州成立后，双方又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停止了军事行动，确定了边界，并恢复了经济贸易关系。随后，从福建往根据地运去大量的食盐、布匹、药品、军械等物资，实际上部分地解除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十九路军成为国民党军队中第一支同红军实行停战抗日的部队。根据这一客观形势的变化，陈云及时提出，赤色工会的总方针是要利用一切公开的机会，发动广大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去开展各种各样的反帝活动。与此同时，赤色工会要积极争取实现在反帝运动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陈云关于组成广泛反日统一战线的思想，比以往工会片面发展赤色工会和下层统一战线的“左”倾关门主义策略，前进了一大步。

令人遗憾的是，中共临时中央局在总的指导思想上不仅没有摆脱“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反而把这种错误继续向前推进。

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会议极力夸大革命形势，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急剧崩溃，从而断定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估计这个问题将会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得到解决；主张集中火力反对中间派别，在反帝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只搞下层统一战线；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下，在党内和军内继续推进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这次会议几乎全面肯定了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使“左”的错误发展到顶点。

陈云出席了六届五中全会，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白区工作部部长。陈云在会上作了《白色区域中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报告。报告分为六个部分：（一）目前工人斗争的形势与三年来革命职工运动的状况；（二）领导与组织罢工运动；（三）黄色工会的崩溃及其积极的活动，党与革命职工组织在黄色工会内的工作；（四）党在失业工人运动中的任务；（五）为下层统一战线而斗争；（六）党在组织工人群众中的任务。在“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五中全会上，陈云代表全总苏区中央局所作的报告，不可能摆脱“左”倾路线的轨迹。他在1933年12月阐述的正确策略思想并未能贯彻于报告之中。全总的总的工作路线仍然是完全排斥黄色工会，片面发展下层统一战线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

但是，“左”的淫威阻挡不了睿智者对真理的探求。六届五中全会以后，陈云撰写了《福建事变中党在福建的职工运动》一文，批评党在福建事变时领导工人斗争中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阐述了必须联合一切派别的工人的斗争力量，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的思想。他尖锐地指出：“福建事变中我们党在职工运动中基本的弱点，就在不了解与不会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由于拒绝统一战线的关门主义的存在，“使我们党没有从工厂的基础上，在福建及时地开展伟大的革命运动。没有建立强大的无产阶级的阵地”。陈云在文章中明确写道：“统一战线在今天的福建（国民党重新统治以后）以至在整个白色区域中，依然是党在目前开展群众的运动，反对资本进攻，反对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国，反对法西斯斗争的最主要的策略，这一策略的正确运用，将保证我们党去开展更广泛的群众斗争，将保证我们党去争取革命运动的独立的领导。福建事变在职工运动中统一战线的教训一样应该成为全国的教训。”

6月7日，陈云又撰写了《建立白区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进一步总结过去“左”倾错误的经验教训，为中央提出了关于中央苏区临近白区工作的纲领性意见：第一，建立白区党和群众的组织，这是开展白区工作的第一步。第二，在建立白区组织中，要培养出当地干部，因为他们更了解当地群众的生活和要求。第三，白区同志的工作任务，是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发动群众拥护苏维埃和红军运动，组织和领导群众的反日、反帝斗争。第四，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反日反帝斗争，要活泼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争取更广大的群众团结在苏维埃革命旗帜之下。第五，发动群众开展拥护苏维埃和红军的运动，“在群众面前证明苏维埃政府是全国一切劳苦群众的救星”，“发动群众起来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第六，遵循秘密工作原则，在白色恐怖中保证白区工作顺利进行。第七，“地方党部要保证对白区

工作的经常领导”。第八，“一切工作方法，必须随着每个地方的不同情形来决定。一般的原则和方法，可以参考党中央各种决议，同时要审慎地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形来提出适当的口号，灵活地运用各种工作方法”。陈云的意见受到中央的重视，他关于白区工作的策略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白区斗争的正确路线和工作原则，是指导根据地的党和红军顺利开展白区工作的重要文献。因而，这篇文章作为前言被编入中共中央一本内部学习的小册子之中。

陈云在思考临近苏区的白区的工作策略的同时，把视野扩展到中央苏区四周许多介于红、白区之间的游击区域。对这些地区的工作，陈云也给予极大的关注。在巡视游击区域的工作时，陈云发现在游击区域内，游击队在孤立地坚持活动，没有发动当地广大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游击区域中虽有不少党员，但是没有党的组织和统一领导。“总的说来，游击区域中游击队和党的活动还没有给前进的敌人以极大的困难，还没有起吸引敌人到自己方面和阻止敌人前进的应有的作用。”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又撰写了《游击区域的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一文，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在游击区域内开展工作的主张。

陈云认为，要想使游击战争广泛地开展起来，首先要提高对游击战争重要性的认识。使一切党的组织了解发展游击战争是现时党的第一等任务，是主力红军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要坚决纠正“放弃游击区工作、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立即武装群众，发动群众，激进地与敌人作武装的斗争，不能把游击区域的党部变成“谍报小组”，仅仅实行消极的坚壁清野。其次，在游击区域中，党组织要建立集中的领导，党的支部应该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要保证游击区域中党组织和游击队坚持执行党的路线。要派遣最好的、最适当的、最有能力的干部去担负游击区域的领导。再次，“要纠正游击区域中的党组织和游击队脱离群众的错误，坚决反对那种不相信群众力量，不相信我们可以领导群众起来与国民党和地主阶级作坚决斗争的倾向”。

陈云关于游击区域的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的思想主张，为中央苏区周围广大游击区域的斗争指明了方向，及时纠正了这些区域党的工作和游击战争中存在的某些错误，有力地推进了游击区域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

从1933年1月离开上海到苏区，陈云在苏区根据地已工作了一年半时间。苏区的环境，相对于敌人统治严密的上海来说，要安定得多，这使陈云有机会把以往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提炼出精辟的思想。可以说，在苏区的一年多时间，是他著作的高峰时期，也是他思想升华的一个重要阶段。他关于抵制“左”倾经济政策、保护根据地经济发展的思想，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改进领导作风、体察群众疾苦、关心群众生活的观点，关于深入开展白区工作、转变游击区域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的主张，等等，都为中央苏区的经济斗争、政权建设和革命战争，提供了鲜活的、精辟的指导性意见。这些思想主张摆脱了“左”倾路线的束缚，闪耀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同上，第29页。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精神的光辉，也充分显示了陈云作为一个年轻革命家的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

六 长征岁同

任五军团党代表

1934年夏，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在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指导下，屡屡失利，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根据地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红军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极小。8月底，国民党军占领广昌的驿前。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线和北线都被敌人突破，西线和南线也形势危急，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经破灭，只剩下战略转移一条路。

为了摆脱极其被动和危急的困境，9月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准备进行战略转移，前往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0月上旬，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向兴国、于都、瑞金等地集结，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接替主力红军的防务。中共中央亦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在中央苏区的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1.6万余人坚持斗争。

此时的陈云更是心急如焚。一方面，他要与全总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安排工会系统配合红军的战略转移工作。他亲自找赣南省职工联合会主任王贤选谈话，通知他留守中央苏区，掩护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突击分散中央苏区物资，发动工农群众参加游击队，坚持敌后斗争，另一方面，他要马上到红五军团去就任中央代表。

在中央红军撤离前夕，党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给红军第五、第八、第九军团派中央代表，分别由政治局常委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凯丰（何克全）担任。在陈云受任前夕，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亲自找他谈话。

朱德向陈云简要介绍了红五军团的情况。红五军团前身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后，由赵傅生等按照党的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这个军团虽比红一、三军团成立晚，但过去是冯玉祥的部队，受过正规训练，善于打硬仗，在格斗中用大刀拼杀是出了名的，现又经过三年革命战争的考验，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

针对红五军团的特点和战斗作风，周恩来向陈云谈了中央的意图：一、三军团做开路先锋，八、九军团紧随其后，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居当中，最艰巨的殿后掩护任务由五军团担负。接着，周恩来一一介绍了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等人的情况。最后，他郑重地对陈云说：军团领导班子虽然很好，但殿后有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为了全军的整体利益，甚至要作好部分牺牲的准备。所以，中央决定派你去担任中央代表，负责掌握全军的后卫情况，果断处理紧急问题，以加强对五军团的领导。这实际上是赋予陈云最后决定之权。

陈云感到担子很重。他过去没有在红军中任过职，对部队情况不熟悉，也没有作战经验，挑这样的重担困难的确很大。但陈云在困难面前是从来不低头的。特别是在这样危急的时刻，党需要他做什么，他都将以最大的努力去做好。因而，陈云没有丝毫犹豫，他明确表示：将与军团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齐心协力、全力以赴地完成中央交给的后卫任务。

1934年10月18日，陈云随红五军团从曲利出发，踏上了长征之路。红五军团担负的全军后卫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但当时整个军团只有红十二师和

红三十四师两师六团人马。陈云协同董振堂、李卓然以及被把持中央领导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贬到五军团兼任参谋长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边组织行军转移，边深入连队进行政治教育和战斗动员。

部队出发的第三日，陈云便来到第十二师，向师干部们传达了当时的形势及第十三师的任务，并就西征行军中的几项中心工作作了具体的指示，要求第十三师的干部做好各项工作，以完成中央交给的重任。针对离开根据地后苏区籍战士开小差严重的现象，从11月4日起，陈云干脆与十三师官兵一起行军。行军中，他与战士们谈心，了解战士的思想状况。经过调查研究，陈云召开了政治工作干部会议，分析指出发生严重的战士开小差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政治动员不够；第二，特派员工作及政治机关的领导能力差；第三，连队支部工作不健全。在陈云的指导和帮助下，红十三师制定了具体的措施，做了认真的政治思想工作，使部队的开小差现象逐渐减少。直到11月15日随十三师最后冲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后，陈云才离开十二师回到红五军团总部。

这时，一场更惨烈的恶战正在酝酿之中。从江西苏维埃区域过来的中央红军，在桂林以北的湘江边受到敌人的阻击。在此以前，他们已经冲破了三道封锁线，转战了1150余公里。不说崇山峻岭间的崎岖山路、林莽荆榛，早已把他们的草鞋磨穿，军衣挂得破破烂烂，而且连续的转战奔波，敌军的穷追不舍，也难免使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感到疲惫。蒋介石认准这是消灭红军的极好机会，于是调集了40万人的兵力，企图把8万红军消灭在湘江之滨。

然而，红军却必须拼死过湘江。这不仅因为他们的战略意图是要进入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求新的发展，而且在此时此刻，任何的后退甚至犹豫都意味着死亡。于是，中革军委将一、三军团置于两翼，以五军团殿后阻击追击之敌，决心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迅速渡江。但是由于中央及军委纵队负载甚重，行动迟缓，所以，红五军团的殿后战斗异常艰苦，无数指战员英勇牺牲。陈云和军团首长为了组织和指挥战斗，曾连续几天几夜没有睡觉。

12月1日，红一、三、八、九军团和中央、军委两纵队终于冲破敌人重兵堵截，渡过湘江。此时，两侧敌人已开始急速沿湘江合拢，而五军团的部分部队仍滞留于东岸与敌人激战，如再不迅速渡过湘江，将有被敌军隔离包围的危险。为此，陈云写急信派人送给陈伯钧等，催促部队迅速撤离战场，克服一切困难，冲破敌人包围圈，抢渡湘江。红十三师接到命令后，连夜急行军45公里，抢在敌人合拢之前渡过湘江。而担任五军团后卫的红三十四师却没有来得及渡江，师长陈树湘以下大多壮烈牺牲。

在五军团日复一日的激战中，陈云始终与部队同甘共苦，和干部战士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官兵们十分热爱这位和蔼、沉着、年轻的党代表。由于五军团阻击任务紧迫，部队常常是吃不上饭，睡不着觉，陈云等军团首长更是如此。一次，陈云来到十二师三十七团，19岁的团政治委员谢良，想尽办法，搞来了鸡汤，煮了一点挂面，使陈云在多日的困乏中终于吃了一顿像样的饭。在艰难困苦中结下的战斗情谊，给陈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他一直记得这件事情。1936年，在西路军山丹战役中，谢良身负重伤，被迫锯掉左腿。到延安后，组织上安排他赴苏安装假肢，他去组织部办介绍信时，遇到陈云。陈云热情地挽留他吃饭。谢良怕麻烦老首长，一再推托，陈云坚持挽留，并真切地说：“这顿饭非吃不可，长征路上你不是还请我吃过鸡汤煮挂

面吗？”结果，陈云硬是把谢良留下，请他吃了一顿从苏联带回的马肠。

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

湘江战役后，部队继续向西北移动，进入了越城岭山区。越城岭当地称之为老山界，是南岭山脉的一部分。南岭山脉从云南东去，沿广西、贵州两省之间延伸与湖南、广东两省交界，入江西、福建。在广西、贵州、湖南边境这一带叫“越城岭”。这一带山峦重叠，树林茂密，东西长200多公里，南北宽100多公里，是苗民聚居的山区，所以又叫大苗山。

老山界是很难爬的。这是陈云以往从未见过的高山。他随红五军团抵达老山界的山脚时，已是太阳西下之际。吃过晚饭后，部队开始上山。夜黑天冷风大，队伍走得很慢，加之山路狭窄，大家走几步停一下。连续行军人极疲倦，便常有失足跌入山沟之事发生。夹在行军队伍中的陈云，不停地提醒前后的战士们走路小心。队伍越走越慢，预备的火把也一个个燃尽了，午夜过后，部队只好就地休息。大家不管地面是湿是干，横七竖八地倒地就睡。陈云与大家一样，脚步一停，顿觉困倦无比，也立刻进入了睡乡。

在红军过老山界之际，蒋介石及其参谋团洞察中央红军主力欲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命令“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在湖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近20万军队，设了四道防线，并很快布好了一个口袋阵。如果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将钻进敌人布下的口袋。

中央领导内部从过老山界起即就红军行军路线问题发生了争论。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李德坚持红军主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毛泽东从敌军重兵阻拦红军主力北上这一情况出发，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博古和李德仍主张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两项对立意见中，会议以多数通过一项决议，即红军继续西进，至于战略转移的大方向，留待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

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向贵州黎平进发。12月15日，红一军团攻占黎平，随即红军其他部队陆续抵达黎平。黎平县城位于山顶上，周围群山环抱，看不到一块平地。18日，中央政治局在此举行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这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中央红军去黔北的建议，正式决定放弃原定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这次会议改变了红军前进的方向，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

此时，红五军团仍担负全军行动的后卫任务，陈云因随五军团行动，距离中央和军委有几天的路程，未能参加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会后，应博古之约，陈云与刘伯承在洪州司与博古会面。博古向他们传达了黎平会议的决定，告诉他们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的计划而向黔北进军。陈云得知红军这一战略方向转变的消息，心中甚是欣慰。去湘西显然是自投罗网，而黔北地区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利于红军立足。他对毛泽东的建议极表赞同，因为这一转变将使中央红军避免全军覆灭的危险。后来，他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赤军由湘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赤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

队中都穿上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在黎平，中革军委为执行党中央新的战略方针，于当日决定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撤销红八军团，原红八军团部队并入红五军团；军委第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陈云担任政治委员。12月21日，陈云与刘伯承根据中央的命令，离开了红五军团，加入军委纵队行动，这无疑加强了中央的集体领导。

1934年底，军委纵队经过瓮安县的老坟嘴到达猴场（今草塘）。这时，“左”倾领导者又提出两个主张：一是主张不过乌江，二是回过头来与二、六军团会合。为了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央又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举行政治局会议。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翌日，陈云同刘伯承率军委纵队渡过贵州省最大的一条河流——乌江，随即进入遵义城。遵义，是贵州北部的一个重镇。它北靠娄山，南临乌江，是贵阳到重庆的交通要道，全城居住3万多人，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也是汉、苗、布依、回、彝等各族商旅云集的场所，市面十分繁华，既有新城，又有老城，一条河流从中间通过，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城市。在遵义，陈云与刘伯承分别被任命为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和司令员，负责遵义城的防卫事务。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历史掀开了具有永久纪念意义的一页。

陈云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了遵义会议。

会议开始由博古主持。他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敌人的强大。周恩来作了军事领导问题的副报告，实事求是地从主观上检查了原因，就军事指挥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作了长篇重要发言，他指出，博古、李德等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是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在指挥作战上是纸上谈兵，只是按照地图制定作战方案，不考虑实际情况。在发言中，毛泽东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陈云为开好这次会议作出了努力，并与毛泽东、张闻天共同被会议指定为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者。

2月中旬后，在红军从威信至泸定桥的行军途中，陈云向部队传达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陈云在传达中指出：

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参见《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

扩大会议认为我们没有胜利的保卫中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除了许多客观的而且重要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陈云分四个时期详细解剖了军事指挥中存在的问题，明确指出，从第五次反“围剿”至长征初期的军事指挥基本上是错误的。当时所采取的基本战略是单纯防御，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分兵抵御，使红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毛张王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作者注）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

陈云这份传达提纲被保存了下来，成为人们研究遵义会议的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这里还有一段为史学者们所重视的小故事。

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但由于当时条件困难，未能留下完整的资料，以至一些重要情节在党史研究和宣传中说法不一。1981年底开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对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开始只发现两份文件，一是《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1935年1月8日政治局通过）；二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1935年2月8日）。后来中央档案馆提供了一份珍贵的遵义会议传达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调查人员虽经多方核实，仍无法确定这份手稿是哪位同志写的。1982年4月，这份手稿送到陈云办公室。陈云仔细看了手稿后说：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迹，是我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时间大约是在威信到泸定桥的路上.....

这份珍贵的传达手稿的发现，为弄清楚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因而引起了党史界的高度重视。这是陈云当年预想不到的。

随军转战

遵义会议后，陈云和刘伯承率军委纵队由泗渡经板桥，翻越娄山关至桐梓、九坝。途中，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

此时，蒋介石已察觉中央红军可能北渡长江，急令川军刘湘集中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堵击，又令薛岳部和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当红军到达土城时，川军两个旅已先于红军到达赤水城，挡住红军北进的去路；尾追的川军也进至土城以东地区。

在前往土城途中，陈云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一起察看了地形，决心在土城以东青杠坡地区围歼尾追的川军郭勋祺部。但战斗打响后，发现参战川军的人数和战斗力远较预先估计的要强，双方形成拉锯状态。更为严重的是，川军后续部队两个旅已迅速增援上来，位于旺隆场的川军两个旅也从侧翼攻击中央红军。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7页。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毛泽东当机立断，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决定立即撤出战斗，改变原定从泸州至宜宾之间渡长江的计划，作战部队和军委纵队迅速从土城、猿猴场轻装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西进。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在赤水河上架设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

开完会已是傍晚6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又将陈云留下，当面交代任务：重伤员既没有担架抬走随军行动，又不能丢在阵地上不管，必须到火线上逐个抬运下来，安置到老百姓家中，付以必要的治伤费用；军委纵队笨重物资，应销毁、抛弃到赤水河中不落入敌手，但不允许把保证作战通讯，联络需要的电台处理掉。

接受任务后，陈云立即召集贺诚、杨至成、叶季壮、杨立三、宋裕和等人开会，给他们布置工作：集中大部分卫生、运输部门的担架，赶赴前沿阵地把伤员抢运下来，安置在镇内和附近村庄的老百姓家中，付给一定的医食费用；把所有修理枪支的机器和X光机等笨重物资销毁并投入赤水河中，但无线电台一台也不能丢弃。任务下达后，陈云亲临前线各点巡视，检查落实情况，彻夜未眠。到第二天早晨4时，他们已全部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此后，陈云随部队四渡赤水，攻克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南渡乌江，威逼昆明，日夜转战不息。

作为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同刘伯承、叶剑英一道，既要保证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军令、政令、指示的贯彻执行，又要严格要求统帅机关工作人员模范遵守纪律，做好本职工作。陈云深知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下，统帅机关严格和迅速地履行职责，是保证不失战机赢得胜利的重要条件。而要使统帅机关的工作人员有革命必胜的信念、饱满的思想情绪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必须有较强的思想政治工作。所以，不管战斗多么紧张，工作怎样繁忙，陈云总要挤出时间去做思想政治工作。当时首长没有秘书，许多重大问题均由一局的作战参谋具体办理。另外，二局、三局的情报、通讯联络工作也至关重要。因此，陈云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总司令部的一、二、三局上，经常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以保证部队作战、情报、通讯联络工作的顺利进行，出色地完成了中央和军委首长交办的各项任务。

超负荷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使原本就很瘦弱的陈云更加消瘦。一次，陈云去四军团办事，随四军团行动的邓颖超、蔡畅、康克清、刘英、刘群先、廖施光、杨厚增等八位大姐见陈云如此疲惫和消瘦，都很关切，问寒问暖。邓大姐还把一个吃饭用的小勺送给陈云。一把小勺微不足道，但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其中蕴含的战友之情却是无限深厚的，以至几十年以后，陈云仍对这件小事念念不忘。

4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以神速的动作分两路向西挺进，乘滇军主力东调入黔，云南后方空虚，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前进，直奔金沙江畔。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寻甸县哨口村发出了关于中央红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指示。

金沙江是长江上游的一部分，发源于青海。它从青海的玉树奔腾南下，经巴塘至石鼓突然来了个100多度的急转弯，甩开了和它并行的澜沧江和怒

江，独自掉头北上，形成了有名的长江第一弯。奔流的金沙江水，冲入海拔5000多米的哈巴大雪山和玉龙雪山之间，削出了3000多米深的大峡谷。这便是举世闻名的虎跳峡。咆哮的江水冲出峡谷，流到云南元谋、禄劝一带，这里江面渐宽。元谋县的龙街渡口，历来是川滇间的一个重要渡口；禄劝县的皎平渡，也是一个较大的渡口。金沙江因江底盛产金沙而得名。江边贫民多淘取金沙出售，以此糊口。金沙江流经四川、云南交界处的部分称金沙江，流入四川省宜宾县以下称长江。金沙江的两岸，都是高山峻岭，除几个渡口外，均为悬崖绝壁。从云南省境内由南向北走向金沙江边，离江30公里处，即开始下坡。连下20公里至皎平渡，从皎平渡至江边还有10公里，山势更陡，下山必须用手杖，否则就有滚下山沟的危险。

不管金沙江如何险恶，中央红军要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必须抢时间渡过金沙江。按原计划，部队欲分三路过江。不料，一军团到上游的龙街渡口时，渡船被敌人先我一步烧毁了；三军团在下游占领洪门渡口时，只缴获了两只小渡船，每次只能渡10余人，耗时太长。上述两个渡口均因江面宽，流速急，无法架设浮桥。只有中路刘伯承、宋任穷率领干部团一个营，昼夜兼程80余公里，于5月3日深夜，抢占皎平渡口，缴获了两只大木船，偷渡北岸成功。然后，他们又在上下游收集了五只木船，大的一次能乘30多人，小的能载10余人，如果昼夜不停地摆渡，全军用五天多时间就能渡完。

为了组织红军全部人马顺利渡江，中央和中革军委特组织渡江指挥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直接指挥全军的渡江工作。陈云自长征以来对部队有条不紊的指挥才能已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认为他很有组织能力，即任命他为渡江指挥部政治委员，与毛、朱、周、刘共同组织部队过江。

自5月3日晚部队开始渡江后，陈云便与周恩来夜以继日地轮流到江边，具体指挥七只木船昼夜往返南北摆渡。在他们的指挥下，到5月9日，全军井然有序地从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

两天后，敌人赶到金沙江南岸时，红军已达会理，敌人只得隔江兴叹。从此，红军跳出了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在部队渡金沙江的过程中，同志们再次目睹了陈云沉着冷静、有条不紊的指挥风度和组织才能，很是佩服，毛泽东也十分尊重他。因而渡江之后，陈云经常奉中央之命，来往于各军团之间，传达中央及军委的命令。官兵们很信服他，把他看作是中央的代表。

过江后，红军绕过西昌城，于5月21日占领冕宁城。

遵义会议后，陈云除担任军委纵队政委之职外，还兼任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只要有机会，陈云便积极与地方组织联系，开展工作。

红军到达冕宁县的次日晨，陈云便以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的身份，在红军总政治部驻地冕宁县政府招待所接见了中共西昌特支成员陈野苹，向他了解西昌和冕宁地下党的情况，商量建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和组织抗捐军的事。随后，陈云又在总政治部召开有红军干部和当地干部参加的会议，决定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陈云还起草了革命委员会的布告，主持了几位地方积极分子入党的仪式，并给他们上了党课。

到达冕宁，红军已经接近了大凉山西部的彝民区。这个区域面积较大，

南至宁南县，北至大渡河，西起安宁河，东至金沙江畔的屏山。冕宁西北，直至康定以南，均属彝族区域。彝家均有武装，共有数千支快枪并有少量手提机关枪，均缴自汉军。沿安宁河两岸土地，本为彝家土司所有，但自国民党刘文辉部入雅州之后，即驱逐彝家土司而据其土地为己有，因此，彝家与刘文辉部结仇甚深。

为了使部队顺利通过彝民区，陈云和刘伯承率军委纵队带头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汉人军阀压迫彝民等口号。刘伯承还与沽鸡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后来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

经过敌血为盟后，“沽鸡”一部落彝民非但不打赤军，而反被赤军收编作“红军游击支队”，而与赤军引路及招抚“阿越”、“罗洪”等 10 余部落。此后赤军全部过此彝民山时，彝民则牵牛送羊欢迎赤军于道旁。赤军则以皮衣、旧枪、盐、布送彝民。故当时我等日夜恐惧之彝民山地，如此竟安然地通过。

过彝族区后，陈云随部队通过大渡河上的铁索桥，于 5 月 31 日到达泸定县。这时，他接受了一项艰巨的特殊使命。

特殊使命

红军到达泸定县的当晚，陈云出席了在县城附近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并取道上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红军及遵义会议情况。关于后一点，中央在红军长征出发后不久就有所考虑。

1934 年 10 月，红军开始长征后，蒋介石一面大量调集反动军队围堵红军，一面在白区疯狂破坏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活动阵地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致使长征中的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失去了白区党组织的有力配合。在湘江之战中，中央 100 瓦大功率电台又销毁在湘江，从此完全失去了同中共中央上海局及共产国际的联系。危急之际，中央曾派一名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去上海。但到上海后，他没有找到地下党，被迫返回长征队伍向中央再次告急。

尽管正处于长征的艰难历程之中，中央还是考虑应尽快与白区党组织取得联系。红军二渡赤水之后，张闻天代表党中央通知潘汉年，要他随陈云到白区，主要任务是：在上海附近长期埋伏，恢复党的秘密工作；设法打听上海方面有无国际关系，以恢复党因长征而与共产国际中断了的联系；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情况。张闻天还嘱咐潘汉年先行一步。潘汉年与陈云约定的白区联络地址，是与陈云相识的潘汉年的表妹吕鉴莹的住处。吕的丈夫潘渭年是潘汉年的堂弟，也是中共党员。

潘汉年接受任务后，即从遵义启程赴贵阳，途中改名杨涛，伪装成商贩，与邓发为他找的一个广东商贩为伴。到了贵阳，他找到了贵州工委的秦天真，秦派蓝运城（女）同行掩护，约三四月间抵香港。到港后，潘汉年即写信给吕鉴莹，得到潘渭年的回信，知道他们安全，才赴上海。其时，中共中央上海局已在 1934 年 6 月、10 月、1935 年 2 月三次遭到大破坏。1935 年 3 月，成立了临时中央上海局，以维持白区工作及与各方的联系。而同年 5 月，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又名劳伦斯）又被捕。

抵沪后，潘汉年通过临时中央上海宣传部负责人董维健，找到临时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浦化人。浦化人告诉潘汉年：国际负责代表已不在上海，并认为白色恐怖严重，潘在上海不安全，主张潘暂返香港，等待时机活动。

于是，潘汉年重返香港。在香港，潘汉年获悉共产国际预备在当年下半年于莫斯科召开代表大会，便产生了去莫斯科找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的想。经梅龚彬介绍，潘汉年会见了陈铭枢、蒋光鼐等人，托他们疏通两广关系以办理出国护照。同时，潘汉年也等待着陈云与他联系。

赴白区工作，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因行前要做一些准备，泸定会议后，陈云并未马上离开，而是随军委纵队继续前进，并在中央决定他去上海到他走前的短暂时间里，撰写了《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一文。

陈云为什么要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下留下这样一篇文章呢？

这还得从中央在会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说起。四渡赤水后，中央认为形势有了转机，于是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于5月12日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指出战略目标是夺取西昌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创立新苏区。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

作为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陈云感到对在川西创立新苏区，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冕宁时，陈云曾向中共西昌特支成员陈野苹详细了解了西昌和冕宁地下党的情况以及群众工作情况。根据掌握的情况，他对如何把党中央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付诸实施作了深入思考。《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一文，便是他思考的结晶。

文章指出：“党中央正确规定，目前野战军的战略方针是，以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来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同时着重指出，要完成这个任务，除了必须在战略战术上正确指挥红军去争取胜利的战斗以外，还必须有广泛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因此，我们对于发展四川的游击战争的问题，应该提到创造苏区的高度上来。”

陈云从总结以往苏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出发，着重指出，游击战争必须有广大群众参加而成为群众的游击战争，这是游击战争胜败的关键。

陈云把党的群众工作的一般原则与川西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组织群众斗争的策略方针：首先，要用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具体口号来动员群众。为此，地方党与游击队必须细心了解每一地区群众的最迫切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党提出的口号成为群众自己的口号，才能使群众充分相信这个口号是他们必需而且可以胜利的，才能动员群众为着这个口号而坚决斗争。其次，要通过扩大党的统一战线和保证统一战线内部党的领导，去掌握群众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在四川群众运动的开始阶段，可能而且必然有一些流氓、富农甚至破产的小地主，以及思想不正的知识分子，或者为着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或者为着投机，混入到革命运动中来，有的还会暂时占据运动的领导地位。因此，统一战线是“在四川发动群众的策略上的中心”。只要是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不管是由谁领导的，党都应去主动把它组织成更大范围的斗争，并设法将它掌握于党的领导之下。

另外，要根据群众政治觉悟的程度来选择斗争的组织形式。依据四川群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众运动的经验与群众要求，可以大大地发展抗捐军的组织，而在组织抗捐军时，必须纠正关门主义的错误。

为了使上述策略方针得到实际运用，陈云认为，必须对游击队领导干部加以培养和教育，使他们具有独立工作的各种才能。文章最后指出：“游击队内党支部的建立和健全，领导干部的坚决勇敢，处事以身作则，与战斗员共甘苦，这是使游击队坚强巩固的必要条件。”

这篇文章虽然是在非常仓促和紧急的情况下写成的，但文中对党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战略部署的思考是深刻和严密的。而且，文章较早地开始了对当时党中央政治路线的思考，批评了以往“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所以，这篇文章是陈云在长征途中继《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以后，留给人们的又一篇珍贵的历史文献。

6月7日，红军占领了四川天全县。在这里，陈云按预定计划，离开长征队伍，赶赴上海。

陈云所担负的使命是绝对保密的，只有少数领导人和核心机要参谋知道。为了严守组织机密，陈云未把自己接受特殊任务的事情向也在长征队伍中的亲人透露。临行前，他把自己随身携带的全部机要文件交付组织处理，把一个蚊帐送给了自己的好友张闻天，同时委托张闻天的爱人刘英大姐把一条毛毯和几件衣服转交给自己的亲人。陈云是一位有着超人自制力，感情极其深沉的人。离别的一切都是在平静之中进行的，但其中却蕴含着对组织、对战友、对亲人极其强烈的责任心和感情。留给亲人的几件物品看似平常，但它可以寄托思念，这里所包含的感情分量是不能用物的价值来衡量的。

有一位名人曾经说过：“每个人在他生活中都经历过不幸和痛苦。有些人在苦难中只想到自己，他就悲观、消极、发出绝望的哀号；有些人在苦难中还想到别人，想到集体，想到祖先和子孙，想到祖国和全人类，他就得到乐观和自信。”陈云正是有着后一种品格的人。他怀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带着对战友们不断取胜的衷心祝福，饱含着对亲人深切的思念，悄悄地离开了长征队伍，踏上了赴上海的征程。

七 苏联之行

出川

在四川天全县灵关殿，陈云离开了长征队伍。

此行对陈云来说是异常艰险的。在四川，他人地生疏，而此时又正值蒋介石坐镇成都指挥“围剿”红军，四川境内遍布军警宪特。为了确保陈云的安全，党组织在灵关殿选了一名既熟悉四川情况，又机智勇敢、对党忠诚的地下党员，护送他出川。

此人姓席，名懋昭，1933年入党，他的公开身份是灵关殿小学校长。

从灵关殿到上海，远隔数千里，仅出川就要经过国民党军警戒备森严的雅安、成都、重庆等险地。懋昭知道此行责任重大，艰险异常，但他仍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

陈云与席懋昭见面后，立即商量行程。为了避开追击红军的敌军，他们决定绕道荥经县，转向雅安，再直奔成都、重庆。商定后，他们便启程上路了。

这天，细雨濛濛，天色昏暗，原本就艰险莫测的旅途更加难行了。陈云化装成小学教员，与席懋昭冒雨沿着田间的泥泞小道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走着。

没走多久，从后面跑上来一个人，只见他浑身是泥，慌里慌张，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原来，这是中央为了确保陈云的安全，事先作出的一个安排。此人原是荥经的一个地主，时任国民党天全县教育局局长，在准备逃往荥经时被红军抓获。中央决定派陈云去上海后，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教育局长帮陈云他们安全经过荥经。于是，红军便把他押往灵关殿，待陈云与席懋昭离开灵关殿后，有意让他逃跑。这时见这个教育局长已赶上前来，席懋昭就主动与他搭话，说他和陈云是为了躲避红军而外逃的，这个教育局长信以为真，便讲了自己的实情。于是，他们三人结伴同行去荥经。

从灵关殿至荥经，全是山路，他们翻山越岭，多次避开了敌人的追击部队。这个教育局长同这一路上的民团很熟，因此，有他同行，所到之处，民团都客客气气地放行。第二天，陈云他们便顺利地到达荥经。

到了荥经，在这个教育局长的再三邀请下，陈云与席懋昭在他家里住了一个晚上。翌日，陈云又化装成为国民党军队购买器材的商人，与席懋昭一同前往雅安。

过了雅安，他们又昼夜兼程。因陈云是外地口音，为了避免暴露身份，途中不便开口，主要靠席懋昭应酬。陈云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加之席懋昭的机智，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应付过了敌人岗哨的盘查，五六天后，终于平安地进入成都。

坐镇在成都的蒋介石，唯恐红军深入到四川腹地活动，在成都一带到处增岗加哨，戒备森严。警车一辆接一辆地呼啸而过，过往行人都要受到搜身盘查，稍不遂特务之意，就会惹来杀身之祸，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席懋昭的巧妙应酬下，两人顺利地入了城。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陈云决定与席分头活动。

陈云持刘伯承的一封亲笔信，找到刘伯承的好友、美丰银行的董事胡公著先生。胡先生一见陈云，十分惊奇，急忙把陈云让进屋里，告诉他外面风声很紧，催促他尽快离开。这样，陈云决定在此仅逗留一夜。

第二天一早，陈云托人去成都春熙路中段三十一号《新新新闻》报馆，刊登一则《廖家骏启事》，内容为：“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这个启事是陈云事先与周恩来商量好的，是向中央发回的暗号。

然后，陈云辞别了胡公著先生，在约定的地方与席懋昭会合。席懋昭想劝陈云休息几天再走，但迫于成都的紧张形势，考虑到陈云的安全，只得同意一起立即去重庆。他们先乘汽车，然后步行到达重庆。陈云持刘伯承的又一封亲笔信，几经寻访，终于在一家药铺里找到了刘的弟弟，在他家中住了下来。几天之后，陈云乘船沿江而下，直赴上海。

赴沪的那天清晨，席懋昭特地赶到朝天门码头为陈云送行。陈云十分感激这位冒险护送他的四川同志，他紧紧地握住席懋昭的手，热情地鼓励他一定要坚持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席懋昭此时的心情也很不平静。10多天来，他护送陈云在蒋介石亲自督战的敌占区，历尽艰险行程700多公里，今天终于顺利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自己的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内心里怎能不欣喜呢？！但想到要与陈云分别，他心里又感到很难过。陈云沉着机智的应变能力，缜密周到、果敢决断的处事风格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使席懋昭十分钦佩，他多么想继续跟随陈云赴上海，去经风雨，见世面呵！

长长的汽笛声，惊醒了两位正在依依惜别的战友。陈云用力握了握席懋昭的双手，转身健步登上了轮船。轮船慢慢地驶离码头，席懋昭目送远去的轮船，视线渐渐地模糊了……

席懋昭完成了护送陈云出川的任务后，返回雅安。没料到敌人正在捉拿他。席懋昭闻讯后马上折回成都，寻找组织，但未能找到。因为四川已不能立足，他决定投奔川陕甘边区。他昼伏夜行，来到仪陇老家，不幸在阆中县小黄沟被国民党别动队特务逮捕。无论敌人怎样拷打他，他都咬紧牙关，矢口否认曾经开城迎接中央红军；对护送陈云出川一事，更是守口如瓶。敌人对他毫无办法。西安事变后，局势起了变化，经家人花钱保释，席懋昭终于脱离了虎口。

1937年11月，席懋昭来到了延安，进入党校学习。在欢迎刚从苏联归来的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盛大集会上，席懋昭在人群中一眼看见了陈云。眼前的陈云虽然不再是小学教员打扮，而是作为党的领导人正在接受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但在席的记忆里，他还是那位在长途奔波中与自己有饭同吃、有水共喝的患难之友。席懋昭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穿过人群，奔向陈云。两人相见，格外亲热。当陈云知道席懋昭送走自己后被捕入狱，历尽艰辛的经历后，紧紧握住他的手，深深感谢这位忠诚的四川地下党员，并鼓励他努力学习和工作，争取为党作出更大的贡献。

席懋昭在延安学习三个月后，又返回四川，先后在仪陇、天全、雅安、泸定、懋功、芦山等许多地方从事革命活动。1948年3月18日，席懋昭在雅安县进行革命工作时，不幸再次被特务逮捕，很快就被押往重庆渣滓洞。山城重庆临解放之际，席懋昭与200多名难友被残暴的国民党特务枪杀在牢狱之中。

四川解放后。陈云曾多次了解席懋昭的情况，但一直没有打听到他的下落。

1983年4月，陈云得知席懋昭在解放前夕被害于“中美合作所”以后，便立即向中共仪陇县委和中共四川省委询问席懋昭的情况，并为复查他的问

题提供材料和调查线索。虽然陈云的工作非常繁忙，但他心中始终惦记着这件事情。经过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和中共仪陇县委的周密调查，终于查清了席懋昭的情况和革命斗争历史。12月，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把复查席懋昭的情况和他的革命斗争事迹以及照片报送陈云。

陈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四川省委组织部送来的那张已经发黄的遗照上。是他！的确是他！陈云记忆深处保存的患难之友的熟悉面容，与这帧照片上的青年的形象完全吻合。陈云满怀深情地注视着烈士的遗像，心里既充满痛楚、钦敬之情，又为党培养了一大批这样的忠勇之士而感到自豪。他抑制不住百感交集的心情，为这位他寻觅了几十年的革命功臣，提供了最详实而又珍贵的证明材料：

……最近，四川省委组织部送来材料，证实席懋昭同志确曾担任过灵关殿小学的校长，他的爱人也在该校当过教员。另外，还送来一张他的照片。这些情况以及照片，和我的记忆完全吻合，因此可以断定，席懋昭同志就是当年护送我从灵关殿到成都、重庆的那位同志。

根据席懋昭一生的革命活动和对党作出的重要贡献，陈云指出：

……我认为，应当肯定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

1984年5月2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决定，追认席懋昭为革命烈士，并追记大功一次。

抵沪

陈云与席懋昭在重庆分手，乘船抵沪后，住在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路永安旅馆，化名李介生。由于上海党组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一时难以接上关系，陈云只好先去找老朋友章乃器。

陈云与章乃器在20年代初就已相识。当时章乃器任职上海浙江实业银行，陈云则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作。他们是通过章乃器的三弟章郁庵牵线而相识的。章郁庵就读于浙江省工业学校，后因闹学潮被校方无理开除，于20年代初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当学徒，与陈云是同事。当时，沈雁冰、杨贤江等早期共产党人已在该馆编译所工作。不久，陈云和章郁庵先后被吸收入党，以后陈云又担任了该所的支部书记，共同致力于地下革命斗争。

其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已在全国许多地方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在斗争恶霸地主的时候，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其中就有“期票”。为了把这些“期票”及时兑换成银元，充作党的活动经费，一定要物色政治上绝对可靠的人。党把这项任务交给了章郁庵。章郁庵把陈云介绍给章乃器，就这样，他们相识了。陈云也就成了章乃器办公室里的座上客，开始了合作关系。虽然他们当时的政治观点不尽相同。

这时的章乃器已是一位知名人士了。他除了担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的副总经理和沪江、光华等大学的教授外，更重要的是，他以很大精力从事抗日救国运动，被誉为“中国左翼运动的理论家”。他的三弟章郁庵，此时已改名章秋阳，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公开身份，继续从事秘密工作。

通过章乃器，陈云很快见到了章秋阳。为安全起见，章秋阳先把陈云转移到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358弄尚贤坊21号自己家中。不料，在这里陈云与一位来访秋阳的客人何孝章相遇。何孝章原系商务印书馆党员，与陈云相识。章秋阳警惕性极高，考虑到陈云此次来沪是极端秘密的事情，为安全起见，他与陈云商议，立即离开尚贤坊，隐居于英租界山西北路老泰安

里 111 号唐文云（章秋阳爱人）家中。

此时，原商务印书馆党员孙诗圃奉组织之命从无锡赶到上海，参加掩护陈云在沪的安全工作；上海煤炭业店员工会党员罗希三，也参加了掩护工作。

这一切安顿好以后，陈云一方面通过潘汉年的表弟潘渭年告诉在港的潘汉年立即来沪；一方面通过章秋阳找到上海临时中央局的浦化人等同志，了解了上海党组织的情况，并开始着手实施恢复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计划。不料，7 月 22 日，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江苏省委再次遭到大破坏，浦化人及上海临时中央局宣传部代理部长董维健等均被捕。24 日，共青团中央局也遭破坏，书记文德、组织部长张信达等八人被捕，文德叛变。陈云又通过章秋阳顺利地找到了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和何叔衡的女儿何实嗣。她俩与共产国际驻上海联络员都有联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了解到上海的险恶形势后，指示陈云及在上海的一些其他重要领导人立即去苏联。

当时，从中国去莫斯科的主要路线有三条：一条是取道哈尔滨，可是这条路很不安全，因为东北已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第二条是经过欧洲，这条路最安全，但是费用太大；第三条是从上海坐船到海参崴，再转乘火车到莫斯科，这条路线对于陈云赴苏来说，是最切实可行的路线。8 月初，陈云与潘汉年在上海见了面。陈云告诉潘汉年，去莫斯科的路线已安排妥当：乘苏联的商船，由上海出发经海参崴，直接转陆路去莫斯科。两人决定分开行动。陈云先行，等这艘商船从海参崴回上海后，潘汉年再启程。决定作出后，两人立即投入了紧张的行前准备之中。

赴苏

1935 年 8 月 5 日前后，陈云与陈潭秋、杨之华等乘坐苏联货船到海参崴，经西伯利亚铁路，于 8 月 20 日到达莫斯科。此时，共产国际七大已临近闭幕。陈云参加了大会。

共产国际七大是共产国际正式实行世界革命战略转变的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各国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各民主阶层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以及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大会详细地审议了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问题，批准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在中国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广泛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21 日大会闭幕后，联共中央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亲切接见了中共代表团的王明、陈云和滕代远。斯大林勉励他们要注意党的团结，争取对敌斗争的胜利。

不久，陈云代表中共中央重新接上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完成了中央交付的特殊使命。陈云向共产国际领导人详细地报告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向西北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情形。通过陈云的汇报，共产国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的了解，尤其是对毛泽东的了解。事实表明，在陈云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很快转变了态度，表示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1936 年，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第 1、2 期合刊上发表了《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一文，文章概述了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一大以来的革命历程，称赞毛泽东有“铁的意志，布尔塞维克的决心，英勇无畏的精神，革命名将和政治领袖底无限天才”。可以说，共产国际开始明确地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是与陈云的莫斯科之行密切相关的。

在莫斯科，陈云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任监察委员会委员，化名“史平”。

除了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之外，陈云还在东方大学“八分校”任教。

东方大学“八分校”在离莫斯科几十公里的地方，那里环境十分幽静。一座米黄色的三层楼矗立在树林之中，楼的四周点缀着花坛，后面有操场，左侧有两栋小楼，一栋是职工办公楼，一栋是托儿所。高高的院墙环绕着这优美的园林。据说这所校园是共产国际赠送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礼物。

在“八分校”学习的学员，都有着较高的政治水平。他们主要是东北的干部，如韩光、钟子云等，另外，也有一些因病去苏联治疗的干部在那里学习。到1935年时，学校已有两三百名学员。在那里授课的教员中，有苏联教员，也有中国教员。中方教员都是中国共产党一些著名的活动家，如李立三、吴玉章等部在那里讲过课，讲课的内容都是有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陈云授课的主要内容是党的建设问题。他深入浅出、平和细致的讲解，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工作繁忙，陈云每次授完课之后，便急匆匆地赶回莫斯科。

当时，在苏联还有一所十分著名的国际学校，这就是列宁学校。

列宁学校位于列宁山上，原是共产国际创办的，专门为各国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中共早期理论家、曾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蔡和森，从1926年起曾在这里学习过几年。那时，校址在城内，规模还不大。30年代，列宁学校搬到列宁山新建的规模很大的四层楼大厦。除中国党的干部外，还有西欧国家党的负责人也在那里学习。中国班的学生范围也大大扩大，包括高、中、低级干部，教室占了校舍底层的全部。共产国际把中共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们组织了一个特别班。这个班设在四层楼上，与外界隔离，学习环境很幽静。学员每人单独住一间房，房内书桌、台灯、书架、衣柜等一切用具应有尽有。

陈云被编入特别班。和他同班的有滕代远、陈潭秋、饶漱石、曾山、孔原、高自立等十几人。学习的课程有列宁主义问题、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西方革命史、中国革命问题和中共党史等。特别班主要的学习科目是政治经济学，为了使学习更加深入，学校还聘请了一位出版过经济学专著的经济专家西嘎尔，与代表住在一起，以便学员下课之后，随时都可以向他请教，同他一起讨论问题。

陈云是一个极爱学习和勤于思考的人。动荡不定的国内环境和飘泊不定的革命生涯，使他难有机会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但他从不放过点滴学习时间。现在有了这么好的学习条件，如鱼得水，他更是如饥似渴地埋头学习。这段学习生活使陈云受益不浅，他以后能具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与这段学习生活是分不开的。

在学习的同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还组织从国内来的干部在苏联参观，了解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农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使陈云大开眼界。

此时，国内抗日烽火愈燃愈旺，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抗日的态度，自华北事变后也在发生变化。蒋介石对日本一再退让，部分原因是他抱着依靠外交途径来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打破了这种幻想。华北事变的发生，超出了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

于是，南京政府不得不开始考虑调整它的对日政策。

1935 年底，南京政府开始试探性地要求苏联的援助，并通过各种渠道，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翌年初，国民党驻莫斯科使馆武官邓文仪奉蒋介石之命，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陈云与王明、康生等人共同商定，派潘汉年出面与邓文仪会谈。

潘汉年是 9 月上旬到达莫斯科的。与邓文仪初步接触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认为，国共两党中央皆在国内，正式谈判应在国内举行。随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潘汉年为联络代表，回国找陈果夫、陈立夫洽谈国共合作抗日事宜；并要潘默记学习密码，以恢复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1936 年 4 月，潘汉年告别了陈云等人，返回祖国。

国内频频传来的抗日消息，使陈云的心情难以平静。既然不能亲临抗日沙场，陈云便以笔为武器，连续在中共在国外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上发表文章，如《论中国学生的救国运动》、《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奸细的活动》、《是真话还是谎话》、《“诚意”和“基本准备”》等等。这些文章均以“史平”署名，鲜明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高度评价了国内的抗日民主救亡运动，严厉谴责了日寇的侵略行径，也无情地批驳了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策。这些文章在海外华侨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当时影响更大的，还是陈云署名“廉臣”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随军西行见闻录》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世人广泛关注的一件事情。自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长征后，蒋介石便向国内外视听大肆吹嘘他的“剿匪”功绩，胡说红军已完全“溃败”，只剩下极少数人在“逃窜”。不明真相者信以为真，受其蒙骗。为了戳穿蒋介石的谎言，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红军长征的真相，1935 年秋，陈云在莫斯科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以下简称《见闻录》），于翌年春，公开发表在法国巴黎华侨组织主办的《全民月刊》上。该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宣传阵地。

在文章中，陈云署名“廉臣”，并假托为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这样可以从中立立场上来反映红军长征历史，从比较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作为中，宣传共产党得民心的事实，从而攻破国民党反动派污蔑共产党和红军的谎言，又可以以一个在国共两党中工作过的人员的身份，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呼吁国共再度合作抗日。这样既有利于向世界上不同观点的人宣传，也便于此文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

《见闻录》完整地记述了中央红军自 1934 年 10 月中旬从中央苏区突围西征，到 1935 年 6 月陈云离队这八个月间，由江西经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而转入四川之理番、松潘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 1.2 万里行程；生动地描写了红军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转战贵州、枪渡乌江、智取遵义、翻越老山界和大雪山、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兵临贵阳、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飞渡大渡河等英勇壮举。从陈云的笔下，人们可以感受到红军并非是被国民党“穷追溃逃”的“败兵”，而是一支英勇顽强、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战斗部队，并且有着严明的纪律、坚定的信念、新型的官兵关系。

《见闻录》尤其描写了红军深厚的群众基础。如文中写道：

即如赤军入湘南时，资兴、郴州、宜章一带，为昔年毛朱久经活动之区域，居民受共党之宣传甚深，故见赤军此次复来，沿途烧茶送水，招待赤军。我在行军时见每过一村一镇，男女老幼立于路旁，观者如堵。

……

红军到宜章时，那里的 400 多名粤汉铁路修路工人全部参加了红军，这是由于几名共产党员秘密工作几年的结果。针对此事，文中评述说：

此事深深使我忆起，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各处民众响应，北伐军势如破竹，正如王者之师。自国共分裂以后，像北伐时民众响应之事，已销声匿迹。反之，全国人心，大都失望。共党分子如此埋头苦干，而返视国民党员，则徒争名利，何曾见一个在东三省日本势力下埋头苦干的人！我深感共党自有其社会上根深蒂固之潜势力，剿共与消灭共党决难成功也。

由此种种，作者断言：红军所以不被击败，而反日益扩大，不仅在于有军事力量，而且在于深得民心。这就向世人道明了，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的红军部队，是绝不会被国民党军队所击溃的，蒋介石所吹嘘的“追剿”军“连连取胜”之说，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见闻录》还细致入微地描绘了红军领袖们的坚毅、勇敢和机智，以及他们与国民党官员形成鲜明对照的朴实、高尚的品质和廉洁、民主的作风。如“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待人“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 50，身衣灰布军装”，“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他们的形象与人们受欺骗后，以为“凶暴异常”之想象“完全不同”。毛泽东、朱德“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更辅之以“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红军岂有不成功之理！同时文中称，红军领袖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祖涵、徐特立等，“均系极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在国民党报章对毛泽东、朱德等人大加低毁的情况下，如此全面真实地歌颂红军领袖，对于驳斥国民党的不实之词，鼓舞振奋民心，集聚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英勇奋斗，有着重要的作用。

更可贵的是，《见闻录》以极恳切的语言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

我以为当今局势，如再继续内战与剿共，非但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误国。政府当局应该改变计划，协同赤军以共御外侮。

……今在国家一发千钧之时，内战则死、对外则生的时候，只要两方开诚布公，何愁不能合作以对外。而且赤军领袖及共党均有过联合全国兵力一致抗日的主张。我并闻友人传说，共党中央及苏维埃政府主张合全国兵力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我以为政府之对内对外政策之迅速改变，此其时矣！我辈小百姓唯一的目的，是在不使中国之亡于日本，不做亡国奴而已。我总觉得无论如何，赤军总是中国人，总是自己的同胞，放任外敌侵袭，而专打自己同胞，无疑是自杀政策。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

《陈云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8 页。

同上，第 50 页。

《陈云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5 页。

同上，第 88 页。

同上，第 90 页。

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

由于《见闻录》的作者以其在长征中的亲身经历及其政治家的眼光和思想水平，生动真实地描述了世人所关注的中国红军长征，所以，这一著作一问世，便在国内外广为流传。继 1936 年春法国巴黎华侨组织主办的《全民月刊》首次刊登《见闻录》之后，同年秋，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次年 7 月 30 日，巴黎的《救国时报》也发表了此文。8 月 5 日出版的《救国时报》还刊载了《廉臣捐赠〈随军西行见闻录〉版权启事》。此文传入国内后，最早载于王福明在北京编辑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之中。同年 11 月、12 月，民生出版社和陕甘人民出版社又分别出版单行本，书名为《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1938 年，《见闻录》又由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发行。

新中国成立后，《见闻录》多次被各种研究和宣传红军长征的书刊摘录和转载，但人们始终不知作者廉臣竟然是中共赫赫有名的领导人陈云。直到 1985 年 1 月纪念遵义会议 50 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才第一次说明廉臣是陈云的笔名，并以作者陈云的名字公开发表了《见闻录》全文。

陈云是红军长征最早的宣传者。以往都认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红军长征最早的宣传者，其实不然，在斯诺 1936 年 7 月到陕北采访毛泽东时，《见闻录》早已在巴黎发表，并在莫斯科出版了。

归国

1936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形成了横跨黄河两岸发展，雄峙西北的态势。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为解决陕甘苏区粮食和经费的困难，打破蒋介石精心组织的“通渭会战”的战略企图，决定提前执行“夺取宁夏，打通苏联”的战略计划。10 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的五军、九军、三十军及总部共 2.1 万人，先后从甘肃省靖远县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

打通苏联的战略计划，同苏联人民的利益也密切相关。苏联面临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的严重威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牵制日寇从东方进攻苏联的主要因素。因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再表示同意中国红军从北方和西北方面接近苏联，并答应积极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

在西路军鏖战河西走廊之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建赴新疆迎接西路军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既代表共产国际，又代表中共中央。陈云被指定为团长，滕代远为副团长，另外还配有三名工作人员，段子俊负责电台，李春田负责译电，冯铨担任翻译。

陈云一行五人受命后，在共产国际“留克斯”大楼集中休整了三天。其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举行家宴招待他们，并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陈云等提出西路军进疆后缺少弹药、武器，于是，季米特洛夫通过联共（布）中央领导，答应送给他们 90 辆坦克和 90 门大炮。

不久，陈云一行乘火车从莫斯科出发，直抵哈萨克共和国的首府阿拉木

《陈云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0—91 页。

埃德加·斯诺著有《红星照耀中国》（也称《西行漫记》），此书 1937 年秋在国外首先出版，1938 年 2 月传入中国。

参见《滕代远传》，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19 页。

图。在这里，他们脱下西装，换上苏联军队的棉袄，逗留了一个星期左右，然后乘车秘密到达苏联边境霍尔果斯。

在霍尔果斯住了三四天后，陈云因劳累，旧病复发，经常流鼻血，病情十分严重，不得不返回阿拉木图休养治疗，约一个月后，即返回霍尔果斯。

这时，国内发生西安事变，为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让他们停下来，等待指示。陈云等五人被安排住在苏联边防军一个营长家里。陈云住一间小屋，滕代远等四人住一间大屋。这位营长家共有六口人，妻子、老母亲、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这家人对他们很客气，招待很周到，开始营长的妻子给他们做饭，后来他们觉得不合口味，干脆自己动手做。滕代远会做菜，尤其擅长做红烧肉，李春田负责做饭，段子俊和冯铨烧火打杂，陈云洗碗，生活安排得还不错。

此时正值隆冬季节，经常下雪，天气异常寒冷，他们不能随便外出，闲来无事，每天便由冯铨给他们读俄文报纸，有时也打打扑克，聊聊天。当聊到西安事变时，段子俊、冯铨、李春田三人认为，抓住蒋介石真是大快人心，应该将他杀了。陈云起初默不作声，后来对他们三人讲，蒋介石杀不得，不杀蒋介石，就可以防止挑起新的内战，国共可团结抗日。滕代远认为陈云的意见很对，如果杀了蒋介石，必然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对抗日不利。至今，段子俊老人回忆起这件往事时，还感慨地说：当时我们都觉得陈云虽然年轻，但很有水平。他不轻易讲话，讲话很慎重，但很有分量。

边境的生活十分枯燥。他们有时想出去打猎，可是森林里连只鸟也没有。他们就提出想看看电影，于是经当地组织安排，能容纳几百人看的电影院设专场给他们放映，为的是不让别人遇见他们。就这样，陈云和四位伙伴在边境静静地等了五个月。

八 远见卓识

迎接西路军

在陈云等一行五人在霍尔果斯等待命令之际，英勇的西路军正在河西走廊与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的部队浴血奋战。河西走廊是高寒地区，11月份已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在这里，西路军奋战了四个多月，毙伤俘敌约2万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由于西路军的西进作战，存在着许多不利条件：在兵力对比上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地理条件上，甘肃西部南有海拔3000至5000米的祁连山，北有北山和沙漠、戈壁滩，中间为一条狭长的走廊，回旋余地很小；加上西路军长时间行军作战，未得到休息和补充，终于在1937年3月中旬，在张掖县西南的梨园口同敌人作殊死搏斗后失败。部队由初建时的2.1万多人锐减为1000余人。

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祁连山石窝山山顶（今肃南县境内）开会，决定陈昌浩、徐向前回陕北向中央汇报，原西路军分为三个支队，转入祁连山打游击。3月17日，中央同意西路军建议。但西路军分散不久，右支队以及以妇女、伤员为主的支队在战斗中失利溃散，只有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仍在祁连山的冰天雪地里孤军奋战。党中央、毛泽东十分关注左支队的命运。3月23日，中央终于与左支队仅存的一部电台取得了联系。中央指示他们：团结一致，保存力量，设法向新疆转移；并谓将派陈云等前往迎接。左支队当即复电：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向新疆前进。

4月20日左右，在焦急中等待任务的陈云等人，终于收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电示，命他们急速前进，赶到新疆星星峡地区，接应西路军残部。接到命令后，陈云等人立即整理行装，于4月23日，乘坐新疆督办盛世才派来的汽车，经伊犁抵迪化（今乌鲁木齐）。

盛世才是个野心很大的军阀，1933年他夺取并掌握了新疆的军政大权，当上了新疆边防督办，成为“土皇帝”。为不被国民党蒋介石吞并，盛世才便向苏联求援。苏联政府为了有一个比较安全的漫长边界，经过谈判，同意在人力物力，特别是在武器装备上支援盛世才，并在迪化建立了领事馆。作为回报，盛制定了“反帝、亲苏、民主、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由于这种关系，陈云等到迪化后，立即通过苏联领事馆，与盛世才沟通联系，商谈建立合作关系和接应西路军进新疆等问题，并很快得到盛的支持。至此，陈云正式出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

此时，西路军左支队在攻打安西之战中失利后，且战且退，向戈壁滩深处转移，并按中央指示向星星峡方向前进。荒漠的戈壁滩，都是灰色的沙砾，一望无际，没有人烟，气候变化剧烈，一日之内寒暑数变，夜里，从北方吹来的冷风，冻得战士们直打哆嗦；而白天烈日当空，沙砾热得像火烤过一般，灼得人嘴唇干裂，却又找不到水喝，也找不到阴凉的地方。由于敌情严重，左支队幸存的干部和战士，不顾酷热和严寒，咬紧牙关，互相激励，竭尽全力地向西北方向奔跑。他们未进一粒米，未饮一滴水，在戈壁滩上跑了一夜又一天，终于在4月27日下午5点左右，第一批西路军左支队的干部和战士走出了荒漠的戈壁滩，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附近。

由于陈云与盛世才交涉迎救西路军事宜成功，所以初到星星峡的二三十人，受到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边务处星星峡办事处主任王效典的热情接待。在王的支持下，初到的战士们又打着红旗，乘车返回戈壁滩收容了失散的左支

队人员，人数慢慢地集合到 400 多人。在陈云的要求下，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派出两架飞机，给在星星峡的西路军空投了食品、衣物和枪支。

临近五一节的一个早晨，陈云和滕代远等带着盛世才提供的几十辆装有枪支、衣物和食品的汽车，向星星峡驶去。

星星峡是群山中的一个峡口，自古以来这里就是联系新疆与内地的重要关口，是陆路通往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东北部各国的必经之路。出山沟向东即属甘肃省境。从地图上看，星星峡似乎是一个比较大的关卡，但实际上人烟稀少，只有几十间黄泥土房，居住着 20 多户人家。

当陈云一行到达星星峡，与西路军左支队的指战员们相见时，许多干部和战士就像虎口余生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惊喜地拥上前去。许多身经百战、血染沙场部毫不动容的将士，这时百感交集，竟禁不住热泪滚滚而下，哽咽着说不出话来。陈云看着一个个面黄肌瘦、两颊塌陷的同志，心中也有说不出的难受。他强忍着心中巨大的感情波澜，逐一与西路军指战员握手。

五一节那天，陈云在星星峡主持召开了纪念会。陈云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向历尽艰险、九死一生的指战员们表示了亲切的慰问。陈云在会上讲了不少鼓励的话，他说：你们这些共产党员，经过那些困难都过来了，人都累得不像样子了，不投降敌人，还团结在一起，能够跑到这里来，是好样的，是好共产党员嘛！革命斗争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我们保存下革命力量，我们就会发展壮大起来。你们虽然只剩下几百人，但都是革命的种子，将来可以发展成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去夺取革命的胜利。他还说，党中央对西路军的斗争始终很关心，想了很多办法来援救陷于困境的同志们。他要求大家把自己制作使用的武器以及衣服、鞋袜等物品，全部保存起来，送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去，让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看看，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什么样的艰苦条件下从事解放斗争的。西路军左支队的指战员们，听了陈云这些温暖人心的话，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泪水湿透了他们胸前的衣襟。

为了让同志们尽快恢复体力，陈云把从迪化带来的物资分给大家，每人一套棉衣、一套单衣、一套衬衣、一双皮鞋、一双袜子、一个瓷杯、一双筷子，还有大批的羊肉、苏联的纸烟和白糖。同时，他又商请盛世才再空运一批物资。盛世才答应了，两次派飞机空投衣物、粮食、枪支、弹药，使聚集到星星峡的 400 多名指战员装备一新，并逐渐恢复了精力。

5 月 1 日下午，西路军左支队 400 余人在陈云、滕代远带领下，坐车向迪化驶去。途经苦水时，陈云把部队又一次集中在一起，进行集体谈话。他平和地说：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还剩几百人，你们是沙里淘金，是党的宝贵财富。然后，陈云向大家介绍了新疆的社会状况和党的斗争策略。他严肃地说：新疆与苏联接壤，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为了自身利益，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对我党也表示友好，我们进入新疆，是利用统一战线的特殊环境，保存和发展我们的力量。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盛世才是国民党政府的新疆督办，是上将军官，我们同他打交道，一定要提高警惕，坚持原则，谨慎从事。

参见《滕代远传》，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24—225 页。

参见任伊临《陈云在新疆援接西路军左支队》，载《陈云和他的事业》（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017—1018 页。

离开苦水后，他们途经哈密、七角井、吐鲁番等地，5月7日前后，到了迪化西南10余公里的红雁池。当暮色徐徐降临大地时，车队驶进了市区，停在₁该市西大桥的一个工厂里。这是盛世才的一家新落成的纺织厂女工宿舍，条件在当时是比较好的。宿舍落成后尚未启用，暂时给西路军做营房。

由于陈云从关心生活入手，有针对性地做思想政治工作，使西路军左支队余部在短时间里摆脱了战斗失利后的低落情绪，精神状态迅速改善，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对未来的复杂斗争也有了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年的西路军战士吕黎平在回忆中写道：“陈云同志言简意赅、充满深情的讲话，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清楚了今后的任务和环境。我们每个同志的脸上，都绽开了回到党的怀抱的幸福笑容……”

组建“新兵营”

“安营换装”是陈云引导西路军左支队抵达迪化后进行的首要工作。

西路军左支队在纺织厂宿舍没住多久，7月下旬，便迁移到东门外营房里，与盛世才的部队住到一起。根据当时国内外和新疆的政治形势以及盛世才的要求，陈云、滕代远和西路军工委李卓然、李先念等研究决定，把西路军左支队进行整编，西路军工委继续保留，撤销原来的部队建制，西路军左支队改称为西路军总支队，设政治处、总务科，下编四个大队，每大队编三个排，每排编三个班，每班10人左右，对外统称“新兵营”。陈云为“新兵营”党代表。

部队整编后，盛世才按新疆部队标准承担“新兵营”的全部供给。为了适应新疆特定的统战政治环境，西路军指战员要换穿盛世才部队的藏青色军服（短领上衣、马裤、短靴），戴青天白日帽徽。

对于换装，部队开始有很大的抵触情绪。有人甚至怒气冲冲地说：“我们在长征路上，在河西走廊，不正是同头戴青天白日徽章帽子的国民党军队拼杀过来的吗？现在要我们同敌人穿一样的服装，岂不变成了国民党军队，这怎么行呢？”不少人因而执拗不换。

陈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耐心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不过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军队的性质不在于穿戴什么样的衣帽，而在于组成这支军队的人树立什么样的思想，信仰什么主义，受何种性质的政党、政府领导和指挥。现在我们住在迪化这个特定环境里，同陕北苏区不能一样。现在改换成国民党军队的着装，从表面上看似乎成了白军，但我们的信仰和奋斗目标没有变，仍然是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消灭剥削阶级，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进行民主革命。我们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过去一样受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一句话，红军的本质与宗旨完全同过去一样，没有变！

听了陈云这番话之后，大家敞开心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认为陈云说得在理，表示愿意改换服装。但这些久经沙场的钢铁战士们，对自己帽子上那颗闪闪发光的红星，仍有着极深厚的感情。有的人把红星从帽子上摘下来，反复擦着，然后把它装进新军服的衣袋里；有的人干脆把红星缝在新军帽的里面；还有的人把红领章、红帽徽和旧军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平平整整地珍藏起来。

由于长期连续地艰苦作战，许多干部和战士的身体都很虚弱，有的伤口还未愈合。陈云十分关心大家的身体健康。为了使同志们尽早恢复强健的体魄，初到迪化时，陈云安排对全体人员进行了体检，有病的得到了及时治疗。

同时，部队加强了保健工作，尽量想办法改善伙食，安排好生活。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陈云还同盛世才交涉，每月发给每个战士新疆币 1500 两银票，排长 5000 两，大队干部 1 万两，总队首长和工委的负责同志更多一些。

在生活方面安排就绪后，陈云加强了对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先是对部队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这个问题对总支队的干部战士来说是一个很新的问题。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他每周抽出两三个半天时间到迪化图书馆阅读日本自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到 1931 年 9 月 18 日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历史与侵华史料，前后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后，陈云亲自给总支队指战员上课。在讲课中，他结合日本历史和日本侵华史料，结合九一八以来的国内外形势，深入浅出、生动具体地给大家讲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针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影响在部队中还未肃清，一些同志对张国焘的真面目还没有彻底看清的情况，陈云深入班、排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经常利用早晚时间找干部谈话，了解每个人的思想状况，有针对性地进行个别疏导。当时陈云还未能与党中央直接建立无线电联络，而须经过迪化领事馆—苏联政府—共产国际方可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电报往返很慢，特别是对批判张国焘这样的党内问题，也不便在电报中涉及。所以，陈云尚不知道中央已于 3 月下旬在延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在未接到中央指示的情况下，陈云对部队内存在的思想问题，采取了很慎重的态度，即主张自我教育，以政治上提高觉悟为目的，暂不开展反对张国焘的路线斗争。陈云这一做法，对于稳定部队情绪，避免思想混乱，逐步提高官兵对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识别能力，起了重要的作用。

经过调理身体和整顿思想，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恢复了虎虎生气。“新兵营”以严明的军纪，良好的风尚，在祖国西陲的新疆首府传为佳话。

号召“向文化进军”

西路军进疆前，党中央根据斯大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应建立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独立部队，要打通国际交通线的精神，曾经有过组织总支队去苏联学习现代军事技术的决定。为了给赴苏学习打基础，在西路军进驻迪化，生活、思想、组织编制都稳定下来之后，陈云号召大家努力学习文化，为今后赴苏学习创造条件。但总支队建立不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中共中央撤销了原决定，让总支队留迪化学习。陈云向总支队传达了党中央“严守纪律，安心学习”的指示，并号召全体指战员要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军事技术、政治理论、科学文化，要使“新兵营”成为一所培养红军人才的学校。

总支队的许多战士都是贫苦农民出身，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参加革命后，战斗频繁，同敌人搏杀，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他们威武不屈，视死如归，这些都习以为常了。但现在坐在教室里安安静静地学习，他们却有些不习惯，总觉得拿笔杆子比拿枪杆子还重，学习文化没有打仗痛快。

陈云发现这一情况后，在部队召开了学习动员大会。他说，文化知识是学习其他知识的基础，没有文化就像盲人。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是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现在学习文化知识，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军事技术，也是为了革

命事业，内容不同，目标一致。希望大家要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一样向文化进军。陈云在讲话中还再三强调：前方的同志在作战，在流血，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学习机会和条件，加倍努力学习，这一切都是为了将来上前线多打胜仗。

陈云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每位指战员的心，大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很快，陈云“向文化进军”的号召，变成了“新兵营”全体指战员自觉的行动。

为了使大家的学习收到更好的效果，陈云对“新兵营”的政治、文化、军事学习作了进一步细致的安排。

首先，陈云要求总支队根据每人识字多少进行编班。把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指战员编为甲班，小学文化程度的编为乙班，识字不多或不识字的编为丙班，以便因材施教。学习内容安排了三个方面：基础文化课、政治课、军事学习和训练。文化课以学习语文和数学为主，辅学历史、地理和物理常识；政治课主要学习中国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基本问题、党的历史，辅学西方史和政治经济学；军事课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学基本的军事战术，辅以军事训练。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还教授指战员们一些简单的日语，如“优待俘虏”、“缴枪不杀”、“中日两国人民应该团结起来”等战场用语。

本着能者为师的原则，教员主要从“新兵营”内部挑选有学历的同志兼任。为了尽快提高“新兵营”干部的思想素质，陈云亲自抓干部队和师以上干部的政治学习，他要求凡是有阅读能力的同志，要认真读几本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陈云对待干部的政治学习，通常不是用讲课的方式，而是要求每个同志每星期向他汇报学习情况，谈心得，提问题，然后他根据同志们学习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有的放矢地进行引导，产生了很好的教育效果。除此之外，陈云还亲自给“新兵营”全体指战员上政治课，讲国际国内形势、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联共（布）党史、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等等。陈云讲课有理论有实际，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很受同志们的欢迎。

学员用的教材，是陈云设法筹集经费到迪化市内购买的中小学课本，其中的数学课本很适用，语文课本讲的都是“人之初，性本善”等内容，不大适合“新兵营”指战员用。于是，陈云自己动手，从苏联带来的学习材料里选了一些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的声明、决议集，油印后发给大家，作为学语文、学政治的合用教材。

在陈云和其他领导同志的严格要求和循循善诱下，“新兵营”很快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气氛。每天上午的第一节课，教员都要对学员进行提问，检查前一天作业的完成情况。每星期测验不少于一次，每月都要考试。教员们整天在教室、宿舍转，除上课外，还要进行课外辅导。学员们亦能刻苦学习。课堂上鸦雀无声，大家都十分专注地听教员讲解问题。课后，几乎人人都超额完成作业。有的在熄灯后，还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学习。当时纸张少，学员们就在细沙地上算数学题，有的磨块青石板，用树枝蘸水在石板上练习写字。

由于陈云的精心计划，教员、学员的共同努力，“新兵营”的指战员经过一个阶段的学习，大多数都掌握了近两三千个字，能记笔记，阅读报纸，也学会了四则运算及百分数。在7月中旬的一次文化考核中，参加政治测试的48名干部，都了解党的新政策中最重要的问题，参加语文测验的106人中，

有 51 人在 90 分以上；参加算术测验的 390 人中，有 192 人在 90 分以上。

对于部队的军事训练，陈云也抓得十分严格。每天拂晓，鸡啼头遍，“新兵营”就吹起了嘹亮的起床号。大家集合在大操场上，精神抖擞地练射击、刺杀、格斗和其他战术动作。陈云经常扎着腰带来到操场，检查指战员的操练情况。为了检验操练成果，调动指战员练兵的积极性，“新兵营”组织了各队之间的实弹射击比赛。陈云亲自给各队获得前三名的同志授奖。

除了紧张的学习和军事训练外，陈云还主张开展多种形式的体育和娱乐活动，把“新兵营”的生活搞得丰富多采、生机勃勃。于是，“新兵营”修了排球场和篮球场，每逢星期天都要赛上一两场，陈云只要有时间，就去观看比赛，给战士们助兴。战士们还学唱抗日救亡歌曲，每次开大会时，都要互相拉歌，那热火朝天的场面，给西路军许多老战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电影，是当时非常稀罕的玩艺儿，整个迪化市，只有苏联领事馆有部电影机。陈云想让同志们开开眼界，就把电影机借来，在“新兵营”内放映。开头几次，由苏联领事馆派人来放电影。后来，陈云指示“新兵营”要派人学会放电影。于是，部队就挑选搞无线电机务的贾善去苏联领事馆学习放电影。不久，老贾就能独立操作了，他也许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电影放映员。从那以后，“新兵营”的官兵差不多每个月都能愉快地看上一两次电影。

陈云就像一块有着巨大吸引力的磁铁，紧紧地吸引着“新兵营”的干部和战士。在他的带动和感染下，整个“新兵营”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

深谋远虑

对于“新兵营”的建设，陈云的考虑是很长远的。他的思路并没有局限在这一支部队的建设上，而是立足全局，从整个人民军队的长远建设来思考问题。

1937 年深秋的一天，陈云把“新兵营”的干部和战士召集在一起，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固然要发动全民抗战，但也要不断改善武器装备。我们不能光靠步枪、刺刀，我们也需要有飞机、大炮、汽车、装甲车来打击敌人，现在没有这些武器，将来总会有的，等有了再去学就晚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着手培养人才。如果我们这 400 多人，每人学会了摆弄一两件机械化武器，再回延安，一个人带会十个八个同志，这对建设我军的技术兵种，对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将是多大的贡献呀！”

陈云一席话，在指战员们平静的心中掀起了波澜，他们深深地为陈云远见卓识的建军思想所折服。自从到了新疆后，许多战士见到盛世才的飞机、大炮、装甲车、坦克车，心里早就痒痒了。他们曾私下议论：要是我们西路军有这么好的装备，我们就不会失败，我们的战友也绝不会牺牲那么多。有的讲，要是给红军这些高级装备，革命再有几年准能成功。现在陈云的话，正好说到大家心坎里，官兵们那股高兴劲就甭提了。

对在部队开展现代化军事训练这个计划，陈云是经过周密考虑和做了充分准备的。在向部队发出组织现代化军事技术学习的号召之前，他已通过各种渠道，详细调查了盛世才驻迪化部队的机械化装备情况和军官学校的教学能力，了解到盛世才近几年从苏联接受了不少现代化武器装备援助，还从苏联聘请了教官，他们自己也培养了一部分教官，搞了几个技术兵种训练队。根据这种情况，陈云提出，请盛世才和苏联的教官，帮助“新兵营”学习、掌握这些武器装备。盛世才聘请的苏联总顾问巴宁中将首先表示可以在器材

保障和教学上予以协助。盛世才考虑到统一战线的形势，又深知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就打着借此可以向苏联多要些装备的小算盘，同意了陈云的提议。这样就为“新兵营”开展现代化多兵种的军事训练，提供了重要的客观条件。加之“新兵营”经过几个月的文化基础课学习，已为顺利过渡到学习军事技术奠定了较好的文化知识基础，这也使“新兵营”的多兵种训练具备了重要的主观条件。因而，陈云不失时机地提出把“新兵营”的文化学习转入军事技术的学习。

根据盛世才提供的装备和师资，陈云确定“新兵营”第一、二、三大队共 200 多人学驾驶汽车，其中第三大队在学会驾驶汽车的基础上再学开装甲车；第四大队 100 多人学各种火炮。

陈云从官兵们不懂得发动机传动运转原理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即以学骑自行车开始学机械化。他对学习驾驶汽车的一、二、三大队的同志们说：“每个同志都要学会骑自行车。在学习复杂的机械技术之前，先学学摆弄简单的机械；在学驾驶四个轮子之前，先学学掌握两个轮子的车。咱们就从学骑自行车开始学机械化！”于是，陈云筹资买来两辆自行车，这两辆车成了全体指战员学习机械化的启蒙工具。大家兴致勃勃地排着队轮流学骑车，每人每次学一小时，由两名先学会的“教员”在后面扶车保驾。学得快的骑三四个小时就能独立“驾驶”了，慢的学五六个小时也基本会骑。然后，学习半个多月的汽车构造原理，在此基础上学习汽车驾驶。

对于学习多种火炮的四大队，陈云也提出从炮的构造、射击原理到实弹射击几个阶段依次进行。按照陈云提出的方法去做，学员们果然收到了好的效果。大家都称赞陈云提出的由简到繁的学习方法好。

干部队的学习重点是军事、政治理论。为了发挥和调动干部队五六名老无线电技术人员和两名医生的才能和积极性，陈云又抽调出 20 多人组成无线电训练班和近 10 人的军医班。他还选派了几名同志到盛世才的兽医站学习，以适应发展我军骑兵的需要。

从此，“新兵营”俨然成了我军第一所多兵种的军事技术学校。广大指战员深知这种学习机会的珍贵，时刻想着党的期望和今后的重任，以更刻苦、更自觉的精神投入到专业学习中。由于已经补习了半年文化知识，军事理论学习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不久，就进入了实际操作，戈壁滩上出现了红军指战员驾驶的汽车、装甲车，响起了红军操纵的大炮的射击声。

后来，“新兵营”的许多同志都成为我军军事技术的宝贵人才，在我军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陈云当年的设想是富有远见的。

新疆八路军办事处

新疆位于中国的西北部，与苏联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既是安全的抗日后方，又是一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国际援华物资要通过新疆运往抗日前线，中共的干部去莫斯科或回延安，也要走新疆这条路线。因而，中央对新疆的统战工作十分重视。

中国共产党与新疆盛世才的接触是从陈云率员赴新迎接西路军进疆开始的。“新兵营”正式成立后，陈云作为党中央驻新疆代表，直接负责中国共产党和盛世才的统战工作。这标志着中共与盛世才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利用这一统战关系，陈云顺利地将西路军左支队迎接进疆，并为红军训练了大批有较高素质的军事干部，同时，通过当地“反帝会”和《新疆日报》，积极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兰州等地公开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巩固抗战后方，保持一条和苏联之间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通道，支援抗日前线，中共中央决定在迪化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

10月10日，八路军总部代表周小舟、盛世才驻南京代表张元夫和国民党政府铁道部代表社重远，自陕西乘飞机抵达兰州。10月12日，他们又从兰州飞抵迪化。这时，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邓发，奉党中央的指示，于9月下旬由莫斯科回到迪化。陈云、邓发、滕代远和周小舟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指示，征得盛世才同意，于1937年10月间在迪化正式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这是中共、八路军在新疆的第一个落脚点，标志着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中共中央决定陈云任新疆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滕代远任主任。

在陈云与盛世才商谈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的过程中，盛提出新疆没有八路军，不同意八路军在新疆公开设立办事处。陈云等从大局和新疆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出发，同意了盛的要求，双方商定：第一，不公开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和代表，而由中共派驻新疆的代表总负责，对外只称“南梁第三招待所”。办事处内的我方工作人员不能公开与社会各阶层人士接触，具有保密性质。第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没有自己的警卫和武装力量，而由盛世才给办事处选派副官和卫士以及炊事人员等。第三，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没有自己的独立的通讯联络设备，通常用自己的密码通过盛世才的电台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党代表与在各地区工作的中共党员的联系通过盛世才的邮政收转或采取其他秘密联系办法。

新疆八路军办事处最初设在督办公署西大楼，后迁至南梁（今乌鲁木齐胜利路二巷一号）新疆塔城行政长官赵德寿私人住宅。这是一所中苏合璧的土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是个四合院。另外还有两处地方也属八路军办事处：一是新房子，是党代表同在盛世才政府、军队中工作的人联系的地方；一是羊毛湖，是病残干部休养的地方。陈云经常往返这几个地方处理事务，并仍全力关注着“新兵营”的建设，因而工作十分繁忙。

新疆八路军办事处成立之初，便在陈云和滕代远的主持下，确立了六项工作方针和任务：一是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维护祖国统一，帮助盛世才促进和巩固“六大政策”政权，建立新新疆；二是巩固抗战后方和保持国际交通线的畅通；三是筹集和转运国际和新疆援助延安八路军抗日的部分军火和其他军需物品；四是为抗战和新疆培养人才；五是迎接和接待往返于延安和共产国际间的各级干部和党员，安置病残人员治病和休养；六是指导和管理工作、学习的党员、干部的学习、生活和思想，传达党中央文件，经常保持与党中央、共产国际以及在新疆各地工作同志的联系。根据这六项方针和任务，八路军办事处成立不久，经与盛世才多次交涉，办事处为八路军争得了5万件羊皮大衣，10辆汽车，12挺高射机关枪，12万发子弹的物资援助，并同盛世才达成了为八路军培养航空人才的协议。

创建我军第一支航空队

陈云的视野是极其开阔的。

1937年深秋，在“新兵营”已学习了汽车、大炮、装甲车、军医等技术的基础上，陈云又设想着为党训练一批掌握航空技术的年轻干部。

有了这样的想法，陈云先找到苏联军事顾问，了解到盛世才新疆航空队的一些情况：盛世才的航空队共有飞机 15 架，其中有 6 架初级教练机，另 9 架侦察轰炸机亦可用作教练机，苏联教官已帮其训练了两批飞行员和一期地面维修人员，准备明年春再培训一期飞行、机械人员。现有苏联飞行教官 2 人，机械、领航教官各 1 人。下期能训练飞行、机械人员各 30 名左右。

根据这种情况，陈云多次同盛世才交涉，请他的航空队下期为八路军培训 50 名空、地勤干部。盛世才心里当然不愿意让共产党人使用他的飞机培养人才，但他既然答应使用他的汽车、大炮、装甲车学技术，就不好拒绝借他的飞机学飞行。于是，盛世才向陈云提出三项条件：第一，他的飞机不多，要求中国共产党出面请苏联再援助几架比较先进的飞机，用于代培共产党的飞行人员；学员要由 50 名减为 45 名，其中飞行 25 名，机械 20 名。第二，为八路军训练的这批飞行员毕业后，不要马上回延安，要他们帮助航空队把军威建立起来，因为他训练的头两批飞行员都是学生出身，怕死，不愿意打仗。第三，要求中国共产党派一批得力干部在新疆工作，帮助发展文化教育，整理财政经济，卫戍边防。盛世才的算盘还是打得蛮精细的。

经过慎重考虑，陈云认为这三条切实可行，既有利于发展同盛的合作关系，又不丧失原则，对八路军也是有利的。空军是很复杂的技术兵种，要建设自己的空军，必须及早培养人才。当时苏联同国民党政府有外交关系，不可能为中国共产党培训成批的军事技术人才，尤其像训练飞行人员这样敏感的问题，他们更不会轻易答应。若能利用盛世才的航空队，为八路军培养一支既会驾驶飞机，又会维护飞机、修理飞机的航空技术队伍，不是比去苏联学习更便利吗？于是，陈云答应了盛世才提出的条件，并和他达成了用盛的名义，以苏联的教官和装备，为八路军培养航空技术人才的协议。

考虑到这是为党培养的第一批航空种子，必须慎重选人，所以，陈云亲自筹备派人进新疆航空队的具体事宜。

陈云在“新兵营”作了动员，向大家讲明办航空队的重大意义：“我们在中央根据地、长征途中，吃了敌人空军多少苦头啊！许多英勇善战的好同志，没有倒在与敌人短兵相接的战场上，却惨死在敌机的轰炸下。贺子珍在贵州挨飞机轰炸，身中 9 块弹片。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又用飞机对我华北军民狂轰滥炸，制造了很多血案，如果我们党有一支自己的空军，就能从空中打击敌人，革命的胜利就会早日来到。”

动员结束后，陈云开始在“新兵营”内排队摸底，亲自找人谈话，预选学习航空技术的第一批学员。为了保证第一批航空队员的质量，陈云决定全部在共产党员中选拔，基本条件是：年轻，身体好，有一定文化。

11 月下旬，陈云奉命回延安。临行前，他特别找有关同志郑重交代：有关学航空技术的问题，待我回延安请示党中央、毛泽东之后才能定下来，这里的 400 多人绝大多数是红四方面军的，考虑到这是我们党组建的第一支航空队，应由各个方面军的同志组成比较合适，准备再从延安挑选一些人来这里学航空技术。陈云把按条件精心挑选的 30 名年轻干部、战士推荐给接替他工作的邓发。邓发按照陈云的交代，对各大队预选的 30 余名学员于次年 1 月进行了体格检查，经苏联专家检查，合格者有 25 人。

陈云返回延安后，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认真汇报了派人到盛世才航空队学习的意见及计划，得到中央批准。中央认为这是一件建设人民空军的大事，学员要分别从三个方面军中挑选；并决定由陈云和中央组织部负责这项工

作。随后，陈云在延安军政大学、摩托学校选拔了 18 名学员，并亲自同他们谈话。陈云鼓励他们说：你们将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是红色空军第一批骨干；不要怕文化低，不要怕人家看不起，要有坚强的毅力，刻苦学习，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要搞好团结，遵守纪律，保持党的荣誉。

1938 年初，这 18 名学员从延安出发赴新疆迪化。出发前，陈云把他们集中到中央组织部，再次勉励大家要刻苦学习航空技术，取得良好成绩，圆满完成学习任务。同时，他嘱咐大家沿途应遵守纪律，并指定曾任过骑兵团政委的严振刚带队。

3 月 10 日，这支队伍千里迢迢来到迪化，与迪化的 25 名学员汇合。一支在陈云精心组织下的红色航空学员队伍就这样诞生了。在这些同志中，从红一方面军选调的有 16 人，从红二方面军选调的有 2 人，从红四方面军选调的有 24 人，从红 25 军选调的有 1 人，充分体现了全军团结奋斗共创人民空军的精神。

这批年轻的红军干部没有辜负陈云的厚望。43 名学员大多数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上第一堂课《飞行原理》时，一位姓王的教官发现没有一个学员是中学毕业的，把讲义一夹就走了，再也没有来上过课。但学员们毫不示弱，发奋攻读，最后几乎每门课都压倒了盛世才属下的那些纨绔子弟。两年后，机械班以能够维护三种飞机的优异成绩毕业。航空班的学员也完成了初、中级教练机的飞行训练，部分学员还完成了 W—5、N—16 型战斗机的科目。红色学员的学习成绩使盛世才的军官们大为震惊。

1939 年 8 月和 1940 年 2 月，周恩来往返苏联经迪化时，代表党中央、毛泽东看望了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的同志们，认真听取了飞行班班长吕黎平、机械班班长严振刚的汇报，并询问了学员们的学习、生活情况。他还肯定了从各方面军选入学航空的做法，赞扬说：这很好，每一个方面军都有特点，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继承各个方面军的优良传统，这样我们的航空队就会有强大的战斗力。陈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最后，他高兴而坚定地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党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暂时没飞机，就先培养技术人才嘛！你们 40 多名同志既有会飞行的，又有搞机械的，一旦有飞机就能形成战斗力，党中央对你们寄予很大希望。”

事实正是如此。1946 年 6 月，这批学员返回延安后，组成了延安航空队。解放战争期间，这批学员在东北老航校东安镇为培养人民空军的飞行员和其他航空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 年 11 月，我军成立了人民空军，这批学员中的大部分走上军师级以上的领导岗位，在抗美援朝战场和国土防空作战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贡献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成为人民空军的栋梁之才。由此观之，我们更加钦佩陈云当年的远见卓识和为创建人民空军所作出的基础性贡献，它将永远载入人民空军建设的光辉史册之中。

圆满完成了在新疆的使命后，陈云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于 1937 年 11 月底搭乘运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等回国的飞机，同他们一起由迪化经兰州飞往延安。飞机抵，达延安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亲赴机场迎接，延安各界群众还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集会。

到延安后不久，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增补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时，他年仅 32 岁。虽然他还很年轻，但已经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此，他踏上

了新的革命征程，用自己的智慧和心血，为党和人民谱写出一页又一页新的光辉篇章。陈云青少年时期大事记

(1905—1937)

1905年诞生

6月13日(农历五月十一日)出生于江苏省青浦县(现属上海市)练塘镇一个农民家庭。

1907年2岁

父病故。

1909年4岁

母病故。过继给舅舅廖文光抚养。

1913年8岁

进私塾，受启蒙教育。

1914年9岁

进练塘镇西市城隍庙贻善初等小学读书。

1915年10岁

春贻善初小毕业。由于家境贫困，辍学在家做杂务。因天资聪颖，引起当地有名的教育家社衡伯的注意。后经杜推荐，免费入颜安小学高小部读书。

1917年12岁

为了学习专业技能，从颜安小学转到距练塘20多公里的青浦乙种商业学校寄宿读书。但因经济力量薄弱，学习不满两个月，便辍学回练塘。

1918年13岁

在颜安小学高小部继续读书。

1919年14岁

5月中旬受五四爱国运动影响，和颜安高小部师生组成童子军和救国十人团及宣传队赴小镇街头、明园寺、小蒸、泖口等地发表演讲，表演短剧，号召抵制日货。同时还和师生们组成救国储金会，到街头募捐，为反日宣传活动筹措资金。

5月底毕业于颜安小学高小部，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继续求学，即在家中做家务。

11月26日经颜安小学老师推荐，赴上海，到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当学徒。在商务当学徒期间，坚持刻苦自修，开始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经常与同事到“上海通讯图书馆”看一些进步书籍。

1925年20岁

6月积极参加五卅运动。此后，开始研读马列主义和苏联革命书籍，如《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辩证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常常读至深夜。

7月任商务印书馆中共临时党团成员，参与领导罢工。

8月20日组织并参加商务印书馆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会议，讨论组织罢工的策略、方法和步骤。

8月21日主持召开商务印书馆党团成员、工会执行委员和工会积极分子会议。会议作出举行罢工的决议，草拟了《罢工宣言》、《复工条件》等，选举了由15人组成的临时委员会，陈云任委员长。

8月22日率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400余名职工举行罢工，分别被推举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筹)和商务印书馆罢工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8 月由童亦湘、恽雨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编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总务处、发行所联合支部。

9 月 1 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召开全体大会，正式成立职工会。陈云被推选为执行委员。

秋为限制陈云在工人中的活动，资方将他调到仅有三四名职工的虹口分店工作。

11 月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编辑的地下刊物《职工》创刊号上，分别以“怀”和“民”署名，发表了《总工会是什么》、《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两文。

12 月 22 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印刷所举行第二次罢工，陈云为罢工委员会总负责人。

年底商务印书馆成立党总支，陈云任发行所支部书记兼商务印书馆总支部干事。

1926 年 21 岁

1 月在《职工》第 3 期（罢工专号）上，分别以“民”和“让”署名，发表了《罢工后职工应有的觉悟》、《我们为什么要罢工》两文。

4 月同在沪工作的青浦 24 位同乡重建“青浦旅沪学友

5 月 30 日与章郁庵、谢庆斋、许新之等人组织商务印书馆党团员和大部分工人群众到南京路参加纪念五卅惨案周年的游行示威活动。

6 月在《职工》第 8、9 期（合刊）上发表《职工与革命》一文，署名“一民”。

7 月在《职工》第 10 期上发表《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一文，署名“怀民”。

7、8 月间经常回青浦，在高尔松等人家中开会，商议在家乡建党等工作。

9 月在《职工》第 12、13 期合刊上发表《和平之路》一文，署名“民”。

10 月 23 日参加上海工人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10 月在《职工》第 14 期上发表《自治与民众》一文，署名“民”。

12 月 5 日代表商务印书馆职工出席上海店员总联合会成立大会。此后，参加店员总工会的工作。

12 月参加领导上海各行业（估衣、米业、南货、百货、中药业等）店员大罢工。

1927 年 22 岁

2 月 7 日出席中共江浙区委在上海杨树浦英电俱乐部召开的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准备会议。

2 月 19 日参加上海工人举行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发动和领导南京路上著名的先施、永安、新新、丽华四大百货公司店员的罢工。

2 月下旬因白色恐怖严重，陈云奉中共上海区委和上海市总工会的命令，带领商务印书馆职工一行五人由上海转移到浙江余姚。3 月上旬，返沪。

3 月 21 日受上海总工会之命，专赴龙华与白崇禧接头，要求国民革命军速进上海，遭拒绝，未能直接参加武装起义。

夏因领导工人运动暴露了身分，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和通缉，为躲避敌人的搜捕，不得不离开商务印书馆。

8 月任中共上海市沪中区委委员。

9 月底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派陈云回青浦领导农民运动。同中共青浦独立

支部取得联系，决定10月初返回青浦。

10月初由上海经嘉善西塘转移到青浦小蒸，同陆铨生、吴志喜等取得联系，着手恢复党的组织，从事农民运动。

10月上旬在练塘召开西乡党团员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商讨贯彻江苏省委制定的实行土地革命，组织武装暴动，趁秋收时期，实行抗租抗税的方针。

10月中旬出席在黄渡中共青浦县委书记夏采曦家召开的东乡党员会议，在会上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江苏省委的指示，强调在青浦地区发动秋收暴动的意义。

同吴志喜、陆铨生、袁世钊等在青浦西乡的小蒸、练塘地区恢复和整顿农民协会，积极培养农会骨干，建立党的农村基层组织。

10月25日“十月潮”祭神仪式结束后，向3000多名农民发表演说，号召广大农民团结起来进行抗租斗争。

11月13日同夏采曦参加练塘镇南北货茶食业工会成立大会，在会上就工会组织及团结、改善工人待遇、劳资关系等问题作了讲话。

11月中共青浦县委决定组织松江区农民革命武装，由吴志喜任松江区农民革命军总指挥，陈云为党代表。同月，中共青浦县委成立，陈云任书记。

12月调任松江区党的负责人，领导该区党的工作及农民运动。

1928年23岁

1月3日领导小蒸农民举行暴动。暴动期间化名陈亨。

1月上旬中共松青县委决定，松江、青浦两支农民武装合编为松江区农民革命军，吴志喜任总指挥，陈云为政治委员。

1月12日到查家浜，同吴志喜、袁世钊、陆龙飞等人研究夺取枫泾的计划，后因获悉松江敌人援军即到，决定计划暂时停止实施。

春到嘉善避居，化名李介生。在避居期间，坚持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坚持领导松江区的农民革命斗争。

9月中共淞江特委成立，陈云任组织部长。

11月1日被中共江苏省委任命为农委委员。

冬离嘉善，随中共淞浦特委机关迁至上海。

12月两次出席中共淞浦特委讨论奉贤县委提出的奉贤庄行暴动问题的会议。

1929年24岁

1月21日晚8时，同杭果人等参与领导中共奉贤县委发动的奉贤庄行农民暴动。

2月6日对中共浦南县委发动农民举行新街暴动作出部署。晚10时许，新街暴动开始。

春在练塘镇主持召开中共青浦县党员代表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大会议精神和江苏省委关于恢复建立中共青浦县委的决定。

3月在上海虹口吴淞路原中共青浦西乡区委负责人潘达清家主持召开松、金、青三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中共淞浦特委撤消后，陈云任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

5月遭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军事委员会通缉。

初夏由上海赴嘉善。

7月—8月到镇江检查工作。

9月初就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及农委书记。

9月4日中共江苏省委会议决定由陈云负责上海沪中区委工作。

9月7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汇报丹阳、常州党组织和群众斗争等情况。

9月9日为中共江苏省委起草《省委通告第32号——号召广大群众反抗国民党屠杀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

9月14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汇报无锡、扬州党的组织恢复和群众斗争情况。

9月15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汇报丹阳党组织恢复及群众斗争情况。

9月中旬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赴常州武进县指导和督促当地秋收斗争。18日，离开常州，返回上海。

9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决定设立淞浦八县工作委员会，陈云为委员。

9月27日为中共江苏省委起草《省委通告第37号——接受国际关于农民问题训令及中央决议案》。

9月28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汇报崇明党组织的状况和群众斗争情况。

9月29日为中共江苏省委起草《省委通告第36号——关于全国劳动大会》。

10月1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汇报江阴、常熟地区党组织状况。

10月3日为中共江苏省委起草《江苏省委致苏州县委信——关于工人斗争、秋收斗争、发展和改造党等问题的指示》。

10月4日赴常州，指导天宁寺抗租斗争。10日左右返回上海。

10月中下旬赴上海沪中区委巡视。

10月24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全体会议汇报沪中区委群众斗争状况。

10月26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汇报镇江情况。

11月4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报告崇明情况。

11月中上旬同李维汉商讨起草《江苏政治状况与党的任务和策略》的书面报告。后李维汉根据这份报告代表省委向江苏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作了政治副报告。

11月18日至26日出席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作农民运动报告。当选为省执行委员会正式委员、候补常委。

12月16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汇报江阴地区的斗争情况。

1930年25岁

1月2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汇报丹阳地区农民斗争情况。

1月9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汇报宜兴党组织工作情况。

1月10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报告农委工作情况。

1月12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报告上海药业、估农业群众斗争情况。

1月22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报告奉贤党组织工作情况。

2月2日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决定陈云出巡沪宁线工作。

2月12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汇报上海沪中区委群众斗争情况。

2月18日出席中共上海各区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同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汇报无锡、宜兴群众斗争情况。

3月8—13日赴无锡、南京、苏州巡视。

3月下旬任中共上海市法南区行动委员会书记，兼中共法南区委书记。

4月7日出席上海各区行委书记联席会议，在会上汇报了法南区的斗争情况。

6月5日出席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在会上汇报法南区工作情况。

6月7日向中共江苏省委汇报上海法南区兵工厂工人斗争情况。

6月14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汇报美亚、造船、兵工等厂工人罢工情况。

6月18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汇报法电工人罢工斗争情况。

6月24—28日向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汇报法南区法电、美亚绸厂、江南造船厂及浦东日华女工罢工斗争的情况。

7月14日任中共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委员，负责外县工作。

7月任中共上海闸北区行动委员会书记及行委主席团成员。

8月24日到上海闸北区检查对工人群众的组织发动情况。次日，向中共上海各区区委书记及军委参谋联席会作了汇报。

9月中旬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

9月24—28日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六届扩大的第三次会议。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9月任中共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10月初中共江苏省委改建为中共江南省委。陈云任江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兼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及上海工作委员会委员。

10月9日向中共江南省委汇报了南京、镇江、苏州等地党组织遭受破坏和目前的状况。

10月13日向中共江南省委汇报淮盐、淞西南群众斗争和党的工作布置情况。

10月19日出席中共江南省委常委会。会议讨论了组织、职运、农运、军事报告大纲。陈云就农运大纲向会议作了说明。

10月25日出席中共江南省委扩大会议。26日，向大会作农民运动报告。28日，在会上提出建立全省党报发行网、通讯网的见解和办法，并得到了会议的确认。

10月下旬为中共江南省委起草《江南省委扩大会议关于红旗日报工作大纲的建议》，对建立全省发行网、通讯网作出了具体规定。

10月29日出席中共江南省委常委会。会议讨论了外县工作问题。

10月31日向中共江南省委常委会汇报外县工作的区域划分和组织分配等情况。会议决定：取消上海工委，陈云参加上海市的领导工作；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由刘瑞龙担任。

11月10日向中共江南省委常委会汇报上海法南区支部工作和工人斗争情况。

12月1日向中共江南省委常委会汇报上海沪东、沪西、沪中、法南、闸北等五区工作情况。

12月28日为中共江南省委起草《关于支部生活检查大纲》。

1931年26岁

1月1日出席中共江南省委常委会。在会上作组织工作报告。会议同意了陈云把江南省委改为江苏省委的意见。

1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仍担任江南省委工作。

1月17日中共江南省委改组为中共江苏省委。陈云任省委常委，负责组织工作。

1月下旬出席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省委常委的工作日程及分工，决定陈云负责沪东、浦东、吴淞、铁总地区的工作和外县淞浦、沪宁地区的工作。

2月12日向中共江苏省委汇报上海法南区工作情况。

2月28日向中共江苏省委汇报上海沪东区工作情况。

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对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事发后，陈云协助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使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安全转移。

5月由中共江苏省委调至中共中央特科，任负责人。

9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秦邦宪、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六人组成。

1932年27岁

3月14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工会工作问题，决定陈云任全总党团书记。

4月2日主持全总党团常委会。会议讨论南洋烟草公司工人斗争等问题。

4月6日为全总党团修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红五月工作计划》发出。

4月13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的工作计划、失业工作决议案和赤色工会纲领等问题。

4月19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时事新报》工人斗争问题。

4月21日撰写《时事新报馆工人罢工斗争中反黄色工会的工作》一文。

5月2日，此文署名“金生”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第39期上。

4月23日起草《全总失业工人工作的决议》。《决议》规定5月20日为全国失业工人运动纪念日。

5月9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会议讨论了日纱厂工人斗争等问题。

5月12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会议讨论了目前形势与当前的紧急任务。陈云在会上讲了七点意见。

5月14日撰写《怎样巩固赤色小组》一文。5月30日，此文署名“金生”发表在《红旗周报》第42期上。

5月15日撰写《反对与黄色工会斗争中的机会主义》一文。6月1日，此文署名“金生”发表在《红旗周报》第43期上。

5月18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在会上传达职工国际八次会议决议。

5月21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会议讨论了纱厂工人斗争及女工工作等问题。

5月30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会议讨论了海员总工会的工作报告等问题。

6月上旬出席全总常委会。会议讨论了工联的工作报告。

6月3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会议讨论了沪西罢工斗争报告提纲。

6月8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上海电话工人的罢

工斗争问题。

6月12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会议讨论了进一步开展外省工作的问题。

6月18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向会议报告就任全总党团书记后的工作情况。

6月25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会议讨论如何开展青工工作问题。

6月27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向会议报告国民党第四次“围剿”苏区的情况及党领导的反“围剿”工作。

7月9日、12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讨论上海虹口10家缫丝厂工人的罢工斗争。

7月28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会议决定取消中央职工部，将人员并入全总。

7月31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传达中共临时中央为加强全总党团，取消中央职工部，将人员并入全总的决定，以及《中央关于失业工人运动的决议》。

8月10日起草《中华全国总工会改组后的工作报告》。

8月18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会议讨论了上海纱厂工会纲领。

8月21日主持全总党团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了宣传部的检查工作的报告。

8月27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向会议报告了上海日本纱厂工人斗争的情况。

8月28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向会议通报全总反帝工作情况。

8月撰写了《关于瓦解黄色工会与建立革命反对派的组织》一文。

9月7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会议讨论了工作方式转变等问题。

9月11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在会上作《关于黄色工会与革命反对派的工作报告》。

9月13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会议通过了《全总九一八告民众书》和《告在业、失业青工工友书》。

9月14日出席全总党团会议。会议讨论了全总关于苏区组织系统的指示信。

9月28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会议讨论了中央关于失业工人运动的决议，以及秘密工作等问题。

10月11日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起草的《反对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发出。

10月21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会议讨论了十月革命示威问题。

10月23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向会议作海总工作的书面报告。

11月13日主持全总党团会议。在会上报告十月革命节前后上海部分工厂、市政、报馆及海总工人斗争的情况。

11月14日起草《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检查上海纱厂工会青工代表会工作以后的决议》。

12月23日夜受党组织委托，到北四川路鲁迅寓所，接出在此避难的瞿秋白夫妇，并同鲁迅会面。

1933年28岁

1月17日同博古等由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任中央党务委员会委员、全总党团书记。

1月下旬与刘少奇到长汀检查指导工会工作。

2月25日出席中华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在瑞金叶坪召开的闽赣两省职工联合会委员长联席会议，研究解决社会保险、扩红支前、生产建设等问题。

3月13日中央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瑞金洋溪开学。陈云到校讲授工人运动史。

4月16日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国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

4月25日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第9期发表《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

5月1日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国店员手工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

夏为响应中共中央发出的“创造100万铁的红军”的号召，与刘少奇向中央局提出，以全总的名义，号召中央苏区工人带头参军，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

6月到福建汀州视察工作。

6月30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机关报《苏区工人》第3期上，发表《在纠正工人经济斗争“左”的倾向上我们所作的错误》一文。

7月15日在《斗争》第18期上，发表《怎样订立劳动合同》和《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两文。

7月 出席在瑞金举行的中国纸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

8月1日出席在瑞金城郊竹马岗举行的庆祝八一建军节盛大阅兵典礼和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中央警卫师）誓师授旗仪式。

8月22日在《斗争》第23期上，发表《克服工会工作的落后》一文。

9月1日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国苦力运输工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9月视察岗面红军兵工厂和塞上红军兵工杂械厂。

12月5日、12日在第37期、38期《斗争》上连续发表《粉碎五次“围剿”面前临近苏区的白区工作》一文。

12月25日在《苏区工人》第5期上发表《福建组织“人民革命政府”与赤色工会在福建的任务》一文。

1934年29岁

1月15—18日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会上作《白色区域中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报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

1月22日出席在瑞金沙洲坝中央大礼堂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式，在会上当选为主席团成员。

2月1日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式。在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2月2日在《斗争》第45期上，发表《为收集粮食而斗争》一文。

2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17人组成的主席团。

4月28日在《斗争》第57期上，发表《红五一前夜的全国无产阶级伟大的战斗》一文。

5月5日、15日在《斗争》第58期、59期上，连续发表《福建事变中党在福建的职工运动》一文。

5月15日在《苏区工人》第16期上，发表《上海100个绸厂的总同盟罢工》一文。

6月7日为中共中央编印的一本内部学习小册子撰写前言，题为《建立

白区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

夏受中共中央委托负责军事供给和各项生产的管理工作。

8月1日出席在瑞金大埔桥红场举行的中国工农红军成立八一纪念阅兵典礼和“抗日宣誓”大会。

9月14日在《斗争》第72期上，发表《游击区域（被敌人占领的区域）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一文。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分别从瑞金、于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后陈云受中央委派到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

10月18日随红五军团从曲利出发，开始长征。

10月20日午后，前往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出席营以上干部会议，向干部们传达了当时的形势及第十三师的任务。

10月21日随红五军团在赣城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11月8日随红五军团十三师从汝城以南的天马山到城口间，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

11月15日随红五军团十三师从湘南郴州良田与宜章之间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

12月1日随红五军团渡过湘江。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

12月上旬随红五军团翻越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

12月18日中革军委决定，军委第一、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

1935年30岁

1月1日出席在猴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重申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1月2日同刘伯承率军委纵队渡过乌江。

1月9日同刘伯承率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任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1月15—17日出席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等对“左”倾错误的批评，支持恢复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陈云在会上被指定为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者之一。

1月下旬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和地方工作部部长。在行军中除注意干部和地方工作外，曾多次受中央委派往来各军团之间，传达中央及军委的命令。

1月29日随中央红军主力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

2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为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发布《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斗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陆续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决议。

2月中旬至3月上旬向部队传达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

2月18日至21日随中央红军由四川古兰县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回师黔北。

3月16日至17日随中央红军在茅台附近西渡赤水河（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

3月21日至22日随中央红军由古兰县二郎滩、太平渡东渡赤水河（四

渡赤水)。

5月3日晚，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率军委纵队赶到金沙江皎平渡，在北岸组成渡江指挥部。毛、朱、周直接指挥全军的渡江工作。陈云任渡江指挥部政治委员。

5月12日同刘伯承率军委纵队到达四川会理县城郊的铁厂。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5月22日在冕宁县政府接见中共西昌特支成员陈野萍。

5月24日率军委纵队经大桥镇进入彝族区。

5月31日当晚，出席在泸定县城附近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并取得道上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红军及遵义会议情况。

6月5日在长征途中撰写《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一文。

6月中旬在四川中共地下党员席懋昭的掩护下，从四川天全县灵关殿出发，经荣经、雅安、成都、重庆，乘船前往上海。

6月底到达上海。

8月上旬同陈潭秋、杨之华等人从上海出发，经海参崴，于8月20日到达莫斯科。此时，共产国际七大已临近闭幕。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接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及陈云、滕代远等人。

8月下旬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任监察委员会委员，化名史平。

秋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该文署名“廉臣”刊载在巴黎华侨组织主办的《全民月刊》上，尔后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并很快传到国内，在国统区流传。

冬进列宁学校学习，并在东方大学“八分校”任教。

1936年31岁

4月15日在《救国时报》上以“史平”署名发表《论中国学生的救国运动》一文。

6月20日同在苏的中共部分领导人联名在《救国时报》发表为瞿秋白牺牲一周年而作的纪念词。

10月1日在《救国时报》上发表《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奸细的活动》一文，署名“史平”。

10月20日在《救国时报》上发表《是真话还是谎话》一文，署名“史平”。

10月26日在《救国时报》上发表短文《一个深晚》，署名“史平”。

10月30日在《救国时报》上发表《“诚意”和“基本准备”》一文，署名“史平”。

10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织赴新疆迎接西路军的代表团。陈云任团长，滕代远任副团长。本月，由莫斯科乘火车出发，到达阿拉木图（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

11月上旬由阿拉木图到达中苏边境霍尔果斯。在一个小镇的红军家里停留了三四天。因生病，由随行人员送回阿拉木图，休养一个月左右。

12月8日病愈。返回中苏边境霍尔果斯。不久发生西安事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陈云等在此停留，等候指示。

1937年32岁

4月23日从中苏边境乘坐新疆督办盛世才派来的汽车，经伊犁抵迪化（今乌鲁木齐）。

4月下旬出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与盛世才商谈接应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进新疆，取得成功。

5月1日带着几十辆装有枪支、衣服和食品的汽车到达新疆与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当日，带领西路军余部离开星星峡，途经苦水、哈密、七角井、鄯善、吐鲁番等地，于7日到达迪化。

5月根据当时新疆的政治形势和盛世才的要求，为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陈云等决定，西路军余部对外称“新疆督办公署新兵营”。陈云任“新兵营”党代表。

同月在“新兵营”中开展调理身体、清理经济、整顿思想的工作。

6月将“新兵营”指战员按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丙班，组织他们进行语文、算术两种主要课程的学习。

7月同滕代远及李先念、李卓然研究决定，对西路军左支队进行整编。

夏由于形势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决定西路军余部不去苏联学习，而留在新疆学习。陈云号召指战员们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军事技术、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在他的领导下，部队掀起了学习热潮。

8月5日在《救国时报》上发表《捐赠 随军西行见闻录 版权启事》，署名“廉臣”。

秋通过各种渠道，详细调查盛世才驻迪化部队的机械化装备情况和军官学校的教学能力；并提出请盛世才和苏联教官帮助“新兵营”学习、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要求，得到苏联顾问巴宁中将的支持和盛世才的同意。

10月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党代表。

深秋“新兵营”文化课学习暂告一段落，开始转入学习机械化装备。陈云对“新兵营”机械化装备的学习作具体安排。

11月同盛世才达成协议，用盛的名义，以苏联的教官和装备，为我党培养航空技术人才。

11月27日离开迪化，经兰州办事处，29日返回延安。

12月9—14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增补陈云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12月29日在延安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提出统一战线的口号》的演讲。

12月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汇报派人到盛世才航空队学习航空的意见及计划，得到批准，中央决定由陈云和中央组织部负责这项工作。

结 束 语

在我们脚下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千百年来，孕育出一批又一批伟大而又杰出的历史人物。他们不平凡的业绩和高尚的思想情操，启迪、教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后来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他们一生的求索、奋斗、创造，不仅引导中国人民开辟了新的历史纪元，也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陈云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他不平凡的经历同样给正在人生旅程中努力拼搏的人们留下了重要的启示。

（一）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是陈云人生前进的方向。

陈云成长的时代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军阀英勇斗争的时代。五四爱国运动的熏陶，五卅工人风暴的洗礼，大革命时期商务印书馆工人罢工斗争的锻炼，以及苏联革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迪，使年轻陈云的思想不断升华，他“先是相信吴佩孚的，后来相信国家主义，后来又相信三民主义，最后相信共产主义”，并“经过比较，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最好的主义”，从而坚定不移地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选择了为中国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革命道路。不管是在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大屠杀之中，还是在风云多变的家乡农民暴动的日子里；不管是在出生入死的上海地下斗争的秘密岁月，还是在征程漫漫、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不管是在远离组织，只身一人执行特殊使命的险恶斗争中，还是在纷繁复杂的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环境里，陈云在为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征程上始终是义无反顾，在所不惜。他曾深刻地指出，“每一党员应该深刻知道，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在弯曲险峻的革命道路上，革命者必须经历长期的艰苦和波折；在与敌人经常的斗争中，在每一事变的紧急关头，还有牺牲的可能。因此，每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坚信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而且必须对于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有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和奋斗到底的决心。”正是这种信念和决心，激励着陈云，鼓舞着陈云，指引着青年陈云人生前进的方向。

（二）坚韧不拔的意志是陈云建功立业的重要条件。

人的生命似洪水奔流，不遇到岛屿与暗礁，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陈云的幼年是不幸而贫苦的。他幼年丧父失母，由裁缝出身的舅父抚养。因家贫，他曾多次失学，很小便离家独自谋生。对于弱者来说，可能会被不幸击倒，但对于强者来说，不幸却是一笔财富。在这种环境中，陈云较早地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坚毅性格和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正是凭着这种顽强的意志和精神，他读书时是最好的学生；当学徒时是最出色的徒弟；刚满20岁便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中，参与领导和组织工人罢工和农民暴动。30年代初，年仅25岁的陈云即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以其还很稚嫩的肩膀，担负起党交给他的一个又一个重任：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中央特科书记，中共临时中央成员、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白区工作部部长，等等。在如此艰巨的重托面前，年轻的陈云不但没有被压垮，相反，血和火的洗礼，更铸造了他钢铁一般的坚强意志。他就像一块铁，在革命的烈火中被铸炼成钢，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不可多得的中坚力量。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页。

（三）孜孜不倦地求知，自觉无畏地实践和探索，是青年陈云不断成长进步的重要途径。

陈云自幼好学。在小学时，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由于生活环境所限，幼年的陈云没有博览群书的条件，但这丝毫没有减弱陈云求知的欲望。他尽量挤时间去书场听“靠壁书”，从江南的评弹中获取了不少知识。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后，陈云利用工余时间，发奋读书。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使陈云获得了丰富的知识，这些知识又使他的智慧、远见、抱负不同寻常。在求知的过程中，陈云领略和感悟了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发现和认识了能为劳苦大众谋得幸福的真理，从而成为一名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自觉奋斗的坚强战士。

步入革命生涯以后，陈云工作异常紧张繁忙。但无论环境多么艰苦，工作多么繁重，他总是孜孜以求地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从一切凝聚着人类智慧的书籍中汲取有益的思想营养。他说：“革命事业是一种伟大的艰巨的工作，特别是中国革命的环境和革命运动更是万分复杂，变化多端，而领导革命的共产党，它之所以能在变化的、复杂的环境中把握一切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且指导各个运动使之走向胜利，是因为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共产党员有了革命的理论，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不然，就会在复杂的、不断变化的革命环境中，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不能独立工作，也不能正确地实现党的任务和决定。所以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

陈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青年陈云不仅是一位勤奋的求知者，而且是一位勇敢的实践家和不知疲倦的探索者。他自年轻时起，就始终追随着党，实践和探索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之路。革命理论指导了他的实践，开阔了他的探索视野，而丰富的实践和探索又加深了他对理论的认识，促使他产生进一步追求知识和真理的欲望。

学和行在陈云身上是完美结合的。因此，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他方能显示出过人的智慧、非凡的远见卓识和善于驾驭复杂局面的雄才大略及镇定自如的气度。

毛泽东曾这样评论陈云：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平和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这番评价十分平实，确是很有分量的！

伟人不寻常的人生经历，对于正在成长的年轻人来说，有着取之不尽的智慧和力量。这里的寥寥数语，远远不能概括其中能给予我们的人生启迪。但愿青年朋友们读了这本小册子后，不仅能粗浅地了解陈云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投身革命的经历，而且能从这不平凡的经历中汲取宝贵的精神财富，进而完善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陶冶情操，磨砺意志，把自己有限的青春，投入到无限的为民族振兴、为祖国繁荣的奋斗之中！

